

“发挥社联作用，繁荣社会科学”

——我省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举行学习座谈会

今年3月19日，在上海市社联喜迎4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欣然作了重要题词：“发挥社联作用，繁荣社会科学”。接着，3月下旬，经中央同意，又公开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十年前在上海社联的重要讲话《充分发挥社联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科联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工作方向，以及如何改善、加强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作了明确的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科学工作和社科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为此，广东省社科联在暑假期间邀请了我省部分著名专家学者在顺德市举行了学习座谈会。同时，还邀请了上海市社联副主席武克全同志到会介绍有关情况。

学习座谈会十分热烈，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江泽民同志的重要题词和重要讲话的发表，对于社科联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工作，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意义之后的又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

同志们在发言中认为，江泽民同志说社科联是可以信赖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是对社科联工作的高度评价，使人感到振奋，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时期，社科联的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不断加强，真可谓任重道远，大有作为，很有地位。

同志们还密切联系我省社科联和学会的实际，畅谈了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社科联四大作用的体会。同志们说，在四大作用中，桥梁纽带作用是首要的，是基础。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了，其他几个作用也就容易发挥。所以，首先要与社科界密切联系，使社科联真正成为社科界之家。

同志们还就如何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一、在社科界和社科联机关工作人员中，认真组织学习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把对社科联工作的认识提高到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高度；二、要注意加强组织对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更好地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当前首先要围绕如何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来考虑；三、党政部门决策咨询要多吸收一些社科界专家学者参加，不仅是经济学的，还有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教育学的等；四、社科联和学会要大力提倡百家争鸣，观点创新，推动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五、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加强硬件建设，包括社科活动场所的建设等。

参加座谈会的社科界专家学者有张磊、张江明、梁钊、刘嵘、黄家驹、夏书章、吴群策、胡守为、李锦全、叶汝贤、石祖培、桂诗春、梁琼芳等30人。

（本刊记者 学 文）

目 录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学苑聚焦•

百年戊戌变法研究回顾

方志钦 王晓秋 沈渭滨 赵立人 李喜所

郭世佑 汪叔子 宋德华 郭汉民 赵春晨

吴义雄..... (5)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郭秀文 (15)

•经济学•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座谈纪要

..... 本刊记者 韦 前 湛 明 (16)

良好的金融体制与亚洲国家的持续发展

..... 约瑟夫·斯迪格利茨 (24)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集团成长的核心机制

与主要方式 彭清华 (32)

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特性与趋势分析

..... 余秀江 程 昆 (37)

完善我国证券税制的构想 陈思玲 (40)

•教育学•

独树一帜新开拓的理论领域

——序张铁明《教育产业论》 张 磊 (43)

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现代化 江海燕 (44)

广东经济结构变动与教育结构调整 梁 英 (48)

•哲学•

论邓小平的道德范式

——兼评道德政治化与道德经济化 李权时 (53)

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历史形成 赵玲玲 (57)

试论“知识”之定位问题 钟少华 (61)

1998年第9期

儒家思维的整体特征与内在缺陷 叶金宝 (68)

•历史学•

丁日昌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 贾熟村 (73)

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 刘平 (78)

•文学•

《庄子》与齐

——对《庄子》文化归属的再思考 孙立 (85)

试论客家文学 罗可群 (92)

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中的情与理

——《牡丹亭》与《欧拿尼》比较 徐顺生 (96)

•书评•

协调发展：人类的永恒主题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评介

..... 习万球 (101)

同情地了解 批判地超越

——读《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曹智频 (103)

可贵的探索 丰硕的收获

——评柯汉林《美的形态学》 刘晟 (105)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 Essays Looking Back Into Centenary Research 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Fang Zhiqin, Wang Xiaoqi, Shen Weibin, Zhao Liren,
Li Xisuo, Guo Shiyong, Wang Shuzi, Song Dehua, Guo Hanmin, Zhao Chunchen
and WuYixiong (5)
- Main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Area” (Reporters of the Journal) Wei Qian and Zhan Ming (16)
- Relation between a Good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Countries (24)
- Principle Mechanism and Basic Ways for Growth of Enterprise Group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Peng Qinghua (32)
-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hinese Rural
Share – cooperation System Yu Xiujiang and Cheng Kun (37)
- An Idea to Perfect the Tax System of Negotiable Securities in China Chen Siling (40)
- A New Exploration in Educational Theory: a Book Review over
“On Educational Industry” by Zhang Tieming Zhang Lei (43)
- Labour Capital Theory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Jiang Haiyan (44)
- Abou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Adjudgement of Educational
Structure Liang Ying (48)
- On Deng Xiaoping’s Moral Pattern Li Quanshi (53)
- Formational Process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System Zhao Lingling (57)
- On the Location of “Knowledge” Zhong Shaohua (61)
- The Enti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er Defects of Confucianist Thinking Ye Jinbao (68)
- A Specific Relation between Ding Richang (1823 – 1882) and Li Hongzhang (1823 –
1901) Jia Shucun (73)
- Several Problems about the Pirates in Guangdong during 1796 – 1821 Liu Ping (78)
- Further Consideration upon the Cultural Home of “Zhuang Zi”(《庄子》) Sun Li (85)
- A Primary Study of Hakka Literature Luo Kequn (92)
- Sentiment and Reason Shown in an Ancient Chinese Opera and a French
One: a Comparison Xu Shunsheng (96)
- Introduction to “A Study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 Xi Wanqiu (101)
- My Impression of the Book “Current Study of Neo –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o Zhipin (103)
- A Book Review on “Morphology of Beauty” by Mr. Ke Hanlin Liu Sheng (105)

百年戊戌变法研究回顾

编者按：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它对我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场运动，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此戊戌变法百年之际，本刊特邀请了国内十几位专家学者，对近半个世纪以来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并对今后的研究路向提出若干设想，以期对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颇多建树 大有可为 ——简评建国以来对维新派 与维新运动的研究

□方志钦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建国以来，国内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的研究，成绩斐然，颇多建树。最重要的是多数学者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这些问题，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飞跃，即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飞跃，从孤立的史事研究到联系社会、阶级、集团乃至整个历史时代的深入研究的飞跃，从非科学分析到科学分析的飞跃。在此基础上，逐步给维新派和维新运动以适当的历史定位和客观的评估。

建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此课题研究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不断求真和创新的。无论是对维新运动的派别、人物、事件的

研究或是史料的发掘、整理、校勘、辨析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经过学者们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已排除了过去蒙在维新派和维新运动上的历史尘埃，大致上已否定了过去封建统治者斥为“异端”、“叛逆”之说，也否定了过去人们斥为“反动”之说，而带有贬义多于褒义的“改良主义”或“改良”之说也甚少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在历史的定位上，几乎已公认这个运动和它的历史人物是进步的，有其历史功绩，而不因其有历史局限性和失败的结局而予以一笔抹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多数是对它（运动）和他们（运动的领导骨干）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一分为二的剖析，给其功过、是非、高低作出较为恰当的评论。

总而言之，学者们已基本肯定，维新运动是进步的运动，是近代历史前进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运动中是领导潮流的杰出历史人物，不能因其以后的作为而否定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贡献。

但是，此项研究工作也有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文革”期间，对该历史运动和人物的全盘否定。要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耗费了许多时间。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有新的进展，迎来了新的局面。此后，研究的路子更开阔了、成果更多了、质量更高了。到目前为止，此项研究正沿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开出的道路健康地前进着、发展着。

这项研究，仍大有可为。比如，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对运动

的研究尚需继续深入，即需深入探讨国内外形势和阶级、集团、个人的具体情况，还有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等情况；对正反面的人物还要做大量的个案研究，等等。

不容讳言，还有少数学者，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这个课题，盲目追随欧美资产阶级学者。也有少数学者，借歌颂维新运动来否定辛亥革命和其他革命运动。有极少数学者走得更远，宣扬革命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洋务不如洋治（洋人统治）的观点。这些不良倾向，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切莫让其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开阔视野、开拓思路， 对戊戌维新作全方位剖析

□ 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年是戊戌维新 100 周年。回顾反思百年戊戌维新研究史，感到有必要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开拓思路，实事求是、发掘史料、探索创新，推动戊戌维新研究的深入发展。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运动和爱国救亡、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上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仅仅作为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来研究，而应把它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系统工程来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研究。

戊戌维新的发生、发展、成败、得失，涉及到社会的各种层面和要素，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科技，以至社会习俗、行为方式、思维方法、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作用、矛盾、制约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应该对戊戌维新的各类要素、各种层面及其联系、作用，进行全面

的透视和剖析。

有些角度和要素是过去论者较少涉及的。如关于戊戌维新的时机问题，当时中国究竟有没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机会和可能性呢？又如戊戌维新的社会承受力问题也值得研究。变法改革关系到各阶级、阶层、集团的权力、利益的再分配。改革措施能否为社会承受，除了直接利益利害关系外，还涉及到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心理定势等因素。戊戌维新遭到巨大阻力，一方面反映中国守旧势力与传统影响之强大，另一方面也表明晚清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较弱，心理适应性较差。另外维新派政策策略的失误，也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过去论者大多强调戊戌维新失败的客观原因，即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大和破坏，同时又批评维新派的软弱。可是往往忽略了维新志士和光绪皇帝主观上急于求成以及在舆论宣传、纲领策略、争取同盟者等等方面的许多重大策略错误。而变法的失误又往往与维新改革领导者、执行者的素质、能力、品质以至性格、心理有很大关系。如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因此也有必要对维新派和光绪皇帝的政策策略失误和个人素质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从戊戌维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除了以往注意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层面的改革外，还应探讨戊戌维新如何进行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启动了人和社会建构方式的现代化工程。在对湖南、北京、上海、广东等重点地区的研究基础上，还应注意到一些内地和边远省份是否也曾吹到了改革之风。在戊戌维新人物研究中，除了康梁谭严及其他维新派、帝党、后党主要代表人物外，还应发掘史料，剖析各种类型各种身份，那些不太著名的人物甚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活动、思想和心态，从中也可以感受到戊戌维新的时代脉搏和社会风貌。

总之，只有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对戊戌维新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研究，才可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戊戌维新的全貌和实质，并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科学地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获得对现实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戊戌维新：民权与专制的冲突

□沈渭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百年前的维新变法，有许多可供后人议论之处。民权与专制的冲突，就是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话题。

一个政权，给人民以多少权利，是衡量民主还是专制的标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2000多年来一直是皇帝有权，官吏有权，百姓无权；天语纶音，朕即法律。即使被西方轰出中世纪后，依然如故。人民长期处在专制高压下，人格早已麻木。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维新派要变法图强，首先要“开民智”，改变国民的奴隶意识，使用的思想武器，即是搬用向西方学来的“人权天赋”，大倡民权：“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中国之改制，当以兴民权为真标”。

维新派声讨专制、索要民权，从操作方面说，主要有三条：一是给人民以言政自由，为此，他们提倡成立议院，议员民选；二是给人民以言论自由，为此，他们倡办报纸，成立学会、到处发表演说；三是给人民以自立权利，为此他们游说封疆，主张一省应地方自立。这三条无疑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和愚民政策，是一种根本性冲击。一旦如此，不仅政体形式发生改变，国家性质也将随之变易。卫道士们当然将民权论视为洪水猛兽，群起攻之，宣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民权之论，“无一益而有百害”。双方都在民权问题上做足文章，百

日新政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就此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更像是个思想启蒙运动，知识界由是懂得了做人应有的权利。

维新派的民权宣传目的是要改革封建专制政体，所以戊戌变法又是一次政治革新运动。但也应看到体制改革有实质性与非实质性之分。不妨说，维新派要的是给民以权的政体改革。至于改革的方法和形式，可以变通。所以他们会从设议院退到开制度局，把“变法之本”落实到“变官制”上，把宪法的宗旨限定在“君民共治”上。过去我们似乎太看重政体形式的改变，一见上述策略性变化就说他们倒退了；一见清末“新政”中一些改革措施，则不着边际地加以“重新评价”。其实，维新派从未放弃过以民权为核心的政体设计，民权始终是他们政治主张的灵魂。

清政府体制的核心是专制愚民，而不在其形式。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维护专制愚民的“三纲五常”，是“万古不易之常经”，而治法则是“令甲令乙”的可变者，体现统治方法的政府结构形式可以变化，即所谓“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所以清王朝照样会“自改革”，搞所谓“新政”乃至“预备立宪”。形式在变，专制的实质不变，对仍在鼓吹民权的康、梁，坚持不赦；从思想到行动仍实行“防民胜于防川”的政策。正因为它不给民权，所以被时人称为假维新、真专制的骗局。

但是，如果民权没有推进到民主，争民权又和维护君权联在一起，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彻底，人民更难通过改革获得真实的权利。不幸，戊戌维新就是如此。大倡民权的维新派始终停留在民权启蒙的起跑线上，不能因时而进；不少受到民权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政治觉醒则越不过君主立宪的门槛。这两者都曾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过麻烦。

事实证明，只有民主才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民主共和才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看来，戊戌维新时期民权与专制的冲突，确有进一步再议的必要。

维新变法的起止及成就

□赵立人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清廷之开始维新变法，以1898年6月11日的《明定国是诏》为标志，同年9月21日慈禧再出“训政”，维新运动就寿终正寝，仅历时103天，故又称“百日维新”。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

早在1945年，范文澜就在其《中国近代史》上册中，将戊戌变法一章的时限定为1895—1900年。他还指出：“甲午至戊戌（1894年至1898年），维新运动的成就：第一，冲破了满清禁例，争得某种程度出版结社的民主权利。第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法律上承认。甲午以后，新工业从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得到某些发展，洋务派把持新工业的权力开始衰落了。”范老又引1895年“维新派首领之一”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和康有为《上皇帝书》中要求“开民厂以造机器”的主张，以及随后清廷命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上谕，1897年张之洞奏折所提及民办工业蓬勃发展，“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的情况，指出“这确是甲午战后发生的新气象，满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合法，可以说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收获”。

由于以往史学研究中“重政治，轻经济”的倾向，范老的见解曾长期被忽视，但近年来重又得到认同，如闻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袁伟时《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剖析及其启示》也认为：“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东方文化》1998年第1期）他在《世纪之交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一文中对1895年8月11日上谕

中要求将官办企业“改归商办”，吸引华侨资本回国办企业，“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的内容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与流行多年的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观点相反，从1894年到1914年间，中国的产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5.46%。虽在1914—1920年间下降至平均年增5.16%，1920—1936年间又上升至平均年增8.83%。（《开放时代》1998年5、6月号）

胡绳则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指出，“政变后第五天（按：即9月26日）慈禧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停止‘不应奏事人员’上书言事；取消《时务报》；不久又下令恢复考试八股。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她并没有全部取消光绪皇帝所举办的‘新政’，只是压制了他想当真皇帝的愿望，扑灭了维新派。”戊戌“新政”是否仍属“洋务”性质，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戊戌政变之后，“新政”没有全部取消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到了1900年，慈禧决定放弃“新政”，而改以“神术”救国之后，维新变法才暂时中断。但仅仅一年之后，它又以形式上更为激进的“清末新政”的名目复活了。那么，维新运动的起止，当如范老所定，由1895年至1900年，抑或应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由1895年至1911年，似仍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这并非毫无意义的形式空论，因为它有助于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

可否多一点逆向思维

□李喜所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20年，戊戌变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已有相当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对我们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作一点儿变革，注入一些逆向思维？

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约下，无论在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中，都会积淀一种几乎人人无意识地去恪守的固定的思维方式。无论才华多么出众，也很难从总体上超越。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生态环境变了，思维方式才会慢慢改变。随着近20年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变，史学界的思维定势也必将有大的变化，并影响到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提倡逆向思维，可能会促进新思维方式的勃兴。比如，近半个世纪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基本都按“改良主义——此路不通”的思维方式去论证的，可不可以换一种推理方式，即认真研究一下戊戌改良变法或曰戊戌维新运动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走得通，改革或曰改良在何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在中国才能成功，戊戌君子们的“改革梦”怎样才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用一种改革在中国可以成功的新的思维方式去重新审视百年前失败了的改革运动，自然会出现新的学术成果。再如，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用斗争哲学去研究历史，在研究改革史或曰变法史时特别注意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一部戊戌变法史变成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史，似乎只要改革派斗倒了守旧派，戊戌变法就成功了，这当然有合乎历史真实的一面，但静心去深入思考，也不完全是这样。即使如人们所想象的，戊戌维新时的改革派战胜了守旧派，变法也不一定能成功。因为，改革或曰改良，太复杂了，是多种因素相互碰撞和运作的结果。诚如梁启超所一再讲的，变了甲，又要变乙；变了乙还要变丙；牵一发而动全身。想在几个月内就使戊戌维新运动成功，只是一种幻想。所以，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夸大，或者仅以斗争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戊戌变法是不全面的。而且，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谐、团结更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变法必须和发展、稳定联系起来去推进，才能成为可能。只研究斗争，不探讨和谐，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戊戌变法时如

何讲求和谐，如何扩大改革派的队伍，如何争取中间力量，也很值得研究，也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此外，如只注意西方文化在变法中的作用，忽略传统文化在改革中的特殊功用；较多地讲维新派的进步性，较少去肯定一些开明官吏乃至光绪帝的关键作用等，都需要重新思考。总之，改革习惯了的思维定式是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深入的首要条件。

时代的开端与时代的赅续 ——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

□郭世佑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试图用一种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的失败去论证另一种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获胜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并以历史规律的名义将价值判断的内容引入事实判断，史学界已做过不少文章。至于前后两种甚至多种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彼此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多维联系与相互作用，则相对不够重视。某些结论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按一种可望成功的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办事，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富强便可一步到位，其他失败的尝试都不过是浪费表情，“行不通”则不啻不该搞。经过解读之后的那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戊戌变法运动似乎就曾给读者以此类印象。虽然那种拿辛亥革命的成功来有意贬低和否定戊戌变法的史论已罕见旧话重提，但突出暴力反清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而淡视政府改革行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强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关系而淡视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相互作用之类学术倾向还是存在的。至于有的学者以理想化的改革前景为依据来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无异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当别论。

解读历史既要从历史条件出发，又要适当避免客观主义；既要克服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倾向，又不能无视历史效果，

避免崇尚空谈和唯意志论，这些都是不大好处理的矛盾。历史人物的觉悟、能力与技巧容有高低，但历史条件与历史时代往往很难超越。不同的时代孕育出不同的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如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史学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作用无限，这是可以肯定的。后人的觉悟、能力与技巧一般都有可能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地位不可逾越，因而也无法取消。不管怎样，甲午战败对“东方大国”这最后一点体面的摧毁（以往西方列强所摧毁的是天下归宗的“天朝上国”的神话）所引发的席卷朝野的改革思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康梁一班爱国书生初涉政治舞台所抖出的豪情万丈连同其浅显与幼稚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而且属于一个时代，甚至属于一个可望连绵的社会群体。至于戊戌变法所造成的社会启蒙的空前效应与影响，并不因慈禧一伙的专制淫威而遭泯灭，这种效应与影响又是中华民族觉醒与社会进步的历程中不可或缺的。

百年沧桑，物换星移。“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景观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既有历史的前进，也有支撑前进的历史的赓续与关联，并非浪与浪之间的断裂或后浪对前浪的替代。其实，人类的历史进程又往往比大自然中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要复杂得多。至少康梁师徒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并不因戊戌变法的夭折而偃旗息鼓，尤其是梁启超告别师长而后来居上的姿态使他在本世纪前10年的政治风云中成为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民族精英（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新民丛报》停刊而夸大君宪方案的失败）。梁氏与同盟会之间的政纲之争与派别之争并不影响其民权思想的启蒙之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戊戌宿将梁启超等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同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者作不懈的斗争，清皇朝的垮台与辛亥革命的成功将要困难得多。如果没有梁启超与《民报》作者群之间的笔战这一环，辛亥革命的反满种族主义色彩还要浓得多。

近十余年来，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很有起色，这在较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

部分学者坐冷板凳，啃硬骨头，对某些重要文献的真伪与有关历史真相作了行之有效的考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史料的挖掘与厘清仍属当务之急。例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是后世学者经常引用的资料，其中不少见解几成定论。只因作者本人又是当事人，不仅掌握现实资料有困难，而且利益原则等因素的制约，使梁著不乏主观臆断甚至有意隐瞒和曲解历史真相，至今还缺乏全面考订《戊戌政变记》的学术成果问世。至于政变之后康梁等人的不少活动也还存在谜点，亟待澄清。

改革的历史与现实的改革 ——戊戌维新百周年感言

□汪叔子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一、历史与现实，不应作简单的类比

百年前许多维新派曾作过许多这样的类比，他们称之为“比例”。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每章都是“实理、公法、比例”三段式论述。《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也有坦率自白：“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他们满怀爱国热忱，从中外历史中急匆匆寻找，从孔子“素王改制”到日本明治维新，取来“比例”当时中国，从而设计并宣传维新改革。

他们的宣传工作确曾有大成效，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确曾有大贡献。在这一主要方面，学界已有不少论述。

但还有尽管次要却又不容忽视的方面，他们的宣传工作也有大缺点、大遗害。无论世界文明历史还是当时中国现实，他们“知其浅也”，却急匆匆“据虚理比例以测之”，如此“测”出来的维新改革蓝图自然行不通。而且，这种“虚理比例测之”的浮躁学风坏影响甚广甚久，如“文革”中林彪所谓“学习方针”，即是一脉相承。此

种反面教训，也需认真总结、引以为戒。

二、历史与现实，又应该且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

近代以来改革进程，戊戌维新如初澜，当今改革如大潮。时空有别、条件不同、性质尤异，不应也不可能作简单类比；但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作为社会改革实践，又必有其共通的发展规律可寻。于是，才需要深入总结戊戌维新等历史改革经验，以为当前现实改革的借鉴；同时，对现实改革的感知认识，也为深化戊戌维新等历史改革的研究，提供着新的思路。犹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由此而反思建国以来的戊戌维新研究。如对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学界论说很多；相比之下，对当时维新的社会改革实践，研究是否有待加强呢？甲午战后短短数年，便把“维新”推高到了“国是”地位，诚然有《时务报》等宣传之功，但最坚实最重要的力量，是否还应在维新改革的实践成效，尤其像三湘新政那样成功的实践榜样所发挥的强大号召力与不争的说服力呢？若然，则可否这样说：康有为十大纲领也罢，梁启超笔下带有魔力的万千文字也罢，还真比不上陈宝箴三湘新政的哪怕一步实际行动呢？

又如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新旧之争，以及维新派内部之争，历史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越“新”就越好呢？或即以康梁、康党来划线呢？还是应以能否符合当时国情需要作基本标准，旧之所以必破，因为不符于此；其时新论百出，亦须以此来分析鉴别呢？就像形势大好的三湘新政，一度却几乎搞到了“绝处”，（谭嗣同《致李闰书》）旧党反扑自然是大原因，不过，康派梁赴湘推行“以种族革命为本位”的“急进法”，（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该不该也有点责任呢？

如是等等，思感纷纷。愚者千虑，冀或有得。谨效抛砖引玉，敬祈方家教正。即此以为戊戌维新百周年纪念。

戊戌维新研究大有可为

□宋德华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匆匆过去了半个世纪。通过前辈和后世学者的不懈努力，戊戌维新研究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史实的考订与辨析，还是在大部头专著出版，高质量论文的发表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近20年来，这段历史的研究受到改革开放大潮的有力推动，在一些重大方面能够克服以往存在的某些倾向性的偏差或局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突破人为圈定的关于“改良”内涵的固有限制，切实按照历史事实本身的内容来为维新运动下定义。以往评价维新运动的性质总少不了加上“枝枝节节的改良”、“点点滴滴的变革”一类的字眼，究其根源，与套用某些经典定义不无关系。对此，新论者们既从理论上对长期混淆不清的“改良主义”与“改良”的区别等进行深入辨析，又从史实上对维新派力主大变全变乃至密谋发动军事政变等加以系统考证，以证明戊戌年的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根本性。有的论者甚至提出了戊戌维新亦可称之为革命的观点。二是突破盲目性很大的关于革命必然优于改良的思维定势，还维新运动以更为合理更为恰当的历史地位。非历史主义地抬高革命而贬低改良，以革命作为标准来评判改良的是非功过，曾是戊戌维新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习以为常的偏向。在反思这一偏向的过程中，论者们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革命与改良不存在可以脱离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的优劣性，搞革命还是搞改良应视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性而定；评价改良的是非功过只能根据其本身社会实践的综合性的结果，而并起或后起的革命都不能成为评判的标准。从这种共识出发，维新派在戊戌时期的历史功绩得到了更充分的认定，其历史局限

得到了更科学的说明，对戊戌维新失败原因的分析亦能跳出某些一成不变、颇为牵强的旧说，提出了一些更合情理的新见。三是突破某些简单化、片面化的研究方式，全面、辩证地评价维新派和维新运动。过去研究中对维新派和维新运动所下的简单片面的结论是不少的，如说维新派主张开民智就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主张联络外国就是对帝国主义缴械投降、主张保皇就是堕落为反动等等。通过辨析，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维新派确实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开民智的积极意义；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认识不透，但决不等于他们连爱国与卖国的界限都分不清楚；维新派的保皇更是有特殊的原因和特定的内容，完全不能与“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相提并论。关键在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更多地应从维新派和维新运动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来理解，尤其应分清主次轻重，现象与本质，不宜顾此失彼，偏执一面，主观臆断。除了以上重大进展之外，围绕戊戌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慈禧对戊戌变法的基本态度等重要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亦表明了戊戌维新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良好势头。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确信，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经过史学工作者们的进一步努力，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放开眼界看“戊戌”

□ 郭汉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建国之后，这一课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形成了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出现了一些知名学者。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范围从百日维新扩大到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新闻出

版、科技学术以及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领袖人物的探讨扩展到光绪帝、翁同和、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统治阶层代表人物的剖析，从而把这个历史事件当作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加以分析，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通过史料的发掘和考辨，人们对《戊戌奏稿》及所反映的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对光绪密诏、袁世凯告密、康有为戊戌密谋等一系列早有定论的问题又有了新的、然而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对于在这些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我们理应表示敬意。

然而，也要看到，在以往关于戊戌变法、特别是在有关这一事件的人物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首先区分政治派别，如所谓后党、帝党、改良派、洋务派、顽固派等等，然后按照一定的、先入为主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去描述其思想主张与社会活动，再进而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凡属“帝党”和改良派人士，则肯定之，颂扬之；凡属“后党”和顽固派人物，则否定之，批判之；凡洋务派人士，则贬多褒少，形成了以人划线、以派别定功过是非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和分析方法制约着对戊戌维新运动作更深入的研究。因此，需要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广一些。

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改革运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实际上是、也只可能是一种政府行为。因为改革本身，不管是兴利还是除弊，不管是破旧还是立新，实质上都是权力、利益和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必须经由政府调整政策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才能得以实现。很难设想，不通过政府（包括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政策的调整与贯彻，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因此，必须很好地研究戊戌变法过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政府决策及其贯彻情况。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维新派人士的上书、章奏和宣传活动可能产生过重大影响，二者有一定的互动关系，但决不是一回事。维新派大都是在野士绅和下层官僚，他们人微言轻，政治

影响有限，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宣传鼓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决策是值得研究的。若把他们视为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把他们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等同于改革本身，恐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戊戌变法是在甲午战后朝野上下求变思潮推动下发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新闻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际上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化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包括朝野上下各种社会阶层的人们，除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外，还有开始觉醒起来的广大官吏和绅商。甲午战后，一系列的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的创办，一系列近代文化事业的兴起，诸如学堂、报刊、学会、图书馆等的涌现，以及近代金融事业、邮政、采用西法整军经武等，大都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实现的。这些人可能不赞成康梁一派的政治主张，与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甚或持有异议，但只要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种举措及所开展的社会活动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利于中国国力的增进与提高，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都应当加以研究，予以褒扬，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我相信，在以往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放开眼界看戊戌，扩大研究视野，在这个领域里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坚持实践第一，重在社会效果 的评价标准

□赵春晨

(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建国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评价，总的来说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在前17年里，由于受“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影响，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虽然

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是又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指责它维护清朝的统治和“与民众斗争相对立”，断言它具有“反动性”的一面，从而影响了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70年代末以来，随着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学术界也得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历史，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摘掉了戴在维新派与维新运动头上的“改良主义”帽子，比较一致地认为，维新是改良而不是改良主义，维新派作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戊戌时期站在时代的前列，勇敢地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统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种基本评价上的变化，是近十多年来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坚持实践第一、重在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所带来的结果。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近代史的研究比较强调事件的起因、人物的动机，好以起因定性质、以动机判善恶，而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社会实际所产生的效果重视不够，对一些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褒扬也往往只是归结到精神的层面，夸赞其“斗争精神”如何如何。这实际是一种纯道德的评判标准。而且，这种纯道德的评判又常同划分劳动者与剥削者的阶级界限联系在一起。一个运动或者一个人物，只要被列入“劳动群众”阵营，其主观意图即被确定为善良、革命的，其所作所为也就成了天然合理的；反之，如果被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则其主观意图或被视为反动、反人民的，或被视为自私、有局限的，其作为要么是倒行逆施，要么虽有点客观的进步作用，总体上却是不可恭维的，即使是这些“剥削阶级”中一些在当时原本属于社会进步因素的力量和个人（如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也会被划出“人民群众”范围之外，经常需要讨论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这种评判标准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脸谱化了，同时它也夸大了道德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历史事件和

人物活动的社会效果，尤其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以此来评判历史，显然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我们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对于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偏颇，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认为今后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深入研究，应充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思路，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对于包括维新派与维新运动在内的一切历史事件与人物，既要弄清楚其起因和思想动机，作出道德的评判，以起到扬善击恶、教育后人的作用，又绝不能止步于此，而应深入、具体地考察其在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效果，看它们是顺应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是违背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了生产力。而且，对于社会效果的考察，也应当着重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发展变化上，而不是笼统、抽象地谈论所谓的“斗争精神”云云。

攀登成熟学科分支的新高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戊戌维新运动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100年来，这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民族命运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课题。特别是近50年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取得较多成果的重要分支，国外有关学者也对这场运动予以重视。在关心中国历史问题的其他理论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当中，这个多姿多彩的革新运动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众多的专著、论文和资料的发表与出版，有关的问题一再形成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多次专题学术活动的开展，这些都表明，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已是发展得相当成熟的学科分支。

正因为如此，对这个专题做进一步研究，使这个学科分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就有了很好的条件。这里笔者不揣谫陋，就以下两点谈些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已有的学术成果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作进一步探索。现在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戊戌变法当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影响下的一场旨在使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运动。可以说，这是我们考虑维新运动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是戊戌维新史研究取得众多成果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此不应否认。但在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自身有没有一些内在因素，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出现与开展起到这样那样的作用？如何考察这些因素并使之得到清楚、具体的认识？像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那样，鸦片战争前，已有中国人留学西方，鸦片战争后，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考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广泛了解者。但我们都知道，在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宣传家当中，除严复以外，都没有与西方社会进行直接的接触，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产生真正深刻的了解。但正是他们，发起了这场伟大运动。这个事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原来一直强调从“西方的冲击”的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变迁的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界，近些年转而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倡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近代历史演变的原因。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上的转向自有其内在原因，所论并非尽当，我们不一定去模仿，但其合理的方面应加以参考。

其次，我们应注意利用已有学术成果，更加注意研究的对象与基本社会背景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即戊戌维新运动史和维新时期中国史的衔接和融合。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们习惯于将中国近代史研究集中于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运动，这样可以使我们通过对各个时期历史主题的把握来理解整个近代史。但如果对各个时期处于这些主题之外的、比较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背景的具体状况及其演变，也作出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将能使我们更全面

地认识近代历史的演变。戊戌维新时期除了西方侵略、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生等历史背景以外，中国各阶层、各群体、各方面的具体情形，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演变的区域差别，等等，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有了一些了解，但一般还是围绕论证戊戌维新运动的有关问题来进行。同样，在人物研究方面，基本上也还是集中研究著名人物，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人物，而对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政治人物、学者和文化人，以及一些有区域性影响的人物，则

研究不多。但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著名人物的活动，都是在那些基本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如果能够以现有成果为基础，对上述问题作更具体系统的探讨，使凸出在人们眼前的维新运动史能有机地镶嵌在它赖以开展的基本背景之中，将能使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从而也加深对这个运动本身的认识。

也许在这些方面作些努力，将有助于消除戊戌维新史研究已到尽头的感觉。

本栏责任编辑：郭秀文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8年9月15—17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南海市召开。本次会议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南海市人民政府、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康梁研究会联合主办，来自内地及港澳的近10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是次盛会。与会者围绕康有为的思想和历史地位及与戊戌变法有关的人物、事件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人物方面，大多数学者围绕康有为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以往在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研究中，存在着某种忽视其自身内容的完整性、互补性和内在统一性而片面加以取舍、分割乃至曲解的倾向。其实康有为的变法指导思想可略分为必变大变速变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它们回答了要不要变法、何以变法和变法的最终目的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既反映了其先进性，又显露出严重的局限性。有的学者对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的基本出发点、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有学者把维新时期康有为与传教士李提摩太对教育改革的主张进行了比较。另外，也有学者对康有为与廖平学术思想的关系及其与诠释学的关系、在海外的活动等进行了论述。关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近代改革虽不始于康有为，

但是康有为最先把西方政体引入中国以实行君主立宪，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者。此外，对维新运动的其他人物，如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梁铁君等也有人论及。

关于戊戌变法，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启蒙运动，启蒙就是开民智，它包括开绅智、开官智乃至开君智。但维新派忽略了“开后（慈禧）智”，对老百姓的“智”也开得不够，故而失败。还有人认为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观上是因为维新派变法态度过于激进，客观上则变法条件不够成熟。更有人认为既没有破坏变法的后党，帝党也不存在，之所以发生政变，是因康有为未受重用遂密谋杀慈禧而使矛盾激化。有学者通过分析认为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还有学者对戊戌维新派的地方政制观进行了阐述。有的学者则回顾了康有为等人于百年前推动变法以来我国政治改革所走过的路，总结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与会学者认为，维新运动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运动，是民主革命的序幕，具有超越前人的历史进步性，而其最主要的功绩在于思想启蒙。维新运动使教育走向了近代化，并推动了近代精英文化。

（郭秀文）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座谈纪要

□本刊记者 韦 前 湛 明

珠江流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我国现有经济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务院提出“九五”期间要加强东中西三大地带开发，表明深入开展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对于充分发挥沿海、沿江地区的优势，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和振兴，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深远的意义。由梁钊、陈甲优同志主编，两广地区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著的《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一书已正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详尽分析了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经济结构与布局现状，深入探讨了珠江流域的区域分工合作关系，提出了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立足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环境生态学等多学科层面，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拓展了流域市场经济研究的新思路，填补了我国珠江流域经济研究的空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社科联、《学术研究》杂志社邀请广东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座谈，专家学者们对此书的学术价值、鲜明特色以及现实意义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某些篇章的更加完善，更为科学准确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现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座谈发言摘登，以飨读者。

梁钊（中共广东省省委党校教授）：我来谈谈《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的成书经过。

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河流，平均年流量仅次于长江，地跨云、贵、湘、赣和两广，西江、北江、东江奔腾而下，汇入珠江三角洲，注入南海。珠江流域社会、

经济、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形成中西交融，绚丽多彩的岭南特色。自古以来，以流域为载体的交往、交流，也日趋频繁，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外辐射功能。为了加强流域间的合作、交流，相互促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需要。1990年在中南、西南片等省级党校科研协作会议上提出：调查研究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课题，当即组织了广东、广西两省（区）党校和社科联20多位同志参加。

在两省（区）间开展相互调查、考察，一部分同志还深入到云、贵调查研究的时候。《学术研究》1990年第二期，刊出了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课题组应香港当局的要求，作出关于香港经济前景问题的研究报告《共建繁荣》的部分译文。报告不但强调要保持发挥其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功能，同时还尖锐地指出：“孤岛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报告明确提出香港应实施与南中国新的互补战略，香港可以从华南经济区成员逐步一体化过程中得到益处。该报告对开展珠江流域研究，开阔了视野，使流域研究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之中，加强了流域对外交往和与港、澳、台合作交流方面的研究，使流域间互补协作战略的探讨，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初步确定了该课题的主要内容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流域经济结构与布局现状；流域经济的分工合作关系。共三篇30章。珠江流域研究课题组成立不久，就申报国家“八五”期间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并获得批准立项。

1991年冬，广东、广西有关领导和珠江水利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云、贵、两广以及北京的专家学者100多人云集广西梧州，召开首次研讨会，研讨会的论文汇集成《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一书出版，取得了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1992年于广西南宁市召开两广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对两广改革开放与发展战略、流域分工合作，作了进一步探讨。使该书形成的初稿内容进一步补充、修改和充实。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适应形势的发展，1994年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实施建设现代化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战略，从而加强对流域的辐射，突出了珠江的龙头建设和流域合作，市场开拓与资源优势互补，将会使得流域更加开放。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历6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刻苦努力，终于完成了《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这部书。

该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广东、广西省委（区）党校、社科联、珠江水利委员会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成书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文献资料并汲取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借此机会，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该书的出版，只是为珠江流域整体研究开了个头，迈出了第一步。珠江流域是南中国的重要经济区，珠江流域的研究与开发是一个应该长期经营的重大课题，任重道远。我们期待着对流域研究和规划的进一步加强，期待着国家对流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产业布局和统一综合开发计划的制定。新的世纪即将到来，跨越新的世纪，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

李本钧（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有几个特点：一

是把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放到历史的演进过程来考察，放到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来考察，把经济的发展、人文地理关系、民族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研究的空间比较宽，涉及因素多，时间跨度大，协作人员多，其本身就在向我们提出了当代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打破学科限制、单位限制，共同分析研究经济社会相互联系的现象和规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探索。二是提出了当前区域经济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流域中心的评价、中心所要具备的条件、流域经济形成的机制、协调流域经济的方式方法等。三是探讨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协作，旨在揭示其与区域市场体系的关系，促进珠江流域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从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我们当代，区域分工协作理论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家提出“九五”期间加强东中西三大地带开发，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基于人文地理实际，历史地形成的区域分工，随着劳动、产业知识的累积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有所发明创造，区域分工变得越来越和谐，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合作的研究更加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

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如何深入研究珠江流域中的广东地位与作用，探讨广东经济从江河文明走向海洋文明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趋势、发展对策，总结其中一些规律性现象，给人们一些启迪。历史上，世界四大古国都形成于大河流域，在大河流域繁衍生息。近代工业的兴起，沿海地带经济的开发与发展，成为人类经济文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一度成为社会文化主流的大河文化逐渐让位于海洋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外交往的进步，河流经济、河流文化逐渐衰退，而兼容百川的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日渐发展壮大。历史表明，人类的经济文明有一个从江河经济、江河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过程。在我国，中华民族几千年经济文明的演进与黄河流域息息相关，

沿河遍布古文化遗址，可以想象当年黄河流域的繁荣和昌盛，今天黄河流域和沿海相比，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这里反映出人类从江河文明走向海洋文明，有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兼容问题，而兼容应首先是江河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兼容。珠江流域从源头贵州、江西、云南开始，历尽坎坷，流向大海，而在出海口处的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全省走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列。把广东经济和珠江流域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研究不仅仅是区域协作研究，实际上是在寻找、探讨中华民族从江河经济、江河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历史规律性问题。近20年来，广东行风气之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实现由江河经济、江河文化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转型过程中，先行了一步；广东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说又对珠江流域形成逆向影响，从而构成一个整体。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珠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落差，珠江三角洲经济走在全国的前列，其他地方还比较落后；经济发展的落差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梯度。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要多作比较研究，如我国几大江河流域的经济、文化比较，加强对梯度理论及其与共同富裕道路等问题的研究，从而使流域经济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张磊（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这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于区域经济研究，无疑是社会科学中方兴未艾的领域。有关这类课题的研究，往往难度颇大，因为涉及到社会历史、自然环境诸多方面，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能奏效。该书正是集中了两广地区的数十位专家，联合攻关，历经5年余的艰苦探究，才完成了堪称首部全面系统研究珠江流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专著。

该书的优长在于：首先，作者把经济的发展与历史的演进、自然条件、资源状况乃至文化、民族关系结合起来考察。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使作者能够避免了偏颇和孤立的倾向。其次，该书提出并回

答了一系列有关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区域经济的形成到区域经济的运作和协调等。再次，该书对重点所在——珠江流域的经济布局、现状及分工合作问题，分析深入，论述中肯，对实际工作有着指导意义。

当然，该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正如梁钊同志所指出，这只是一个开端。珠江流域研究，任重道远。需要加大力度，把这项研究工作深化和拓展下去，我们期待着新成果的问世。

曾牧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很值得重视与研究的课题。记得1991年梁钊同志申请立项时，正值全国讨论珠江三角洲热，课题很快就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被批准了。当时我想，要搞好这课题不容易，因为这不光是广东的发展问题，而且涉及珠江流域上中下游多省区，组织调研工作、协调工作相当复杂。结果是，经过几年的努力，课题圆满完成了，成果也出来了。读后，感到很高兴，研究是成功的，应该说，这是我国建国以后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著作。

值祝贺该著作出版之际，我想谈一点想法，这就是如何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跟踪、深化研究，使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具体到该课题，就是要进一步研究中心城市在加速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上中下游发展不平衡问题。我认真看了一下地图，在珠江流域，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不少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作为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广州，有史称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市，有被称之为广东“四小虎”的中山、东莞、南海、顺德市，有在19年前崛起于边陲渔村小镇的经济特区深圳市、珠海市，还有令世人瞩目的香港和澳门；在珠江流域中下游，有地处珠江三角洲西缘与西江下游交接地的肇庆市，有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与东江下游接合部的惠州市，有珠江三角洲北部与

北江下游交接地的清远市；在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区，有地处西江中部，为广西最大工业城市的柳州市，有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区会的南宁市，有“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有地处桂东南的梧州市、玉林市、北海市等，还有一大群中小城镇。问题是这些城市没能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想，如这些城市能通过紧密的物产流通、商品流通、资本融通、信息交流，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又互相促进的城市网络，或者是形成一个以广州为中心城市，以其外围中小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整体，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上一个新台阶，珠江流域也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想，可以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以城市网络等专项调研和多种小型研讨会的形式，进一步深化研究，同时支撑现有成果。

李蒲弥（广东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下称《概论》）一书的出版，凝聚着跨区域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研究心血，其所起的启迪与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作为一本区域经济或流域经济研究成果，正如该书绪论中所述，“旨在通过对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大量调查研究，全面、完整、系统、准确地反映和描述流域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状况，从中发掘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特征，揭示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并依据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有规律，展示珠江流域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为此，可以说，《概论》是区域经济或流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指引。

对当前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两种现象是不能忽视的。一是经济发展起飞较早、较快的地方均在流域的出海口地带，如长江、珠江等三角洲，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形成由东向西的强劲的辐射能力。这一特征，值得我们理论研究工作者关注与重视。由珠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又引出西南、中南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依托问题，

忽视这一依托而盲目地考虑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许会付出不应付出的代价。二是香港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内地的示范效应。香港作为一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城市，其开放型经济发展在广东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对广东6000万人口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香港的经济效应放大了10倍左右。假如说，这种现象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话，那么，能否再把视野与思考放宽一些呢？广东6000万人口的区域经济发展能否同样放大10倍左右，对6亿人口的经济的发展构成影响呢？这或许是一种幻想。但不管怎样，对上述两种现象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即：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从沿海地区开始，其后经济迅速走上多元发展的轨道；香港与广东经济的发展互补，关系与作用将变得越来越强。

那么，《概论》一书对流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指引，除了其以丰富的、全面的资料归类、比较，以及对经济分工合作关系、协调发展、流域经济合作建立有详细的阐述外，同样吻合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的客观实际。可以设想，如果铁路干线能从广东的肇庆连接广西的梧州至南宁，与南昆铁路贯通；高速公路从广州开通到南宁，加上珠江流域的水路网络，形成铁路、公路、水路，“三条巨龙”协调的大通道、大网络。那么，西南地区部分专家学者在以前曾提出过的建议又必引起争议。“东进发展战略”应该说是比较切实可行的，经得起理论与实践的检验的。

李超（广东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概论》（简称）是一部好书，它由两广著名的社会经济学者合作而成，它不仅精确地阐述了流域地理、人文、经济、社会的沿革发展，集众多学科知识于一体，而且对加强两广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合作，提供科学的依据，指明方向，具有较好的启发性与可操作性。

流域发展史是两广合作的历史。珠江流经8省区（含香港、澳门），尤为两广的母亲河，润育岭南文化、经济。随着历史

的变迁，流域形成了渊源流长的互补性和合作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随江而走向文明，走向国际化、现代化。尽管流域作为运输功能曾不如公路、铁路为人所重用，但其因开发潜力大，何况水是人类生存之本，所以流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是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主要集聚带，流域总归是经济发展合作的重要通道。

现代化建设中流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更显重要。众所周知，香港成为珠江流域经济龙头，它与流域已成为梯度发展的格局，流域各地要充分利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对中上游地区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为此，国家计委在区域划分上，提出了以珠江为界，将珠江以西作西南地区，其意也在把珠江作为带动我国西南经济发展的纽带。1997年国家扶贫办公室将两广结为扶贫对子，正是考虑有利于流域经济合作发展。扶贫工作除资金扶持外，流域性的开发扶持也重要，发挥流域互补的优势，建立经济合作促进脱贫的路子大有文章可作。随之，广西曹伯纯书记提出东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意在尊重历史，以发挥流域经济和社会各种资源早已紧密合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西接受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是符合两广经济合作的实际，比独辟建立北海大西南通道的做法，又多了一条思路，十分有利于两广发展的协调与合作。

流域经济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珠江径流量居全国四大河之第二位，如何治理、保护和开发好，是关系到流域近亿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大事，因此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防治污染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协调发展流域经济。全流域发展要统筹规划。流域经济合作，重点是下游带动中上游，要逐步形成互补性强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链。强调产业转移，但防止污染中上游。流域经济合作首先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改革开放以来两广开始“西电东送”的合作，以此带动中上游地区发展，今后还要考虑建设以水运为主导的沿江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城镇体系

和通讯设施建设等，改善投资环境。其次，大力发展农业。尤其是结合当地的资源和气候特点，开发市场，大力发展“三高”农业，使广大农民致富。再次，利用沿江发展商贸业，促进流通，活跃经济。第四，研究市场开发各地资源优势产品。资源相同的地区要走联合开发路子，避免走上浪费资源的恶性竞争。第五，发展旅游业。沿江具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不仅可以陶冶游人，更可交流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

总之，拜读“概论”得益颇多，回味无穷，但我最赞赏并希望更多的是两广人民与政府努力实践作者关于加强两广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创未来更辉煌的愿望。

黄家驹（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到了90年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原来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3省市行政地区来规划地域发展的格局已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跨地区以自然资源和经济优势按生产要素的优化结合的区域合作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以及由此产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对全国社会安定带来的不良影响，已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80年代以来一直倡导“先东后西”、“先沿海后内地”的“梯度发展战略”已被90年代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所代替。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中央明确提出区域发展应以“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分工合作”为原则；加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变化，我国实行的是从东到西、从沿海沿江到沿边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也给区域发展带来崭新的内容。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正处在战略和格局调整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正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层次的时候，梁钊、陈甲优同志主编的《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一

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详尽地、全面地、历史地介绍了珠江流域社会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突出地分析了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开发开放的战略构想，阐明了珠江上中下游产业结构分工协作的格局，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发挥龙头作用等等。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现就此谈几点认识。

一是深刻分析了珠江流域的区位优势。在我国区域经济划分中有以区域空间来划分如东中西部区域，有以全国各大中心城市辐射面来划分，如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经济发展区域，有以沿海沿江区域协作来划分，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到渤海地区等的区域协作发展。多种区域划分虽然从不同角度出发，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区域协作互补的优势。而只有充分认识本区域的区位优势，才有利于制定合符实际的区域发展战略。该书在第十章《珠江流域开发的特殊地位》中对珠江流域的区位优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珠江流域应着重发挥五大优势，即地缘优势（祖国沿海南疆毗邻港澳及东南亚）、华侨华人优势（海外华侨华人占全国总数70%）、体制优势（得改革开放之先）、地位优势（承东启西，是中国大西南资源富集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人才优势（人的价值观以巨大变化与市场经济意志的增强）。在各章中对五大优势提供了丰富资料。

二是明确提出珠江流域区域发展战略。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是长江流域沿海地区发展相对平衡，而珠江流域则上中下游差别很大，因此该书提出珠江流域区域开发的指导思想是：加快以珠江三角洲为龙头的珠江流域经济开发，形成以江河流域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在沿海中心城市带动下，形成珠江流域大通道，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流域腹地为依托，形成两个扇面的辐射功能，造成潜力巨大的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流，从而加快各个流域实现现代化的步伐。总的来

看，其战略思想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为龙头，正确处理好龙头、沿江工业走廊及广大腹地的关系，这样把对外出口同广大腹地开发联结起来，有利于优势互补。为了实现上述战略，该书作者提出几项战略措施，（1）要理顺珠江流域经济内外关系，包括珠江三角洲与港澳东南亚关系，以及珠江流域港澳合作推进到上中游地区发展的关系；（2）建立沿江工业走廊；（3）确立梯度渐进的产业推进战略；（4）合作采用多元化方式及照顾不同地区的经济利益等，都是很有见地的。

三是从实际出发规划整个珠江流域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生产力布局必须从实际出发。珠江流域的重要特点是上中下游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大，考虑生产力布局时必须注意到各地区的优势互补。为此该书作者提出产业要向沿江一带聚集，并带动沿江两岸诸多大中小城市和集镇发展的战略构想；至于沿江不同部位的发展重点，该书提出上游地区应主要发挥资源优势，中区地域（例如西江）应建设工业经济走廊，下游珠江三角洲应致力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构想，并以此构想出发提出了各区域部位应发展何种产业。上述分析对整个流域各县市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四是提出珠江流域对外开放新格局。地缘优势无疑是珠江流域的重大优势，这里拥有众多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机遇大于挑战。该书在分析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珠江流域的重大影响后，着重指出，珠江流域对外开放格局应实行全方位开放，积极加强粤港澳合作和同东南亚周边国家合作，协调整个流域的资源技术优势，加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向型发展。该书作者提出广州在推进经济国际化过程中，要成为整个流域的几个中心即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智力中心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心，珠江三角洲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龙头作用，就必须首先实现本小区的区域协作，努力做到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五

个统一（统一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一产业布局、统一协调城乡建设、统一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统一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带动整个大区域优势的发展。

目前从《概论》的角度写区域经济的书似不多见，该书起了带头作用。有一个问题即可持续发展问题，该书谈得太少，是美中不足，建议修订时加以补上。

张元元（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读了《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后，有许多感想。在此我想谈两个观点。一是要深化对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据我所知，上海非常重视长江流域与其它流域发展的比较研究。其它地区的研究人员在我国几大河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现有成果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前段时间，暨南大学与其它一些研究机构一起搞过一次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比较研究，反应很好。这是继上海举办第一次研讨会后的第二次比较研究研讨会。看来，比较不只是两个三角洲的比较研究，还要有两个流域，甚至是多流域的比较。值此，我提个建议：以该著作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两大流域的比较研究。这同时也是对该书的深化与完善。通过对不同流域的比较，发现不足，对不足进行补充、完善，原先没考虑到的，或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法研究的，就设法跟上。在比较中提出新问题，进而从理论上扩展，使各部分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成果更臻成熟。我想省外研究工作者对我们这种比较研究也会感兴趣的，通过互相取长补短，在比较研究的比较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二是要把社科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该书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广东，还有广西、云南、贵州等，它的出版对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要把其中一些学术观点融化到现实经济生活中，融汇到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转化为政府行为。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地处流域上游的广西的发展思路正发生新的变化，

据说已开始从以北海为突破口的南下发展战略转到以流域的发展带动上来，根据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从现实问题分析中找寻发展新思路。该书的出版正合时宜，为广西的这种战略转变提供理论依据。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我建议，更广泛地把作者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对类似课题有研究的人员组织起来，进行更深入的、综合性的研讨，形成进一步的成果，把学术成就、学术观点转化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融汇到流域内各省区的发展战略上，转化为政府的发展思路与政府行为。

张启人（广东工业大学教授）：珠江绵延 2200 余公里，流经物产丰盈、民情朴实、气候温和、多濒临边境的五大省区，境内流域覆盖 44 万余平方公里。我国 56 个民族大部分在这里繁衍生息、世代相传、和谐共济、相得益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滥觞；长江是中国经济早期开拓的源流，文人才子荟萃的福地。而珠江，则是中国近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 20 年来，整个珠江流域建设热火朝天，波澜壮阔；人民意气风发，共臻繁荣；政府励精图治，锐意创新。于是，创造了我国四大流域（含黑龙江流域）中经济发展最快、产业升级超速、市场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

然而，与长江流域发展状况相比，珠江流域除更多地强化了资金投入、劳力投入、资源投入和环境“投入”之外，主要有两大不足：一是经济一体化方面远逊于长江流域，后者在产业跨省、跨地区融合或合作、信息网络连通、人才优势互补和资源综合利用与共享上明显地优于前者，已经并继续取得斐然成绩；二是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资源消耗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与长江流域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近年来酸雨肆虐已成为珠江流域广大地区最令人忐忑不安的环境问题之一。

由此可见，如何凭借珠江流域各省特有的人缘、地缘优势，依仗优势互补、众

煦漂山的精神来加强沿江几省区的经济、人才协作并形成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以赶超长江流域，以及如何促使人口、资源、环境、精神文明与经济协调地、相辅相成地发展，或即如何保证珠江流域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是福荫子孙万代的，便成为珠江流域各省的当务之急！

著名经济学家梁钊、陈甲优主编的《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问世，标志着珠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拉开帷幕，人们正期待着祖国南方花团锦簇的大规模流域经济早日到来。

郑英隆（《学术研究》杂志社副主编、副研究员）：我的话题想从一种感觉开始。据我的观察，人们在谈论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话锋转向珠江三角洲，或把研究的视点聚焦在珠江三角洲上。从对有关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文献检索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珠江三角洲发展中的政策优势、人的商业观念优势、市场领先优势、外资外技因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也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但把珠江三角洲放到整个流域中去研究明显不足。《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一书，特别是最后一章，鲜明地把三角洲定格在整个流域中一个典型个体进行分析，讨论问题，展望前景，显然是一篇力作。珠江三角洲的未来发展问题，必须放到珠江流域整体中，放到珠江与南中国海接口，甚至更大的环境中才能说得清楚。因为人与环境密不可分，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环境因素。

国家倡导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要求我们必须从理性的角度，从全球范围，对人与社会、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性研究。但从科学的角度看，研究成果必须是可检验的。为此，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里研究，使研究在一个确定的边界范围内具有可检验性，也许更有启发意义。

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实现由传统的计划

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但要使“到那里去”的目标指向取得预期的成功，必须清楚我们“从那里来”，并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平滑的衔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必须首先在市场经济的源头问题上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源头应是两个源点的结合，一是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逆反中产生市场经济的源点，一是作为自然经济历史演进的结果而形成的市场经济源点。打开人类文明演进史，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上，流域的源头随着由上而下的江河给下游无偿地送来了大量肥沃的土地资源，使下游的土地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建立在剩余产品增多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经济因之而发生，自然的市场经济源点也就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具体到珠江流域来说，市场经济的源头在珠江三角洲，在城乡结合部，在由大量的乡镇企业组成的经济主体群，它们培育出堪称珠江流域，乃至中国大地上“先富起来的一族”。但溯流而上，水域的源头却是一种“富饶的贫困”景象，这里自然资源丰富而社会经济贫穷。这就产生了两个极端：一个是从自然的水域源头出发的“富饶的贫困”的极端，一个是从下游的市场经济源头出发的“资源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的极端，我暂此把这两个极端称为流域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双极性现象”。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与经济模式转变问题的共同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先富起来的下游地区，应开创一种什么样的通道来取得对水域源头的“资源永续性供给”，而处在经济贫困中的上游又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以资源养资源，以资源求发展”方略的实施，从而使两个极端通过水流与商流的双循环通道的衔接，达到认同、“对冲”。我以为，形成一个以水域源头和市场经济源头的有机结合为内容的流域市场经济模式将为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良好的金融体制与亚洲国家的持续发展※

~~~~~ □ 约瑟夫·斯迪格利茨 ~~~~~

## 1. 弄清现在与过去的联系

最近发生的东亚风波，在一些圈子里，使人们对政府在金融领域里的作用产生了质疑，尤其是对代表该地区发展战略的“公私合营”模式发生了怀疑。有人称它为“伙伴资本主义”，认为国家过多干预投资，缺乏透明度，已损害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信誉。我认为这些批评家们太过苛刻，东亚国家过去在积累储蓄、促进投资以及开发人力资本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另外，这一地区的好几个国家，以中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在抵御这场风暴中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但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这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沉重打击的确引人深思。

有趣的是，那些被认作给目前东亚经济带来问题的因素与过去被解释为东亚成功的原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效地沟通信息，包括通过企业与政府间的协调，被看作是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主要特点。但是，这种协调现在却被看作是政治上的勾结，“缺乏透明度”成了一个导致当今经济出现问题的因素；面向国际市场开放是东亚经济在过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当今的许多改革方案却坚持将清除资本和贸易流通中的障碍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宏观经济稳定，包括低通胀，一直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体现，而韩国却倡导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旨在实施稳定价格的职能；通过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政策加强竞争，曾是东亚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人们普遍认为大企业集团间缺乏竞争是导致目前这场危机的主

要原因之一。最后一点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过去那个能运转巨额储蓄，并有效分配资本的金融市场已变得薄弱了，这一点也被看作是导致目前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东亚过去也曾发生过金融危机。但是，与目前这场危机相比，所产生的后果并不严重，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平息。为什么这场危机规模如此之大，如此难于驾驭呢？对此可以有两种假设。一种是由于私人资本大规模流入发展中国家，全球形势发生了变化。根据这种假设，如果韩国在1980年和泰国在1983年面临的问题没有被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所放大，目前的这场危机将与它们非常相似。另一种可供选择并且具有潜在补充性的假设是：东亚国家已抛弃了那些过去成功的政策。根据这一假设，在无适当规范和监管措施的情况下，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帐户，既引致东亚经济在过去取得成功，同时也带来了今天的危机。

我们努力弄清楚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目的在于它对将来的发展蕴涵着重要的教训。深入、有效、健全的金融体系是增长与稳定的基础。但是，金融市场本身是不可能自动向深入、有效、健全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在直接规范金融体系方面，还是在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以鼓励金融市场上谨慎且有效的行为方面，政府都发挥着根本的作用。

## 2. 金融体系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东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于它的金融体系。它在创造这一地区的高储蓄率和将储蓄向生产性投资分配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 （1）高储蓄

东亚地区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积累速度是非常显著的。全地区的储蓄占整个 GDP 的 1/3，超过任何一个发展中地区，比美国储蓄率的 2 倍还多。单个国家的储蓄率持续高于在诸如人口和增长率等标准经济要素的基础上预测的数字。因此有些人抓住这点，宣称是文化因素导致了东亚的高储蓄。虽然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还是相当片面的。不能用“共同的文化”这一因素来解释东亚过去几十年中的高储蓄现象，它也无法解释该地区内各国储蓄率存在的差异。

政府通过采取经常性预算盈余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直接和间接的政策以促进国民储蓄。政府在金融领域的政策对储蓄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政府采取措施加强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和良好性，进行谨慎规范，增强了储户的安全感，从而鼓励他们更多地储蓄。一些国家的政府，包括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创造了邮政储蓄体制，通过提供安全、方便的服务，有些国家还提供优惠的税收，来帮助小额储户和农村人口进行储蓄。

另外，许多东亚国家政府运用各种金融手段来影响私人储蓄。在大多数经济成功的东亚国家里，政府不鼓励消费者借钱购买房屋和其他耐用消费品，这是发展中国家为增加国民储蓄采取的有力步骤。同时，温和的金融限制，尤其是较低的利率，将人们的收入由大部分用于购买家庭消费品转移到企业里，用作留存利润，从而刺激了东亚国家的储蓄。

## （2）投资分配和生产力的增长

虽然在传统的古典经济模式中，投资与储蓄是由相互独立的因素决定的，但是大多数实证研究却发现储蓄的增加可以导致较高的投资，东亚也不例外。高储蓄率对于其拥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从而带动经济强劲增长一直是至关重要的。

杨安文、金重力、刘劳伦几人的研究，经保罗·克鲁格曼通俗化，认为快速的资本积累实质上是东亚奇迹的全部原因所在。

据他们估计，不论是生产力总要素的增长还是由非资本或劳动力增加带来的其他产出，在韩国并不显著，在新加坡也几乎为零。但是，我认为，在理解他们的结论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即东亚国家根本不存在生产力总要素增长的情况下，这一地区仍能在保持高储蓄率和将资本向生产性用途分配方面显示极强的能力。

下面的一点尤其不为人们所充分认识。总产量函数这一概念已固定于许多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在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将改变一个经济的产量函数，产出将得到提高，虽然回报有可能是在减少。但是，现实情况中，其他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额外资本将流向具有高回报的项目；但是，在一个信息不发达，风险市场不完善，存在着交易成本的社会里，储蓄不可能被自动地转移到最好的投资领域中去。投资于 GDP 的一大部分，这一过程可能导致大量的调节成本和不合理分配投资的成本。事实上，我们已从许多国家的事例中看到了高投资率和生产力总要素负增长的现实。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家，也得承认这样的事实：东亚保持了产量函数不变，这就是一项成就。

但是，东亚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依靠投资。任何一位参观过东亚城市和工厂的游客，都会对过去几十年东亚在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留下深刻印象。杨、金、刘等人的结论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当一个国家在快速积累资本时，对资本构成估计的微小变化将导致截然不同的对生产力的估计。估计这些资本构成是非常繁杂的，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是完善的，然而这个设想至少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内是不恰当的。同时，在衡量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还有，我们必须记住：技术既是投资的原因，也是投资的结果。不提高技术，回报就将减少，也很难相信技术能够持久。考虑到以上诸点，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东亚在最近几十年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生产力增长。

东亚的生产力增长源自许多因素，包括重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要素积累。但是其他政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促进社会包容和技术转让。近些年的出版物对此作了大量分析。下面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集中谈谈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3) 金融与增长

金融体系有点像一个国家经济的“大脑”。它在聚集过剩资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资源被分配到具有生产性用途的地方，如供企业家和建筑工人使用。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能为这些资源提供最有效的使用途径。相反，没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则常常将资本分配到低产出的投资上。选择项目仅仅是第一步，金融体系必须继续监控资金的使用情况，保证资金能得到有效使用。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发挥着多种功能，包括降低风险，提高流动率以及传递信息。所有这些功能都对资本的增长和生产率总要素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金融体系发展的各种对策，包括银行体制的深度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发挥着金融体系在资源分配方面沟通信息的作用。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长期生产力增长的提高，虽然也发现了金融体系对资本积累率产生着微弱的正面影响。

这个结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一项研究发现在 1976 年至 1993 年期间，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处于最高四分位数的那些国家，其 GDP 以年均 3.2% 的速度上升；而那些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处于最低四分位数的国家，GDP 则以 1.8% 的年速度增长。而具有较深刻金融体系和较肤浅金融体系的国家间 GDP 的差异更大，分别为 3.2% 和 1.4%。

金融深度和股票市场流动性仅仅是衡量金融体系发展及有效性的粗略标准。这里也存在着问题，为什么金融体系会深入

或者为什么股票市场具有流动性？如果没有政府介入，金融市场很难变得深入或具有流动性，甚至许多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非常不同，金融市场的弱点也更具有扩散作用。竞争性市场效率的标准理论是基于有充分信息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福利经济学辩护道：如果不对金融市场在生产、加工、分配、信息利用方面做有效的指导，每一项竞争性的均衡都将是柏拉图式的有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理论是有用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没有完善的信息或完整的市场的国家，总体来讲都不是“柏拉图式”的效率，因为她们具有政府干预，能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许多弱点及其补救措施都是熟知的。但是，简单提及一下一些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下面的讨论还是有必要的。无论是股权市场还是债务市场都存在着不利选择的问题。对于股权，企业家们在知道市场已使他们的股本增殖的情况下最愿意出售股份。虽然也有人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但是也必须要有法律保护股权持有者权益和信息公开的情况下，二者才能在股权市场融合。另外，对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监控对于确保企业经理的行为代表着持股人和贷款者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监控不完善，企业就会冒大风险去盈利，或者以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增强其管理。

### 3. 金融体系在东亚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金融体系运转得当，经济就能强劲增长。而当金融体系运转不当时，便会产生经济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缓慢。

#### (1) 东亚金融风暴的起因

和以前的很多危机相比，这次东亚危机的明显不同之处是受其影响的国家宏观经济基本情况都较良好，如高储蓄、小额赤字、低通货膨胀率、外债少等。尽管有些国家（泰国）有较大的活期帐户透支，但其他国家（印尼）的活期帐户透支状况



良好，还有些国家（韩国和马来西亚）出现透支下降。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这次东亚危机。但在过去的15年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重新构建的，对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及其与经济其他方面的关系更为重视。这些新理论被用来分析1929年的大萧条和1990—199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这些理论对于理解本次东亚金融风暴的起因及分析相应的政策对策也大有裨益。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外来的冲击即使是在金融市场调节较好的环境中也会被经济体系所放大，这样带来的消极后果持续时间远长于外来冲击本身。尽管经济政策能在经济波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上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但经济波动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特征。

东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政府的玩忽职守，而是因为私有产业决策使得经济变得脆弱而容易受突发性信心危机的影响。最大的问题是投资混乱（最明显是在房地产投机方面），高风险的融资形式（特别是从国际市场上短期借债）和极高的资产负债率（至少在韩国）。

一些投资的方向错误并不能表明这些国家的体制毫无可取之处。前面提到过这些国家在分配大规模投资上有很强的实力。但近些年来，已经很高的投资额以占国内生产总值10个百分点的速度大幅攀升，在1993—1996年期间，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另外还有一些错误投资是由于一些未预见到的变化引起的，只有事后才看得到（如集成电路块价格下跌）。当然，信贷不当使得某些贷款回收困难，而且即使是经济中某一行业的信贷危机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

东亚国家没采取防护措施而大量积聚短期债务，这使得其经济在突发性信心危机面前显得很脆弱。资本外流加上货币和资产贬值使私有行业的收支更加难以保持平衡。当财政问题引起信贷限制时，这种恶性循环便愈演愈烈，最后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衰退。如果金融体系不健全，经济

滑坡就会加剧破产和信心危机。

这并不是给政府开脱责任。政府政策形成了对私有行业的刺激，促使了脆弱性的增强。这些政策鼓励人们从国外低息借贷，而对兑换利率上的大幅变化很少考虑防护措施。

除了宏观经济的刺激之外，不恰当的金融调控使银行在没有适当监测的情况下过度高风险贷款。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是由于在没有相应加强调控和监督的情况下过度迅速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引起的。在过去的10年中，泰国减少了储备要求，放松了管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章制度，扩大了资本市场可允许的活动范围并且增加了海外借款的渠道。韩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开始消除众多利率控制，取消公司债务融资和跨国资金流动的限制，并且允许在金融业务中存在更强烈的竞争。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好处为人们所称道，但相应的防护措施却没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调控监督的质量有问题，更大的原因是调控体系的结构。建立在风险基础上的资金需求本应该使银行对投资风险更大的贷户收取更高的利息，这样就起到了减少银行风险和过度高风险借贷的作用。另外，很多规章制度和更广泛的政府干预行为，包括税收方面的刺激，实际上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了。

在东亚，金融调控不合理的一个明显表现是房地产业过热，这一点对任何去过东亚主要城市的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这是一个近期现象。泰国以前限制银行给房地产业贷款，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收不回贷款，另一方面是想把钱投到更能赢利的行业中去。但有些人宣称这种限制会影响经济运转效率，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论调的压力，银行放开了这些限制，导致了现在这样的结果。我们要正确看待东亚的房地产过度开发。曼谷和雅加达的商品房空房率在15%左右，预计要上升到20%，与达拉斯和休斯敦的情况差不多，比美国80年代几个大城市高达30%以上的空房率要低得多。然而，这种空房率在

东亚给银行带来的危害和整体风险要大得多。即使银行管理更为得当，只要从国外借贷的宏观经济刺激存在，私有公司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就会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这正是在印尼发生的情况。印尼 2/3 的国外贷款进入非银行私有产业，这个比率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我们不要忘记每笔贷款，包括糟糕的贷款在内，都有贷方和被贷方。由于国际贷方的典型特点是微利，他们在明知对方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仍将款项贷出，同时也由于他们本应有更好的风险管理机制，他们在此次危机或许应负更大的责任。若他们对东亚风险未给予足够重视的话（这一点可由进入东亚的贷款不断增多而证明），他们所负的责任就更大了。

但即使是对风险的抵御力下降了，如果没有资本帐户的全面放开，金融危机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的金融业很薄弱并且非常缺乏透明度，但却并没有受到危机的太大冲击。这些国家的资金帐户是封闭的，至少是相比之下更为封闭一些。

最后，缺乏透明度在把刚传来的冲击转换成持久的经济低迷中起很大作用。本次危机刚开始时，市场意识到很多东亚的公司比先前预想的要弱得多。在没有可靠的信息作参考来区分公司好坏的情况下，银行会限制对所有公司的信贷（或提高风险保证金）。

下面我要就稳定与增长之间的对立与互补关系从两个关键领域来进行阐述：国内金融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通。

## （2）国内金融自由化

近期的研究讨论强调自由化是改善金融体系的战略步骤，这促进了各种各样的自由化形式，如放开国内存贷款率，消除对国内外银行的限制，允许资本帐户的自由兑换。

我认为，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自由化当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我们没有系统地去研究怎样在促进竞争、保护消费者和保证弱势群体有途径获得资金的同时

来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提高稳定，加快增长。放开金融市场是取得这些目标的一部分，但不应该成为我们政策的指导方针。我在此谈谈我的一些想法，作为替代不顾后果的放开金融市场的一种战略选择。

首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取消调控或开放金融市场，而在于建立一个能确保有效金融体系的调控框架。这就意味着很多国家不仅要取消只起到限制竞争的规章制度，而且要补充一些更有效的规章制度来确保竞争和风险意识。

其次，在所有国家调控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给市场参与者以适当的刺激：政府不能也不应对每笔交易进行监控。在银行业范围内，只有在银行主、市场和监督人员都能高效利用他们各自信息并谨慎从事的情况下，全面放开市场才行得通。但要做到这一切却并不容易。即使是管理得最好的体系在风险管理上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如不仅要反映信用风险，还要反映资本风险。证券市场上的刺激也需要给予注意。对于经营者来说，创造经济价值比夺取小股民的资产要更为有利可图。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框架，证券市场就无法发挥其主要功用，这对整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法律来保护持股人，尤其是小股民的利益。

最后，即使是一个理想的金融系统已规划设计出来，在实施转换中还需小心谨慎。隔夜之间突然放开市场的做法忽视了非常敏感的次序问题。次序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我现在只能简单地从三方面提一下。第一，所有的改革都会引起资产价值的变化。尽管根本的改革是很有利的，但因此而产生的资产价值损失及对各个公司和金融机构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扰乱金融体系，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最好要在采取改革措施之前确保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能承受随之而来的动荡。第二，我们知道在很多错误做法并存的情况下只纠正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引起福利水平下降。我们重组银行业的步伐和行动次序关系重大。我们希望最终能取消对所有银行

的保障，但如果作为第一步先取消对一部分银行的保障时，其结果就可能是资金都流入那些仍受保障的银行，这样在整个系统内造成混乱。第三，我们对政治经济方面的次序愈来愈感受到其重要性。在建立竞争机制之前就实施私有化会产生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对随后旨在创造更为激烈竞争的改革起抵制作用。

### (3) 对待国际资本流动随意性的方法

国内金融改革在巨额私有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直到最近为止，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都是由政府限制和掌握的，金融中介机构没有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今天，私有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数额是巨大的，并且其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国内银行的渠道输入的。这在一方面增强了金融体系的潜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效率低下和其他问题。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永远没有波动，即使是永远摆脱危机也是不现实的。就算我们能做到在经济政策上不犯错误，我们也不太可能使经济免受外来的冲击，包括像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或市场情绪的变化，或者现在的东亚危机。另外，虽然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的余地要大得多，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一切在明天就能发生。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承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较弱，对外来冲击的抵御力较差。我们必须在作方方面面的政策建议时考虑到这个因素，特别是在掌握放开资本市场和金融业自由化的时间和顺序上。

我们同时还要记住在制定政策制度的时候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如宏观经济政策或汇率率等会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我们采取的政策制度必须具备一定的免疫力，这样可以容许一般的人类失误而不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像飞机不是专为一流的飞行员所设和核电站有相当多的安全防护措施一样。

健康的政策制度的一个特征是它能把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波动所带来的长期

后果减小到最低程度，包括防止危机及建立相应机制以便危机一旦出现后能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这就意味着要设计规划出能减缓冲击而不是加大冲击的金融体系。另外，我们想保证一定数额的存款能流动起来，输入到能增值的投资中去，没有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

虽然各国国内的经济改革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但国际社会该作出些努力了。现在时机成熟了，可以对各种各样的做法的优劣性进行公开的辩论与探讨，包括对国际资本流通的征税、调控和限制形式。

### (4) 信息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在讨论这些措施之前，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方面：对更高透明度和更多信息的需求。墨西哥和东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投资者得知储备比他们预计的少，而短期债务比预计的高而引发且扩展的。结果不仅是短期信用贷款撤走，而且有价证券外流。

在有些国家，信息的缺乏使得投资者很难区分公司与金融机构的优劣。这也许比传播误导性消息还要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退缩在一旁。将来有了可信度较高的信息系统，运作良好的公司就能更好地获得信用贷款。

前面已提到，标准的宏观经济资料对预测本次危机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因为预测要建立在了解私人之间资本流通的组成和分配上。但遗憾的是，了解私有业中支出和借贷的情况要比公共金融中难得多。在透明度缺乏时尤其是这样。在私人之间资本流通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调控与监督特别具有挑战性。人们更加频繁地使用各种非常规金融手段，这使得要完全了解相关信息或至少是完全推测出封闭的信息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还应记住市场经济的大优点是分散的信息可通过价格及其产生的对市场行为的刺激归集在一起，而不需要任何集中的资料收集和规划。我们吹捧市场经济的这种信息分散作用，同时又抱怨没有必需

的统一资料来测定整体风险，这确实有一些讽刺意味。

再补充一点，我们不要有这种幻觉，认为信息资料齐全就能使金融市场顺畅运转。在东亚，很多重要信息已攥在人们手中，但却没作为评估市场的依据派上用场。另外，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和偏颇。企业家对他们的投资总是比贷款给他们的银行了解得更清楚，而公司的经理对他们的行为总是比持股人知道得多。如果没有正确的刺激，即使是最完美的信息收集也不能确保市场有效而稳定的运转。

尽管我们对私有资本流通无法窥其全貌，尽管在信息收集极大幅度完善的情况下，对预测或防止危机的发生我们仍不持乐观态度，我们还是认为改善信息库将带来可观的回报。要提醒大家的只有一点，不要被此引入误区而认为一切问题可以就此得到解决。现在看来这次危机给国际金融界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更好的信息传播，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一叶障目，志得意满。

#### (5) 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经济原因

在墨西哥危机后，许多人说这种情况将不复发生。但墨西哥危机两年后爆发的东亚危机提醒了我们：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危机。因而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放贷国、借贷国或者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减少此类危机的频率及数量？

对政府干预国际资本市场全盘否定是不恰当的。向东亚提供的将近 1 千 1 百亿美元的资金显而易见的就是（政府）对自由市场运作一个主要干预。国际社会提供资助的原因在于对此类危机潜在的整体风险的担心。

发达国家银行在东亚危机中所承担的风险比起他们在 80 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中承担的风险要小得多：1997 年 6 月 BIS 报告指出，向东亚国家提供的贷款占银行资本的 19%，而此比例在 1982 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中为 58%。在当前形式下政策制定者所担心的风险在于危机可能蔓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经济学理论对于危机蔓延及系统风险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定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不够明确。矛盾的是，我们无法通过“实践”来了解 80 年代的拉丁美洲和 1995 年的墨西哥失去国际援助对国际金融体系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以上两个例子以及东亚在内的事例中，政策制定者可以理解地不愿意在掷下骰子后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可以推断的是：如果你相信系统风险的存在，甚至相信政府由于系统风险有可能采取事后干预，那么你就必须相信政府事先干预——包括谨慎的调控——应该得到保证。

对于这一干预有两个可能的经济理由。第一，社会风险并不同于个体风险，如果任其发展，市场上的风险会使整个社会出现低效运转。这就类似于污染，社会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污染本身引发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控制污染的典型方法是征税或通过规定加以限制。依照这一逻辑，我们也可对国际资本流通征收某种税或制定某些规定。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的国家在其金融系统中采用了不同形式的税及规定，其中包括储备费及存款保险等方法。它们存在的原因在于金融决策引发的系统风险及不断出现的干预。尽管这在国际范畴内可能不是可行的或理想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否定这些措施，是不符合于我们的其他政策的。

另一个对市场实施一揽子拯救计划的可能的经济理由是市场无法有效的对个体风险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市场是不合理的。人们有时会讨论到不合理性的一个形式是市场参与者目光短浅，只注意其他参与者将要做些什么。这就像凯恩斯所指的“选美比赛”，参赛者所猜测的是谁是裁判眼中最漂亮的而非谁实际上是最漂亮的。结果是市场脱离了比实际市场产出更稳定的长期因素。

经济学中有一个文字说法叫市场的“超常发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一些方法例如对外币征收的 Tobin 税则既能够通过增加流程所需费用而增加短期投机

行为的成本，又允许市场对长期因素的变化有所反应。我在此仅以 Tobin 税做一说明，其灵活度在实践中仍存在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世界，一切都很容易受到限制。

#### 4. 结论

东亚过去成功的现实及目前的混乱恰好处于两个极端。我们可以通过检验对“裙带资本主义”的严厉谴责来看待这一现象。确实，这个地区的政企合作（所谓的日本会社及马来西亚公司）隐藏了合作关系与裙带关系混为一体的可能。实际上，这些考虑也是我们一直没有建议其他国家跟随东亚经济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尽管存在因滥用职权而产生对资源分配不当的现象，东亚体系的力量还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压制了其风险。也许，加强合作的收益大于投资引导错误的损失。无论如何，由此可得的一个结论是，只有紧密的政企合作体系才可能促进东亚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

我这里主要讨论一个尤其重要的领域：金融体系。从人们以看杂耍的态度看待金融体系，或者将它仅仅当做是将闲散资金最有效利用的渠道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金融体系是发展的基础。改进金融体系可以带来更高的增长并减少危机的可能性与严重性。谈到金融改革，我们应该将贸易开放看作是它的工具而非它的终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一味激进地推动放宽。这样将不仅有助于国内资本更有效的分配，还有助于国家管理国际资本流动。

同时，我们不应该等到国内金融调控已经完善后才对国家资本流动采用相应的政策。发展中国家要达到类似于美国一般复杂、全面的调控体系还需要一段很长时

间，更何况美国还在承受着阶段性的崩溃。

最近进行了许多关于改革或重整金融结构的讨论。有一部分讨论让人回想起一个多世纪以前有过的关于国家经济机构如何帮助新的单一民族国全面开发其潜力。在 1983 年美国内战期间，国会承担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统一国家提供基础的挑战，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金融部门调节机构——货币审计员办公室。这比这个国家适应国家银行体系要早了一个世纪——甚至在今天，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对此仍抱怀疑的态度。

今天，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世界经济。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国际性机构像单一民族国一样去承担促进及调节贸易与金融、竞争与破产、公司治理与会计实践、税收与相关标准的责任。如何引导以上问题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正如过去 150 年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上因素的改变所带来的市场扩张，下一个世纪的兴盛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抓住全球化为我们提供的机遇。

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避免形而上学及大而化之的模式。我们必须防止因满足而止步不前。正如我一个朋友所说的，下大雨的时候，有把漏伞总比没有伞好。我认为，对国际经济结构的改革将发挥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包括在降低风险的情况下实现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对那些改革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但是，我们是时候对这些课题展开国际对话了。

※本文是作者在 1998 年菲律宾马尼拉亚洲发展论坛的主题发言。发表时作了一定的删节，并调整了小标题。

※约瑟夫·斯迪格利茨，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陈弦、冯军、曾秀华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集团成长的核心机制与主要方式

##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集团成长的核心机制

市场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机制是竞争机制，它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将那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企业保存下来并使其得以壮大，同时将那些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企业淘汰出市场。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处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企业无论大小，一概都要加入这场激烈而无情的竞争中去，这就迫使大大小小的企业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强本身的竞争力。企业集团的出现即是竞争的结果之一。

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是企业集团得以生长的最重要的机制。如果没有竞争机制，也就不会有企业集团这一先进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

首先，竞争必然会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一些企业有了雄厚实力，可以吞并其他企业，来扩大经营规模，为企业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其次，由于竞争日趋激烈，社会资本日益向各行业中少数大企业集中，使广大中小企业普遍感到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独自无法与大企业抗衡的中小企业开始通过各种形式联合起来以增强竞争力，共同对付大企业的挑战。

第三，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由于竞争的结果，使得一个生产部门的大部分生产与销售被少数几个或十几个大企业所拥有，这些企业规模巨大，资本充足，实力雄厚，彼此间势均力敌。为避免相互间

竞争造成的损伤，同时也为更有利地操纵产品生产和销售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这些大企业便通过达成协议来联合，其中一个重要方式便是互相持股或互派董事，从而形成了强强联合型的企业集团。

第四，由于竞争的结果，使得一些行业被垄断，发展空间不足，一些大企业开始通过兼并、收购或参股形式跨行业发展。这些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别的企业联合体，将企业集团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五，竞争不仅局限在一国内，国际间的竞争同样存在，而且除经济因素外，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国际间的企业竞争更加激烈。各国为保护本民族经济利益，一方面积极组建大型的经济“航空母舰”——企业集团来同国外企业竞争，进而抢占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各种贸易和非贸易的壁垒来阻止别国企业的进入。而为了绕过这些壁垒，打入他国市场，各国的大企业纷纷通过资本输出等方式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从而形成了企业集团的最新形式——跨国集团公司。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通过上述途径，促进企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竞争产生了企业集团，而企业集团的建立又促进了竞争。

##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集团生长的主要方式

## 1、企业兼并

兼并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实质上是一种产权交易过程，确切地应称为“企业市场行为”。兼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优化有限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形成规模经济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它在现代大工业经济的重要地位。

从历史上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界至少已出现过五次兼并浪潮，规模一次比一次大。（1）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以横向联合为主的第一次兼并浪潮，至少有2864个企业被兼并；（2）到本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以纵向联合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兼并浪潮，仅1925—1930年就有5382家企业被兼并；（3）本世纪60年代，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的混合兼并引人注目，1960—1970年间，兼并活动达25598起；（4）本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出现了新的兼并形式，即举债兼并亦称杠杆兼并。在这场兼并浪潮中有近五万家企业被收购合并。（5）90年代初期尤其是1994年以来，又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兼并浪潮，涉及到金融服务业、医疗保健业、电讯业、大众传播业及国防工业。其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的，其势至今仍方兴未艾。通过这些企业间的兼并活动，不仅使企业自身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且也使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得到了加强，保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1997年，美国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兼并案有156起，比1996年增加了60%。在过去的三年里，有2.76万家美国企业参与兼并，比整个80年代的数目还要多。

1998年，美国金融业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大兼并热潮，就其规模、涉及面和兼并金额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1998年4月6日至13日的一周内，就发生了花旗集团兼并旅行者集团、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第一银行与芝加哥第一公司联姻等震惊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界的大

兼并事件。其中，“花旗”兼并“旅行者”的金额超过800亿美元，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兼并行动。这几次大合并，使美国一下子产生了几家“国际超级银行”，大大增强了美国在金融领域的整体实力与竞争优势（参见下表）。

全球十大购并案

| 排名 | 并购方                       | 规模（亿美元） |
|----|---------------------------|---------|
| 1  | 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集团                | 800     |
| 2  | 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                 | 600     |
| 3  | 世界通讯与美国微波通信公司             | 418     |
| 4  | 山度士与汽巴嘉基                  | 363     |
| 5  | 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                 | 338     |
| 6  | 瑞士联合银行与瑞士银行               | 330     |
| 7  | 第一银行与芝加哥第一公司              | 300     |
| 8  |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br>·罗伯茨公司 与纳贝斯克 | 262     |
| 9  | 三井银行与太阳神户银行               | 230     |
| 10 | 贝尔大西洋与尼内克斯                | 220     |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上述五次一浪高过一浪的兼并浪潮，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增值，推动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优化配置和升级换代，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意义之大用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的一段话可概括：“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企业兼并行为是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的一种战略选择，因而企业兼并动机也是多元的：

首先，企业通过兼并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优化组合生产要素，综合利用新科技开发成果，从而获得某些竞争优势；其次，兼并有利于加强企业自身在市场上的应变能力，减少企业经营风险；第三，兼并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利润率；第四，企业还可以利用兼并避开一些法律条文的约束，达到某种预期目的。

企业兼并是企业规模扩大的一条捷径，但企业的规模不能无止境扩大，企业规模

是有边界的，这是因为：

通过企业兼并，尤其是纵向兼并，可以将市场内部化，将原来的买卖关系转化为企业内部供应调拨关系，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但随企业兼并规模扩大，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也在增加。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管理费用增长额与交易费用减少额相等时，企业就不能再扩大规模。因为再通过兼并扩大规模，管理费用会过高，抵消因兼并而减少的交易费用，使企业得不偿失，难以维持经营。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便是成立企业集团。由于企业集团在经营行为、经营战略等方面保持一体化的情况下，也保留成员企业独立法律地位，从而可以更好发挥成员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成员企业本身的技术、管理方式的优势，实现集团公司的外部规模经济来降低管理费用和交易费用。同时通过成立跨国集团，还可以绕过国际贸易壁垒，开拓海外市场，拓宽企业的经营空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受本国有关反垄断法规的威胁，有助于适应大规模经营的要求。

兼并的结果导致了企业集团的产生与形成，可以说兼并是企业集团生长的主要方式之一。

通过兼并形成企业集团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横向兼并。这是垄断资本发展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一般来讲，它是垄断资本家为了在某一部门进行控制和独占，在同一产业部门采取的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把小公司兼并成规模更大、竞争实力更强的企业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横向兼并已由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的企业合并发展为产品性质相同和作用功能相似的邻近工业部门的公司合并。二是纵向兼并。这是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发展第二阶段大量出现的向纵深层次的企业合并，它是指把某一产业部门的原材料开采、燃料动力运输、产品各个制造工序以及副产品的加工等环节组成统一体系的企业合并。通过纵向兼并的企业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原材料优势，合理运用能源，节约运输能力，降低

流通费用，加速货物周转，使社会再生产连续性更强，增强了市场竞争的保险系数。三是混合兼并。这是战后广泛出现的企业集团发展形式，它指各种不同部门之间的企业混合兼容，一般由某一垄断性资本牵头。由此形成的混合公司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某一较小的主要生产某一单一产品的公司通过大量混合兼并，形成一个生产的产品互不关联的多部门混合体。另一种是原有企业就是多部门企业组成的，通过合并形成规模更大的混合公司。

## 2、股份制

企业集团的另一个重要生长机制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企业的基本组织方式之一。

西方企业在几百年的演化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企业形态，即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这三种企业形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处于一种并存结构之中。而由于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态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企业形态结构。由于独资企业高度一体化的产权结构，其资本所有者直接控制和经营企业以及自我积累机制和强烈的投资冲动等特点，决定了在19世纪中叶以前商品经济和分工不甚发达、经济的信用程度不高、以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新产业结构还未形成的时期，独资企业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规模的扩大、信用制度以及证券市场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变化、企业经营管理者从所有者中分化出来并随着经理市场的形成等，股份公司这种企业形态便由于其制度上的优越性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股份公司的原始形式在15世纪就已出现，但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趋于成熟并占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股份公司的历史发展形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家族公司阶段，公司的形态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由家族成员掌握，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来自家族内部，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还未发生明显的分离。第



二阶段是家族控股阶段，公司的形态是股份有限公司，家族作为大股东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并对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有决定性影响，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开始发生分离。第三阶段是公司外部股份分散化阶段，股东人数迅速增多，股权高度分散化，股东不再直接控制企业资产，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获得了充分的控制权。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第四阶段是法人持股公司阶段，这时个人股东持股比例相对下降，法人股东持股比例迅速上升，法人股东不仅成为大股东，而且通过交叉持股互为所有者，股权关系趋向稳定。

现代股份公司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建立在所有权与控制经营权相分离基础上的公司法人制度。一方面，股东出资组织的股份公司取得了独立于股东的法人地位，拥有处置公司财产的各种自主权力；另一方面，股东作为所有者只拥有处置股票、领取股息红利、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有关议案的权利，而无权随意处置公司财产。与此相应的是，股东只对公司债务负以其出资额为限的责任。由于股东只负有限责任，加之股份公司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集资而扩大其规模，从而有利于股份公司从事风险较大的生产开发经营活动，进入风险度较高的新兴产业部门；同时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及企业法人制度，使股份公司摆脱了对自然人的依赖关系；使企业家成为控制企业的主导力量，从而使企业的目标——行为模式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化为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与企业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保证了企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由于股份公司的优越性，使得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企业大都采用了股份制形式。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股份制与企业集团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推行股份制的结果必定会形成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

股份制对企业集团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 通过股份制公司的运作，可以使

企业通过在市场上发行股票在短期内集中大量资本，迅速扩大企业规模，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从而有实力去兼并其他企业，并最终向集团型企业转化。

(2) 股份制可以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条件下，把分属于不同所有者的生产要素，以使用权的形式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生产经营体系，这样既可以扩大企业规模，适应生产者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避免了通过兼并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时造成的对资本所有者权益的损害，缓解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财产所有权不同的矛盾。当单个企业规模不能继续扩大时，企业所有者更愿意采用股份制形式互相联合起来，形成企业集团。

(3) 股份制的发展，使得厂房、设备、土地、资金及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都可以以货币作为统一尺度，折合成为股份，由股份公司统一经营，这就为生产要素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乃至跨所有制合理流动扫除了障碍。而当这些跨地区、跨国界的企业联合，大都是在保留各成员企业独立的法律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企业集团。

股份制不仅促成了企业集团的产生，而且也推动着企业集团不断地发展。以其他方式建立起来的企业集团，最终也大都走上了股份公司的道路。因为通过股份制的形式构造企业集团具有其他方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 通过股份制构造企业集团，能够克服产权分割的矛盾，实现集团内部的产权一体化。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按照“投资共筹、风险共担、参股分红、收益共享”的原则，企业之间可以用资金、设备、技术、专利、商标等作价折股互相投资，内部职工也可以筹资入股，大企业集团还可以通过参股渗透，从而形成企业集团之间不受地区、部门、所有制限制的互相投资、互相入股的资本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具有了新的产权关系和新的资金联结纽带，因而使企业集团变成资产经营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和彼此间利害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产权分割的矛盾，既实现了企业集团能够提高企业集中度和改变管理关系的目标，又形成了企业集团内新的产权关系和经营机制，有利于企业集团的顺利发展。

(2) 通过股份制构造企业集团，有利于实现企业集团的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用股份制构造企业集团能使各成员企业把资产所有者的最终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分离出来，建立所有权组织和经营权组织，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因而可以在集团内部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活动，通过参股、控股、按股分红，进而可以实现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的统一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真正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在股份资本所有权、使用权分离基础上的资本所有权产生了新的意义，即形成了股份资本终极所有权与企业集团法人所有权两个层次，从而使法人所有权与集中的经营权实现了法定的结合，企业集团就取得了法定的社会经营地位，实现了企业集团社会化的演变。

(3) 通过股份制构造企业集团，可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协调。股份制是一种比较成熟、产权关系比较明晰的企业组织制度，与之相联系的是它有一套比较合理并行之有效的按股分红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只是依据股权来分配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因而它实行的是股权与效益挂钩。企业集团内实行这种分配制度，就可以依据集团内各成员企业的资产数额或参股企业的出资额来划分股份，各所有者凭借股权大小分得应得的红利，实现集团内在利益分配上的“统一”。这种按股分红的分配制度还使企业集团内各成员企业真正成为“联股联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地规范企业集团的行为，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利于各方面利

益得到协调。

(4) 通过股份制构造企业集团，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促进企业集团最大整体效益的实现。组建与发展企业集团的最大意义还在于通过组建企业集团，将分散的各成员企业联合起来，实现集团内部的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从而增强企业的实力，实现企业集团最大整体利益。在企业集团内实行股份制，通过折股、划股的办法，将企业的生产要素划为股份的形式，由集团统一协调、统一管理，就较好地实现了集团内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这不仅可以减少许多浪费，也可以减少因要素不能流动而对企业发展的制约影响，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短缺与生产要素闲置的矛盾，有利于企业集团整体最大规模效益的发挥。

(5) 通过股份制构造企业集团，可以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权力制衡基础上的组织机制，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集团的稳定发展。

总之，股份制为企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是企业集团进一步完善、提高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近几年来，我国通过企业的兼并、联合和股份制改造，推行企业集团发展战略，对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产生了积极作用，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贪大求快，盲目扩张，政企不分，管理落后。有的不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办事，而是通过政府行为，人为拼凑大型企业集团，这不仅无助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也会造成损害。

作者彭清华，北京党建研究所研究员(100032)

责任编辑：谭湛明

# 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 制度特性与趋势分析

□ 余秀江 程 昆

农村股份合作制自 80 年代中期在我国农村自发产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产生了非常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农村股份合作制是否是一种稳定的、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发展趋势如何？学术界颇有分歧。但有关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我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特性和发展趋势作一些探究。

一、制度创新：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产生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某种现行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

费用所引起的潜在收入不能内在化时，一种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的收入。当外部效益足够大，且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就会发生，制度创新还受国家因素、制度遗产、社会意识形态、技术和规范性行为准则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过影响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的成本，从而对制度创新造成影响。

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和积累了巨大的外部利润，在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下，这些外部利润不可能内在化，因而产生了对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需求，但是现存的制度供给又对这种制度需求存在着极大的约束。农村股份合作制就是在现实制度供给因素约束下制度需求尽力伸展自身边界的结果。换句话说，农村股份合作制正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看，新的制度应该是（1）产权清晰，明确集体财产中个人的份额；个人的财产可以参加集体或联合经营，达到资产增殖的目的，又可以不被“集体化”（像人民公社那样）。（2）科学管理，责、权要明确，能够更好地发挥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集体经济不能被瓦解且要得到壮大，既得利益格局不能打破，要承袭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经过权衡利弊、成本核算，达到利益最大化。在制度创新选择时必须选择对原有制度只作较小边际调整的制度。因此股份合作制就被创新出来，它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制度的需求，又不过多地超越制度供给的约束范围。

二、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制度特性：不稳定性 and 过渡性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否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理论界在认识上分歧比较大。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把合作制作为其成员谋福利的基本原则和股份制聚集分散的生产要素形成规模使用的特殊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独

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①股份合作制是吸取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②是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③持否定观点的则认为合作制与股份制是两种不同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一个企业，或者实行合作制，或者实行股份制，不可能同时实行合作制与股份制，也不可能把合作制与股份制合为一体。④为股份合作企业制定一种共同规范思路是不可行的，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不规范的具有过渡性的企业制度，如果要把它规定为一种企业形式，则会引出一系列的经济和法律问题。⑤

对股份合作制的认识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的分歧，其主要原因是，现实中的各种被称之为股份合作的经营组织形式，其个体运作方式本身存在很大差别，并且大都处在探索阶段，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但是如果撇开现实中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表面现象，而进入到深层对其制度要素进行分析，则能看到股份合作经济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首先，股份制和合作制在财产实现方式等诸多方面是相互对立和难以相容的。这种对立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⑥（1）合作制内部人持股与股份制允许外部人参股之间的对立。股份制是资本联合，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出资人没有明确的边界，入股资金在功能上是一种权力股，可以转让，但不能退出。合作制则是劳动联合，出资人只能是企业内部的全体职工，入股资金在功能上是一种身份股，成员可以进退自由，股金可以带走。（2）合作制二元产权与股份制产权高度清晰之间存在对立。股份制企业的财产属于投资入股的全体股东所有，这种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是不容侵犯的。合作制企业必须从税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从而使合作制企业既保留由成员带资入股形成的私人股权，又新增了不可分割的公有资产。

（3）合作制企业财产实现方式不对称与股份制企业财产实现方式高度对称之间的对立。股份制企业通过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能够使财产与其实现方式高度对称。而合作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和民主管理，其财产与其实现方式是不对称的。

其次，股份制和合作制均是经过长期优化和市场选择而产生的，都各有一套基本的规范。它们在制度结构上具有稳定性，在责、权、利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制衡机制。只要改变其制度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制度要素，就有可能打破均衡，使这种制度结构发生解体。股份合作制则是从以上两种制度中抽取几项制度要素拼凑在一起形成的。而这两种制度又是相互对立的，这就必然决定了股份合作制中各制度要素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制度结构，也无法形成责、权、利之间的制衡机制。例如，在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制度中，虽然鼓励外部人入股，但又不给予股东应该享有的正当权益；在股份制中股东可以通过转让股权来回避风险，在合作制中成员可以通过退股来回避风险，而在股份合作制中，股权既不能转让也不能退回，风险无法回避，资源不能进行合理流动。在某种意义上说，股份合作制同时存在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缺点。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不具备长期存在的空间，它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实际上，这一观点，我们从农村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制度分析也可透视到。

在实践中，各地已经存在的股份合作企业，它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企业，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制度和内部分配关系等方面看，它有多种不同类型，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⑦股份合作企业的不规范是因其制度要素的矛盾性所决定的，要对实践中五花八门的股份合作企业进行规范也难以做到。因为股份合作制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企业制度。所以，当前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在运行中仍然存在种种棘手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和演化趋势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对我国农村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这是因为它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方面比传统集体经济更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它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比，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股份合作经济将向何处去？

既然股份合作经济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那么，它对自身的完善也只能是局部性的修修补补，而不能改变其不稳定性和过渡性。它最终要向各种规范的经济组织形式转化。

1、原来属合伙企业，经过提取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限制股金分红等而成的股份合作企业，很可能恢复为合伙企业，条件是“私有”企业能享有集体企业同等待遇。这类企业在温州地区比较普遍。我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地位的肯定，可能会成为这种转化的催化剂。

2、一些规模不大、生产比较稳定、职工都持有股份且基本是均衡持股，而且外部人持股比较少的股份合作企业，将可能发展成为合作制企业，外部人所持股份可以转变为债权关系。实行一人一票制，以按劳分配为主，成员进退自由，股金可以带走。发挥合作制组织成本比较低的优势。

3、一些生产规模比较大、有发展潜力、职工持股差异较大、外部人持股比重也较高的股份合作企业，将可能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一股一票的管理决策权制度，分配方面以按股分红为主，股权可以转让但不能退股。因为企业规模大、人员多，比较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带来的外部性，股份制有一套严密的约束制度，能满足此类企业在组织制度方面的要求。另外，由于此类企业股东较多，且持股数量差异大，股份制产权高度清晰，责、权、利统一，这也是广大股东所要求的。

4、对于社区型的股份合作经济来说，

政企不分、社企不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不利于企业生产经营。这类股份合作经济将可能发展成为企业型，归还社区的行政职能和社区建设职能给政府部门。从社区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中分离出来的企业，有的会朝合作制企业方向发展，有的则会朝股份制企业发展。这主要决定于各企业的经营性质、经营规模、股权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这要由民众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1）虽然农村股份合作制有上述几种经济组织形式转型的趋势，但这并非在短时期内能轻而易举实现的。因为传统集体经济的制度安排仍在我国农村占主导地位，以及它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均未得到解决，目前，农村股份合作制在我国农村仍有继续生存的土壤，甚至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存在。（2）以上的几种转化趋势，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未来的情况如何，还有待于实践去检验。

---

①杜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态”，《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11期。

②③④严闻广、万宝瑞、厉以宁的有关观点参见苑鹏“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基本制度分析”，《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年第96期。

⑤⑥董辅初：“‘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载于《合作经济理论与农村改革》，江惠生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⑦任鸣：“对股份制、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有关问题的理论透视和经济学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11期。

作者余秀江、程昆，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510642）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完善我国证券税制的构想

□陈思玲

证券税制一般是指对证券交易市场中的证券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得和证券收益所确定的征税原则和制度。因此，证券税制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一、证券交易税制；二、证券交易所得税制；三、证券收益所得税制。我国目前的证券税制主要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交易营业税，前者是对证券流通市场的股票交易行为和股票发行行为课征，后者是对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等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征收的税种。至于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证券收益所得税，则纳入一般的所得税范围征收。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目前实行的证券税制是不够规范的，由于证券税种过于简单，其对控制交易成本，从而调节资金流向，降低投资风险，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存在明显不足，而已设立的税种也存在一些较明显的问题，例如证券交易印花税缺乏相应的税目条款，对课税对象和征免范围的划分不够明确，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成不规范，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矛盾；证券收益所得税的征收中，对同一起来源的股息、红利，既征收企业所得税，又征收个人所得税，出现了重复征税等。而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扩大，证券税收也迅速增加，仅印花税一项便从1991年的2750万元增加到1997年的237.27亿元，证券税收已逐步成为国家的重要税种之一。因此，在扩大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今天，有必要参照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逐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证券税制。

## 一、国外证券税收的现状

国外的证券税制虽然五花八门，各有长短，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主要是在证券交易环节中对交易行为或证券凭证征收的税收。目前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证券交易行为的征税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1) 只征收印花税，如英国每次交易征0.05%，澳大利亚0.3%；

(2) 只征收证券交易税，如南非对买方征收1.5%，韩国对卖方征收0.2%；

(3) 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同时征收，如日本、新加坡等。

国外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主要是为了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同时通过对一些证券品种如国债等免征交易税来适当调节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习惯上，证券交易税收属于中央政府，而印花税则属于地方税。目前我国的印花税则兼具这两种税的功能。

### 2、证券交易所得税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以证券资产因买卖转移而发生的增值所得为征收对象的一种税收，这一税种虽然征收时没有印花税简便易行，但由于其在发挥证券税制的作用上明显较印花税优越，因此成为各国证券税制的主要税种之一。证券税收与其他税收一样，具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但其更重要的是作为政府调控和稳定证券市场、维护社会公平的手段和工具。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功能，各国也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征税方式，其主要类型有二种：

(1) 对公司和个人的证券交易所得都征税，但对个人征税较轻，如美国把证券利得作为所得税的一个组成部分征税，但对个人的长期资本收益可享受60%的扣

除。此外还有英国、意大利等。

(2) 对公司和个人的证券交易所得区别对待, 对公司所得并入利润征收所得税, 个人则免征, 如瑞士、巴西等国。

在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的过程中, 各国一般都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主要有:

(1) 为了调控和稳定证券市场, 对频繁的短期操作征税较高, 对长期的资本投资则实行不同程度的减免, 而且允许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应税利润额。(2) 为了降低投资风险, 允许资本损失在收益中冲减, 而印花税则不论盈亏均要纳税。(3) 为了维护社会公平, 鼓励中小投资者参与证券投资, 不少国家都规定设立起征点或对个人投资免征所得税, 等等。

### 3、证券收益所得税

证券收益所得税是以证券投资的股息、红利收入为征收对象的税收, 目前各国基本上都将股息、红利收入列入所得税的征收范围, 它也是证券税制的主要税种之一。目前各国在征收证券收益所得税中, 多将公司所得并入投资利润征收所得税, 个人所得由公司在分发股利时预扣应交税金, 扣税后的股息红利方交付股东, 但由于这种收益所得是从上市公司已征所得税后的利润中支付的, 为了减少或避免重复征税, 各国采取了多种方法和措施, 例如有些国家将上市公司利润分为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 分别按不同税率征收所得税; 有些国家将分配给股东的股息、红利从公司的税前利润中予以扣除; 有些国家甚至采取个人股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等。

## 二、逐步完善我国证券税制构想

我国的证券税制由于税种较简单, 造成其对证券市场的调控功能不够理想, 而要更好地发展证券市场, 就应改变目前税种过于单一的状况, 适当增加新的税种, 完善我国的证券税制。

### (一) 关于印花税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的主要税种, 虽然目前证券交易已实行无纸化, 但其实际上仍是财产凭证的转移行为, 可以适用于印花税。但是在现行印花

税的运作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目前我国主要只对可公开流通的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 而对法人股、基金、债券、期货交易则不征收印花税; 又如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证券交易印花税不断增加, 将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按比例分成的方式不够规范, 容易引起双方的矛盾, 为了更好地发挥证券税收在调控整个证券市场的作用, 规范证券税收的分配制度和为将来进一步规范整个资本流通市场作准备。可以考虑在征收原有印花税的同时, 开征证券交易税, 将证券交易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基金、债券、期货等在内的所有证券交易行为, 通过对不同的券种和在不同的时间实行不同的证券交易税率, 达到调节证券市场和资金流向的目的。具体操作上, 可以考虑将印花税率固定在 0.2—0.4‰, 其收入归地方政府, 而证券交易税率则可在 2‰—4‰之间浮动, 其收入归中央政府。在这里应注意的是, 证券交易税率不能定得过高, 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 还处于初级阶段, 投资者的承受能力还比较脆弱, 过高的证券交易税率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但是在目前有关的证券交易法规和市场运作监督机制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 证券交易税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而且是国家调控股市的主要手段之一, 例如 1997 年 5 月由于国内股市出现过度投机现象, 管理层决定将印花税率由 3‰调整为 5‰, 使股市迅速降温。又例如在目前国内股市经常出现的“庄家对冲”行为中, 印花税(证券交易税)是其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税率过低显然不利于管理部门控制和约束“庄家”的这些不规范行为, 等等, 因此证券交易税率也并非越低越好。在将来证券税制逐步建立及有关法规和监控手段逐步完善之后, 则可逐步降低证券交易税。

### (二) 关于证券交易所得税

在很多经济较发达、证券市场较完善的国家, 如美国、日本、英国等都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 而在我国开征此税, 则是

完善证券税制的重要措施，这是因为：

首先，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证券交易所得税在调节证券市场的收益方面具有别的税种难以替代的优势，由于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它必然存在一些不正常的收益所得，例如，目前在“一级市场”，机构大户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基本上不需要冒风险，不需要付出多少劳动的情况下，便可获得 20% 以上的年收益，这显然高于目前国内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又如，机构大户由于在资金实力、信息、技术、投资工具等方面具有的优势，他们获利甚至获取暴利的机会明显多于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等等。这些收益所得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成分，应通过证券交易所得税进行适当的调节。

其次，在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方面，证券交易所得税可以通过对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实行不同税率的方法，引导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从而达到稳定证券市场，抑制投机的目的。

第三，在控制交易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方面，证券交易所得税可以通过允许资本损失在收益中冲减等手段，比不论盈亏都征收同样税率的印花税显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效果。

第四，在调节社会资金流向，引导投资方面，证券交易所得税可以通过设定一定的起征额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积极参与证券投资。

在具体操作上，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较弱，投资者的数量（税源）还不够充足，扩大和提高计算手段成本较高等原因，所以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可逐步推开，先对

资金量较大（如 1000 万元以上）、获利较多（如年利润 20% 以上）的少数机构大户开征此税，待时机成熟时再全面实施。同时，在征收时应充分考虑盈亏冲抵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在总体税负上采取低税政策，以便在不致于对市场造成太大冲击的情况下使投资者对此税逐步理解和适应。

### 三、关于证券收益所得税

目前我国的证券收益所得税主要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质量不高，效益不佳，投资者要想通过长期投资获得与机会成本和风险相称的证券投资收益机会较小，再加上证券收益所得税的重复征收，进一步削弱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导致股市经常出现短期跟庄炒作、高换手率和过度的投机现象。因此，在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证券法规，规范机构投资者的同时，应改进和完善证券收益所得税的征收，例如采取国外较常用的“扣除法”，即将上市公司分配给股东的股息从税前利润中扣除，对这部分股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后直接分配给股东等方法，将更有利于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抑制过度投机现象。

总的来说，与其他税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一样，证券税制也是政府用于调控证券市场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我国证券税制的不够完善，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从而降低了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效率。为了更好地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应当尽快着手改进和完善我国的证券税制。

作者陈思玲，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510632）

责任编辑：谭湛明

# 独树一帜新开拓的理论领域

——序张铁明《教育产业论》

□张 磊

教育产业论研究是作者所开拓的理论新领域。

作者以我国大量的教育产业开发与改革实践作为理论的有力支撑，经过长期系统的理论思考，然后进行认真撰述，所以本书堪称力作。这部专著以“教育产业”概念为理念主线索，以教育劳动形态及其劳动产品形式为切入口，以教育劳动价值凝聚于受教育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收益回报这一事实，科学地确认了教育劳动者——教师的社会经济价值定位；以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为主支撑点，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投入体制为实践目标，全面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与经济关系范畴中多个方面的阐述。这部专著对我国教育投入不足问题给予了实证性剖析与检讨，并由此提出了合理的年增教育投入量测算的新的维度指标；在我国短缺性教育投入状态可能较长期存在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的有效途径，并在如何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积极运作聚集起来的巨额教育资金，创造最佳利润，反哺教育大业方面，作了大量的可行性探索。

这部专著还对如何去构建其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及其理论依据，作出深刻的理性探讨。作者自1988年参与对教育的商品性观点讨论以来，就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在全国独树一帜，于1992年成立了“教育产业与教育市场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并主持了这一立项研究，较系统地探索了教育产业、教育服务、教育商品、教育经营、教育开发、教育市场、教育产权、教育机会、教育选择、教育权益、教育多元化、教育银行、教育消费、教育储蓄、教育信托、教育投资券、教育股票、教育税系、教育产业集团、教育开发区等全新概念内容；创造性地论述了教育的经济收益

率、教育贡献率、教育投入年增率、教师劳动贡献率、教师年收入指数等，并首倡与之相应的数学计量模型方法。作者对我国教育发展抱有深切的忧患意识、超前意识和为政府分忧的主人翁精神，把教育产业理论与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国首先提出了“建立教育多元化共同投入体制”和“建立多元化教育体系”的构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显著的突破，对教育界、经济界及政府教育决策者是颇有启迪的。

作者在全国首倡教育产业论，无疑有着显著的社会效益。教育产业论是广东这一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沿火热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对于全面宣传广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宣传广东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成果，教育产业论当然是重要内容之一，而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建设的积极贡献，则是不言而喻的。

这部专著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因为它的论据是符合事实的，立论是中肯的，体现了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创新先导性。令人欣慰的是，其中的教育产业、教育经营、教育产权、教育税系、教育开发区等观念已被逐步认同，由此而展开提出的不少重大改革举措的建议，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所关注或被吸收实施，这部专著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祝愿作者锲而不舍，奋进不已，深化与拓展这项重大的研究工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童 轩

# 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现代化

白江海燕

##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起源于18世纪，但真正形成则为本世纪60年代。

### 1、人力资本的早期研究

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后，人类进入了大工业时代，生产力由此发生了三大根本变革：一是自然力代替人力，机械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二是科学技术代替经验工艺套路，科技与生产互动作用日益加强；三是专业技术培训代替作坊师徒传教，人的知识、技术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当时兴起的古典经济学开始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来关注教育对促进生产发展、增加财富的意义。著名古典学派代表亚当·斯密在其1766年出版的《国富论》（即《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中，首次提出“人的才能与其它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sup>①</sup>的观点。他还详细地分析了人的经验、知识、能力作为财富和生产财富的重要作用，据此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以偿还，兼取利润”。由于要受教育才能学会特殊技巧，所以他既承认人的经验、知识能力是财富和可产生财富的观点，并提出为获得才能资本而受教育是一种投资的观点。<sup>②</sup>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也研究了才能在生产中的作用，他提出物质与精神资本的概念，认为“精神资本”是由智力方面的成果汇聚而成，一个国家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精神资本的运用，为此他主张把教师列入生产者之列，因为教师“能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并主张“一个国家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

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sup>③</sup>

人力资本思想的这种发展，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反对而受挫。马歇尔一方面认真研究教育的经济价值，主张把“教育作为国家投资”，教育投资可带来巨额利润，但他又认为人是不可买卖的，因而拒绝“人力资本”这一概念。<sup>④</sup>

### 2、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理论则形成于本世纪上半叶，首先是苏联经济学家特鲁米林写于1920年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首篇用数量统计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论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尔什（S. R. Walsh）于1935年发表了《人力的资本》，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用数量方式研究了大学阶段教育经济收入的问题。但是理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却是在50、60年代，首先是战后经济的狂飙般的发展促使经济学家关注这种迅速发展的动因，其次是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答从1929年到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问题，引发了对人力资本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研究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于50年代开始人力资本理论研究，1959年发表《人力投资》，1960年他以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身份在年会上发表《人力资本投资》的主题演讲，其观点之新颖，论证之系统，并且以解答美国经济增长难题而震惊经济学界，从而引发世界性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大量论著，并于1979年以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 S.



Becker) 以及丹尼森 (E. Denison) 也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

### 1、人力资本的定义及构成

舒尔茨认为,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因而是一种有经济效率的资本。而作为资本就应有投资, 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五部分: 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 在职培训, 包括商社组织的旧式学徒制; 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 非商社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 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 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sup>⑤</sup>在这里舒尔茨非常强调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大作用, 把教育作为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在他所列出来的 5 个部分中, 第一和第五也主要是由教育水平决定或制约的。所以, 他指出, “教育远不是一种消费活动, 相反, 政府和私人有意识地作投资, 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 它蕴藏于人体内, 会在将来做出贡献。” “作为一种投资, 教育显然增加了那种无形储蓄。” “我主张将教育看作一项投资, 将其结果看作是资本的一种形式”。<sup>⑥</sup>现代经济不仅决定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也决定了这种人力投资是收益率大于物力投资收益率, 而且这种投资既可增加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力, 还能增加投资的自身的积累, 因为对教育这种投资可反复使用, 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因此, 投资增量不大却能使经济持续增长, 使传统的资本增加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发生逆转。<sup>⑦</sup>

### 2、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表现为: (1) 现代经济已大不同于传统经济, 除了相应的资本和自然资源外, 劳动者的知识、技术及能力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

素。现代经济的本性是知识经济, 即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知识不仅能提高投资收益率, 也是说明收益率持续增长的根据, 因此知识就是资本, 掌握知识就是掌握资本, 投资知识就是创造财富。1983 年美国保罗·罗默教授提出生产要素有四种: 资本、非技术性劳动、人力资本 (可按教育水平衡量)、新思想 (按专利权数衡量)。这一研究进一步强化了人力资本和知识的作用。专家预计美国每年由计算机完成的工作量可代替 4000 亿人的劳动, 相当于美国全部人口一年工作量的 2000 倍。<sup>⑧</sup> (2) 突出教育的生产性功能, 认为教育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们处理经济条件变化从而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 没有教育的作用, 就不可能产生 20 世纪经济的繁荣, 不可能产生现代经济并实现持续性增长。现代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 创造现代经济的关键要素, 具有培养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的功能。(3) 阐明教育与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内在互动关系和一般规律, 指出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益原则, 并大力倡导增加教育投资, 建立起现代教育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操作原则。舒尔茨指出, 教育与国民收入的正关系是以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正关系和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正关系为基础的。对个人来说, 提高了个人劳动水平, 增加了收入, 对国家来说, 教育投资提高了国民的人力资本, 增加了国民经济总产值。因此, 教育具有提高生产力素质的经济作用, 还具有提高人们处理条件变化的能力, 教育投资所引发的教育扩张, 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国民收入。所以学校教育的投资不仅仅是消费, 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将来的收入。人力资本理论通过对西方尤其是美国 20 世纪前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 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很大的。舒尔茨研究了美国 1929 年到 1957 年的经济增长得出教育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率 33%, 投资的收益率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中分别为 35%、10% 和 11%, 平均收益率为 17%。丹尼森在《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

一书中得出教育在这一时期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率为35%。可见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相当高的。

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指出,教育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点在现代经济中是无疑的,但这种作用也依赖于经济增长;同时,也并非所有的教育都能带来经济增长;教育与经济的互动是通过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这是由于:一是教育与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互相促进的态势,例如经济结构变化时教育结构也应随之变化;二是教育作为一种资本储存只有在增加其存量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种增加或是教育质量提高,或是教育年限增加,或是受过教育的劳力人数增加等;三是必须有利于发挥教育作用的经济增长条件,如经济长期得不到增长则教育效益必下降;四是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注重提高教育的“分配效益”才能获得最佳投资效果,因为这样通过提高人适应现代经济变化的能力来提高投资效益而不是单纯增加投资量。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只不过当时在新发现的狂热中并不为人们所注意。

### (三) 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现代化运动

#### 1、人力资本理论的意义与教育现代化运动的兴起

人力资本理论虽然还带有把教育作为资本交换的庸俗经济学观点,计算方式仍不尽合理,但是它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在以人力资本的理论方式反映高科技深刻作用现代经济发展使之形成知识经济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和生产功能,把由教育而形成和提高的人的知识能力作为经济增长的巨大源泉加以论证并理论化,它不仅开拓了当代经济研究新领域,而且也确立了教育在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使教育的作用获得了巨大的发挥。这也将有力地改造教育的人文传统,变革教育观念。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计算出教育中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并从中发动了震

撼世界的当代教育现代化运动。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从而消除贫困、提高收入、并能使收入分配不平等趋于减少,从而达到更大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结果非常吻合西德引用美国发展模式在10年间把废墟变为繁荣都市的奇迹,也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起飞所验证。比较教育学家诺亚和埃克斯坦的实证研究更直接了当地得出:“教育发展水平相对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地这个国家经济增长就快;教育发展水平相对低于经济水平的国家,相应地这个国家经济增长就慢”。<sup>⑨</sup>正是这些研究使人们把经济增长与发展教育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推行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定律,并据此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看成是现代化样板,认为只要把这些样板搬到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就能使这些国家迅速现代化。森斯塔特说得更干脆:“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sup>⑩</sup>1960年,世界第一次现代化研讨会在日本的箱根市召开,从而促使以办教兴邦为核心的全面引进美国等发达国家模式的现代化运动迅速在全世界掀起。一方面,战后丧失殖民地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乐于利用各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模式来“援助”穷国,以加强对其控制;另一方面“发展教育=经济增长”的现代化定律又与后进国家中以往读书能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心态以及与正陷入经济困境而迫切需要兴国图强的愿望是那样的一致,以致到了一拍即合的地步。他们虔诚地相信,只要大力发展教育,经济就会迅速繁荣,因而纷纷仿效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挤出仅有的一点钱来发展教育,孤注一掷,希望由此实现经济的突飞猛进,从而产生了60年代著名的世界教育现代化运动。

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经济严重衰退,通货膨胀,失业率剧增,百业萧条,这与教育的剧烈膨胀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从而导致了高文凭高失业率的严重局面。

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不惜代价办教育不仅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发展，而且还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暴力事件增加，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甚至还引起政权更迭。人力资本理论不能适当地回答这些问题，暴露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现代化运动自身的缺陷和问题。由此许多新的理论，例如筛选理论、劳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应理论、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依附理论等纷纷登场。新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批评第一代人力资本理论为特征，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特别是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 2、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勃起与教育现代化运动的复兴

经过 7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和调整，现代化运动随着 80 年代世界经济的复苏而再次为人们所关注，新人力资本理论以崭新的发展观再次唤起人们的热情，教育再一次被确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而掀起新的教育现代化运动。首先是，世界经济在危机的打击下促使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和第三产业异军突起，从中再次展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知识经济的到来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和运用的广阔前景。其次，新人力资本理论放弃了经济增长是一时一地一类产值或纯产值数量增长的观点，而看成是经济结构升级所引发的整体持续性的增长过程，并且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和教育与教育互动等观点，而人力资本的效益也不单是个人工资的增加而是个人生活质量的整体提高。第三，世界经济在 70 年代不同地区发展也显示，即使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东亚等发展中国家不仅教育扩张在继续，而且还呈现出较快的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向，充分显示出教育提供充分的人才储备是实现后进国家赶超的重要条件，教育仍然是一种引导现代经济增长的不可替代的投资，社会没有它就不能发展。第四，新的教育现代化模式已修改了原先“教育发展 = 经济增长”的模式，教育发展不再以学校和学生数量扩张来衡量，而最主要是以能否

适应经济发展并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最重要的发展指标。第五，人们发现，对于教育上林林总总的变革，唯有教育现代化之概念方可涵盖，并能产生指导和推进的作用。

因此，自 80 年代以来再次兴起的教育现代化运动，是一次崭新的教育现代化运动，一是这一运动以新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以策应知识经济发展要求为目的；二是坚持整体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突出变革传统教育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注重建立有本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寻求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适切性和发展的最佳效益；四是世界各国都卷入这场运动之中，都在开展目标不同的教育现代化，都需要在相互学习中相互促进，在相互借鉴中建立自己的现代教育体系。目前，这场教育现代化运动方兴未艾，积累了许多经验，正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

①【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

②【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231—234 页。

③【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 118—124 页。

④【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234 页。

⑤【美】舒尔茨著《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30 页。

⑥【美】舒尔茨著《人力资源投资》，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 62 页。

⑦冯宣《科学知识 with 知识经济》，《科技日报》1997 年 2 月 3 日。

⑧卢传继《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民日报》1996 年 3 月 2 日。

⑨冯增俊著《比较教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79 页。

⑩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3 页。

作者江海燕，广东省教育厅

责任编辑：童 轩

# 广东经济结构变动与教育结构调整

□ 梁 英

邓小平同志早在 1978 年就提出了要使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五大，又一次把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作为一个优化结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要求在今后五年工作中切实抓出成效。因此，我省教育结构能否在层次、专业、规格、形式等方面满足全省经济结构巨变和社会发展之需，这对于我省贯彻十五大精神，遵循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举足轻重。

## (一)

广东的机械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已成为推动我省工业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动的主体产业，近年来在工业总产值中一直保持着 2/3 的份额。高速增长工业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使劳动力配置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的比重迅速上升。在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全省经济结构升级换代，加速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尤以中小城镇为主体的工业生产高速增长，许多新兴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乡镇企业与大中城市工业得到了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提高了工业发展的整体效益，使全省工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乡经济逐步趋向融合。目前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近 80% 是在城镇内实现的，城镇经济已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我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在内，拥有几万至 100 万人口的城镇多达 100 多个，成为我国城镇最为密集的地区，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穗港大

城市为核心，中心城镇相结合的经济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向重要经济中心集中，一般产业向中、小城镇扩散。这种工业化的升级转移，使城乡差别日趋缩小，农村生活日趋都市化。

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金融保险、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信息咨询业等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全省经济保持高开放度，大大促进了生产要素诸如资金、技术、劳力等在产业之间的流动以及地区之间的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增强了地区经济活力，实现了由自我循环型的产业成长模式向开放关联型产业模式的转变。这是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过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广东经济结构已进入以轻纺加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成熟期，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主要特征已呈现萌芽状态。90 年代后期起至下世纪初，新兴产业将迅速崛起，致使广东经济结构变动出现以下基本趋势。

1、重工业化突出发展，这是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头产业。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高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广东迈向 21 世纪”国际研讨会上透露，广东将优先培育以乙烯为龙头的石油化工工业，在茂名、惠州、广州分别建设巨大规模的乙烯项目，标志着广东石化工业群的兴起，将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石化工业基地之一。

重化工业的崛起，这是经济结构调整对市场需求的响应。经济发展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城市的铁道、港口、机场、公路、电力、电话通讯、天然气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也将对重化工业中与此相关的设备制造、材

料工业发展产生拉动作用，并支持广东更加蓬勃向上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满足生产资料市场的需求。广州、深圳、中山、佛山、惠州、珠海西区的以生物技术、微电子、精细化工、新型材料、光机电一体化为代表的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等，将带动一批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此外，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要求更为方便舒适的生活条件，住宅、通讯、交通设备等将逐步进入一部分居民家庭消费。这种消费需求的变动必然拉动非生活必需工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重化工业提供原材料和技术手段，继而对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产生拉动作用。上述各产业链条传导过程，就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现阶段导致重化工业突出发展的根本动因。可以预测，以化工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将成为广东新的主导产业，必定拉动广东经济实现再度“起飞”。

2、第三产业比重将更快提高，这是经济结构迈向高级化的标志。

随着广东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市场经济的建设，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进一步提高。广东计划在2010年第三产业比例要占到64%。这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的过程，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的资源配置由初级化向高级化转移的过程。将从总体上使广东的资源配置得以优化，其他产业得以更快、更协调发展，从而带动国民生产总值以更高速度增长。此外，从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关系来看，国际上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金投入，而第三产业发展的关键则是依靠劳动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所以，发展第三产业，将成为广东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主渠道。

广东将以金融业为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真正建立起金融市场，积极发展股票、债券、委托投资、租赁等多种融资工具和融资形式。鼓励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世界主要的大银行及港澳地区

多数银行将在广东大中城市设立分行。同时，对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电讯、媒介、娱乐业及保健业等将逐步发展成具竞争力的行业，直接构成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条件。

3、区域经济格局清晰，这是经济结构变动过程中，资源重新配置的必然结果。

广东全省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经济发展带：在省内偏向于中南和东南的以广州和特区为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韩江三角洲地区是最发达的地带，偏向于西南的以湛江为代表的是次发达的发展带，广东北部大片的山区是欠发达的发展带。发达地带有较完备的市场条件，资金利润率高，对资金等资源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次发达和欠发达发展地带，资源却比较丰富。由于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资源丰裕程度的差异，而使发达地带加速经济结构转移，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较大提高，传统的工业如纺织、一般日用品、一般机械电子产品向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带转移。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带也将会进一步加快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依靠发达地带的先进技术加速本地第二产业的改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根据本地资源及基础的支柱产业，以取得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

## (二)

与上述广东经济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相应，我省教育结构调整和发展，也受经济结构变动的影 响。教育的发展既受制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对策。因此，我们必须将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决不能就教育论教育。经济结构不断升级换代，教育及其结构调整和发展也相应地有着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可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人民生活处于温饱及达到温饱以前的阶段。教育及其结构调整和发展的目的、目标就



只能是传授知识，培养技能，满足以发展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需要。此时主体生产力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的主导力量，而教育这种精神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则是初步的。

第二阶段，即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人民生活由小康向富裕社会过渡阶段。教育及其结构调整和发展的目的、目标是全面提高人类的素质，不仅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使之世代相传、不断创新，还揭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领域的规律和剖析社会总的发展进程，用以指导人类社会的科学管理、改造、调整和建设，以满足人类自身个性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

第三阶段，即人类社会步入富裕社会之后阶段。社会的发展目标将转变成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教育及其结构调整和发展的目的、目标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挖掘和开发人类的潜能。教育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合理的教育结构对经济建设也有促进作用。教育结构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框架、组合和搭配关系。广东的教育结构与全国一样，可以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四大块。教育结构是否合理，是教育领域的一个宏观问题，战略性问题。优化教育结构，就是要处理教育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关系和教育各体系、各层次的比例关系，建立较为完备的教育网络体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能够得到迅速培养。

如何优化和调整我省目前已形成的教育结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低重心的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

笔者调查的佛山市明确提出，市属和县属企业以及部分镇办大型骨干企业向高、新技术发展，成为经济发展和技术的龙头，构成金字塔的塔顶；镇级经济重点发展一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作为骨干，带动一批

派生和配套企业，成为金字塔的中部；村一级发展各种加工业，包含工业品配件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成为金字塔的底部。这与广东经济结构变动的特征是吻合的。

然而，我省的教育结构，我们不妨称之为“断层金字塔”式结构。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我省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小学生 1189 人，职（农）中学生 35.4 人，普通中学学生 372.5 人，中等学校（含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技工学校）学生 27.5 人，高等院校学生 15.3 人。大、中、小学生不成比例，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相当薄弱，普通中学生是职（农）中学生的 10 倍还多。在教育结构这座金字塔中出现了一个细部，如同“蜂腰”，这是比例失调的表征。对此，理应及时、彻底地调整，才能更好地为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服务。

我们应从省情出发，从经济结构变动急需大批有中等文人化，有初、中级技术的生力军的实际出发，全面考虑教育结构调整。如乡镇企业需要工贸、管理人才，农村需要医学和农业人才等，都是属于中低层次的。因此，必须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基础，把加强基础教育和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初、中级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尽快补平“金字塔”中的“蜂腰”。要从普通中学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城镇，更要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比例。同时还应改造普通中学教育，渗透职业技术内容。深圳市已实施了高中阶段的“2+1”教育，对高中学生，前两年安排基本知识训练和学习。然后根据升学或就业的需要，在最后一年分别选择相应的学习形式。这势必能够大大提高劳动大军的素质，也必定能够大大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实践早已证明，大办职业技术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

对整个高等教育结构，可将现行的大学专科层次归并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系列，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的教育层次加以

建设和发展。它的基本特征是，学历层次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称之为职业性的高等教育，对学生进行不同于本科教育的专门技术教育训练。深圳市、广州市辖的番禺市，由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报省政府批准，已成立了职业技术学院，培养专科层次的工艺型人才。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长远来看，应从人才开发战略的高度，逐渐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使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沟通的教育结构。尤其注重普通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相通、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相通的渠道，做到学制灵活，形式多样，更好地满足广东经济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要。

## 2、建立合理的专业群体结构。

广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使我省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核心就是学校的专业布局和学科结构，因为它既决定着学校教育是否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又决定着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的质量、水平及整体格局。据我们统计，我省现有本科专业 204 种，专业点 318 个，包括文、理、工、农（林）、医（药）、师范、财经（管理）、政法、体育和艺术等 10 大科类；全省有专科专业 187 种，专业点 415 种，平均每个专业设点 2.21 个。

我省这种专业种类结构，一是有些专业布点过多，本科专业布点 4 个以上的有 14 个专业，平均每个专业点招生人数在 60 人以下的有 7 个，占 50%，其中每年招生数在 40 人以下的有 4 个专业，占 28.6%；在专科专业中布点 4 个以上的有 32 个专业，平均每个专业点年招生数在 45 人以下的 18 个，占 56.3%；在专科专业的工科类 124 个专业点中，每个专业点平均年招生人数只有 25.58 人。二是专业结构不够合理，工、商、管理类的在校生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如工科本科专业招生人数占招生总数的 27.2%，专业点占 26.4%，均低于全国 36.2% 的平均水平；一些短线专业，如工科材料类、通信类、纺织类、交

通运输类和食品加工类等方面的人才，仍然紧缺，远远满足不了广东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三是还没有形成适应广东 201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需要的新学科、新专业群。

按照本文上述分析广东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对我省教育的要求，我省的专业学科结构调整和发展的目标就是主动与我省经济、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动相适应，满足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我省到 2010 年，第一产业的农、林、水和第二产业的工、矿的比重急剧缩小，第三产业的商业、金融保险、交通运输、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扩大，三大产业产值比例从 1990 年的 26:40:34 转变为 5:31:64。对于广东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急需的交通、能源、通讯、电子、轻工、纺织、石油化工、建材等专业应得到较大发展；农科要注意发展养殖、贮藏、保鲜、加工等方面专业，为广大农村和乡镇培养人才；医科要注意发展药物和保健卫生等短线专业；文科要注意发展短线应用文科；师范要增大培养高中师资和职业技术师资比例；还要创造条件建立新专业，发展短线缺门专业，增加应用型、外向型、交叉型专业，按经济、科技和社会要求更新专业结构，建立合理的专业群体。实行全省统一布点，重点扶持，形成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调补的专业学科网络，努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 3、建立优化的教育结构。

随着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社会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种类将常有变动，要求开展各种就业和转业的培训，各种继续教育和补充教育将要相应发展。

在形式结构方面，重普通教育轻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中重学历教育轻岗位培训或继续教育的现象还普遍存在。特别是大学后继续教育，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据调查，广东现有专门人才队伍的素质，包括工程师、大学教师、管理干部在内，都急待接受继续教育，这已是社会发展的客

观要求。我们应该依托普通高等教育来发展成人教育，向各类成人教育开放普通高校的图书馆、实验室及实习工厂；允许教师在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流动或交叉兼课；从在职人员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人士接受更高一级的专业知识教育，入学者不受年龄限制；我省已在普通高考的应届高中生招收一部分考生就读成人高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形成纵横交叉，互相联系，互相衔接，丰富多采的网络式的教育结构体系。

#### 4、建立多梯度的区域教育布局结构。

广东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呈梯度分布状态，中南和东南的珠江和韩江两个三角洲地带，以湛江为代表的西南地带，以韶关为代表的北部山区地带。在这三类地带内部，又有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程度的区域梯度分布。据历年有关指标统计结果可知，广东的这三类地带，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等级等方面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在经济、科技和教育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教育及其相关的国民文化素质对发展经济的巨大作用，在广东这三类不同地带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教育的发展过程在这三类地区是极不平衡的。

我们在考虑区域教育布局结构时，既要根据各类地区经济、文化水平确定不同的教育规模 and 水平、专业结构、教育体制

和组织形式，又要注意发挥教育在改变当地经济、文化格局中的积极作用，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以此思路建立起多梯度推进的区域教育布局结构。这种结构的要求是：中南和东南发达地带，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逐步达到普及高中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教育结构；西南地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将投入主要精力构建比较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北部山区将首先巩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逐步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争取在全省形成若干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融为一体的区域教育结构。

总之，广东教育结构调整与发展的目标，一是稳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使各块教育互相沟通。二是在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注重初中后教育，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注重高中后教育，使教育层次结构更适应广东经济对各类人才的要求；三是调整专业结构，重点发展市场急需的专业，及时构建新专业；四是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建立教育区域合理的布局结构。

作者梁英，广东省教育厅副研究员（510080）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论邓小平的道德范式

## ——兼评道德政治化与道德经济化

□李权时

所谓道德范式，乃是指决定一种道德形态的根本面貌和属性的核心命题，其基本内容是道德、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道德范式一旦出现了根本性的、重大的变化，整个道德形态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重大的变化。因此，确立一种新的道德范式，不仅对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理论有决定意义，而且会引起整个道德领域的巨大变革。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范式的根本转变，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道德范式。

中国是礼义之邦，自古以来道德不仅是调节人们关系的一种强大力量，而且往往同政治结合，成为政治伦理，被置于至尊地位。因此，在传统道德中，其道德范式是以政治为中心，道德与政治相结合，并居于经济之上，经济则居于从属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道德范式的写照。这种道德范式颠倒了经济与道德、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它把道德与经济、利与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崇尚道德而贬抑经济，“重义轻利”。它认为搞经济就是言利，而“利”与“义”是绝对对立的。这种道德观看经济，经济总是消极的、被动的、低级的、庸俗的，所以越是要发展经济，就越是要用道德从外面来约束它、牵制它、限制它，这样才使它不致走向邪路。这种道德范式，既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道德和政治的发展。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破除旧道德和建设新道德过程中，不断确立自己的道德范式。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就奠定了道德文化的范式，他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

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sup>①</sup>“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sup>②</sup>非常清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范式，包括道德文化范式，定位为阶级斗争，这一范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

建国之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包括道德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范式应该是什么？这一时期，我们党作了积极探索。党的“八大”对这一问题作了正确回答。党的“八大”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整个文化范式包括道德范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可惜，党的“八大”这一正确理论和路线未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相反阶级斗争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阶级斗争越演越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样，不但未能使党的中心工作实现转移，文化范式不能实现转变，而且把阶级斗争推向极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指导原则，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阶级斗争大大强化的情况下，道德过于政治化，而政治又过于道德化，结果是“道德至上”与“政治挂帅”融为一体，居于至尊地位，道德建设被推向歧路。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道德范式根本性转变出现了新的契机。但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的出现，给新的契机蒙上阴影，邓小平敏锐发现这个问题，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截了当批评“两个凡是”，指出：“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sup>③</sup>真理标准大讨论比较好地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整个文化范式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sup>④</sup>他还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sup>⑤</sup>他一再强调：“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sup>⑥</sup>邓小平关于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是社会发 展范式的根本转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道德范式也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我们进行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为范式，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则采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范式，党的一切工作，包括道德建设都要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运转，服从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演变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中国又面临着严重的抉择：重新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范式中去，还是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路线新范式继续前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具有

重大意义的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指出判断姓“社”和姓“资”，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实践标准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体现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决心，同时也说明了邓小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文化的范式更加坚定不移。

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范式在否定道德政治化的同时，提醒我们要防止另一个倾向：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道德建设。他明确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sup>⑦</sup>反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sup>⑧</sup>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sup>⑨</sup>因此，他一再指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sup>⑩</sup>

上述说明，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范式，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道德与经济、道德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既要防止把道德建设置于经济建设之上，防止道德政治化，又要防止用经济工作来代替道德建设，防止道德经济化，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为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邓小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范式是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条件下形成的，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经济建设。在旧的道德范式中，阶级斗争是中心，道德是一种政治道德，它被置于至尊的地位，经济则处于从属和服从的地位。在新的道德范式中，经济建设是中心，道德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不是影响、限制、束缚、冲击经济建设。

第二，着力于发展生产力，以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为首要任务。不同的道德范式，其根本任务也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为纲的道德范式，为阶级斗争服务，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服务，为“反修”、“防修”，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第三，育人为本，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道德的主体，无论什么类型的道德，都会涉及人，对人作出判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道德范式，人是阶级的人，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的关系，在敌对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内部存在“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存在着“兴无灭资”的斗争，要“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这种“斗争哲学”环境中，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人人都被斗得精疲力尽，遍体鳞伤，一个又一个被斗倒了，一代又一代人被毁了。很清楚，这种道德范式是一种“毁”人的道德范式。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其根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有实现现代化的知识和本领，这就促进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使社会主义新一代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一代。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的目标是‘四有’。”这就说明，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是一种培养和造就新一代的道德范式，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一种道德范式。

第四，轻“破”重“立”，重在建设。一种新道德的确立和发展，是以破除旧道德为前提条件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伴随着对旧道德的批判、破除和否定。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的的确立和发展而对旧道德的扬弃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道德范式“以大批判开路”有本质区别。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扬弃，辩证的否定，后者是打倒一切，简单的抛弃；前者轻“破”重“立”，重在建设，积极探索，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用新观点、新经验、新材料丰富道德理论，促进道德建设，而后者重在批判，片面强调“破字当头，立

在其中”，结果只“破”不“立”，给道德建设带来严重后果。

一种新道德范式的的确立，给道德建设带来巨大变革，作出重大贡献。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的的确立，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把道德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坚持和发展了道德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伦理学的重大问题。在古代由于“重义轻利”的影响，使“道德与经济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成为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思维习惯。在我国“左”的思想盛行时期，道德过于政治化，使“道德至上”与“政治挂帅”融为一体，居于至尊地位，凌驾于经济之上，这是一种道德唯心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把过去那种道德至尊，置于经济之上的关系颠倒过来，摆正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使道德重新座落在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各自正常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的的确立，在道德领域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的的确立，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进行道德建设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了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为道德建设指明正确方向。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出了许多新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建设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进行道德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的建立，为建构一种新的伦理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无疑要形成新的概念、新的范畴。但是科学体系不是概念、范畴和规律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由概念、范畴、规律按理论逻辑发展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严密体系。理论框架是科学体系的“骨骼”，是概念、范畴、规律相互

联系的基础。理论框架建构不起来，科学体系就难以形成。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为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建构了一个科学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德范式，使道德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有利于道德建设，使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邓小平一方面指出经济建设是中心，强调经济是基础，对思想道德建设有决定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sup>①①</sup>“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sup>①②</sup>邓小平这些思想，正确地反映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充满着辩证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范式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道德、经济、政治相互关系的辩证思想，为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当前，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中，要牢牢把握邓小平为我们指明的方向，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防止片面性。

道德政治化的倾向，仍然需要继续注意防止。道德政治化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它往往把道德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把道德视为政治，在我国“左”的思想盛行时期，道德政治化往往同“左”的思想连在一起，党和国家的重心工作转移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左”的错误在政治路线上已得到了纠正，但在思想上并未完全肃清，也不可能完全肃清。“左”的思想不仅根深蒂固，有深厚土壤，而且有不少市场。在思想道德领域，道德政治化的倾向或影响以及其他“左”的流毒，常有发生，诸如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思想道德置于经济之上，颠倒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把道德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更有甚者，把本来属于道德的问题，作为犯罪问题来处理，不仅混淆了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而且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政治原则、政治标准分析道德的状况，判断道德的是非；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属于个人的爱好、个人的生活方式，但并不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行为，也视为思

想道德问题，甚至上纲为政治问题，等等。在防止和反对两条思想战线的倾向斗争中，进一步肃清“左”的流毒和道德政治化的影响，仍然是思想政治战线一项首要的长期的任务。

我们在防止和反对道德政治化的同时，也要防止和反对道德经济化的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近几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了一些道德经济化的现象，这是值得注意的。诸如，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来属于思想道德的问题，往往作为经济问题来处理，企图用经济工作、经济手段来代替思想道德建设，甚至一些违法乱纪的事，也简单用经济处罚、经济制裁了事，大大削弱了思想道德建设；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经济原则、经济规律来取代思想道德原则、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导致道德无序和失范，给泛道德思潮开了方便之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经济标准、经济效益作为判断道德水平高低的尺度。经济效益好，一切均好，甚至不加分析地把是否有钱、是否会赚钱作为是否善的标志，有钱就是善，就是道德高尚。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戴上各种桂冠，包括善的桂冠，不加分析地把钱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必然导致金钱道德；自觉或不自觉地崇尚“钱能通神”的道德价值，导致“一切向钱看”，大大弱化了道德的力量和道德的约束，等等。这种道德经济化的现象不仅时有发生，而且有发展的趋势，必须加以警惕和防止。

道德政治化和道德经济化的倾向都是偏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道德范式的结果，偏离邓小平关于道德、经济、政治辩证思想的结果。我们要防止和纠正这些错误倾向，要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

③⑤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250、249页。

④⑦⑧⑨⑩⑪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48、144、154、306、144、154页。

作者李权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510045）

责任编辑：童 轩

# 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历史形成

□赵玲玲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和发展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成功地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相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又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和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他强调中国的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十大关系。同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目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今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幸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连遭严重挫折，使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探索中断。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1956年以来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理论、政策、方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历史的准备。邓小平同志继承了1956年以后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理论成果，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孕育、确立、深化并形成理论体系三个阶段。

1、孕育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这个理论逐步发展，形成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为我们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在确立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起草的，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的十个主要点。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十二大和十二大以后的五年，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逐步拓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至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成雏形。

## 2、确立阶段（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

这一阶段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基本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农村致富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还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党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党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相适应，理论方面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得到确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党的十三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观点作了科学的总结和概括，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党的十三大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12个基本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轮廓。

## 3、深化并形成理论体系的阶段（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

十三大以后的五年，是我们党经受一系列严重困难和考验，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更加走向成熟的五年。在经济上，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也出现了总量失衡、通货膨胀、重复建设等问题，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在政治上，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适时地平息了这场风波，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在国际上，相继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事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制裁”，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集中注意力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这一系列严重困难和考验面前，我们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了人

民，克服了困难，在国际国内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这五年中，党不断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和概括。特别是邓小平同志 1992 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在精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更为全面、系统、完整、准确的概括，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论点，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在趋于成熟。

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许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把这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条，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五大站在跨世纪的历史高度，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深刻地论证了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理论根据，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对时代特征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进行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确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向全世界昭示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使邓小平理论如丰碑屹立在世界东方。至此，邓小平理论初步完成。

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

实践结合起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外交、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要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既是立国之本，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它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目标。在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革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统一的问

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邓小平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对我国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最深刻的理解；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亲自领导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20世纪中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的伟大人物，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最为重要的，乃在于他最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的理论勇气。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要著作，是科学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它生动而鲜明地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历程。

作者赵玲玲，广东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510090）

责任编辑：思 哲

# 试论“知识”之定位问题

□钟少华

一、“知识”定位于“常识”和“精确知识”之间

## (一)“常识”定位

常识之意义：

人间社会流传的全部概念。

社会上的一般态度和信仰。

一般人的宇宙观。

日常生活之习惯。

头一次观察之见解。

常识之特质：

日常生活中随意使用的认识工具。

无须深思，更没有反省习惯。

其兴趣在目前、直接、实际、兑现。

但求貌似，不求正确。

未经批评检验，理论不健全。

常识之分类：

族类偶像（万人意像）：指由历史积累下的习惯与观念。其特点是经常从前提直接跳入结论，更忽视反面证据。

洞穴偶像（各人伪像）：指由个人环境限制下的行为与意感，即坐井观天之意。其特点是见解偏激，喜趋极端，自以为是。

市场偶像（市井伪像）：指由群聚关系所产生的语言与名称的混乱而造成的误解。其特点是咬文嚼字，拘泥于表面文字，常常是以辞害意或辞不达意。

戏院偶像（士学伪像）：指由各学派的混乱，造成盲目崇拜古人和追求时尚，如编戏演戏一般。或者是流行之宗教垄断的思想体系中的谬见。其特点是门户之见和党派之争。

权威偶像：盲从权威迷信专家之谬见，或者是因经济利害的诱导而需要的盲从。其特点是不求甚解，先入为主。

就范围来说，“常识”是在人间流传的

全部概念，是包括从古到今的全人类所曾有过的全部概念；而“知识”则是在“常识”海洋中经过选择的精品，是需要经过具体个人的体验与思想、经过个人的观察与实践、也即经过每个人的感觉与悟性，才能够获得的个人知识。其间必然含有将“常识”中不符合个人判断的概念排除掉这样一个过程，常言道“实践出真知”、“三思而后行”、“七次量一次裁”，就是说明这样的过程，从“常识”中经过选择而上升到“知识”的过程。从“常识”中获取“知识”，其实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是教育与学习所必需的。如果我们不去接受科学教育和逻辑教育，仅是依靠时代环境所承袭流传的常识，包括有文字的“上天之言”和无文字的口头指示，我们都会从这些古人遗产中大吃苦头。如果我们从群众常识中来，再到群众常识中去，那么我们就没有进步可言了。常识像是人类制造的一艘有许多漏洞的大船，以此船载上人类去追求人类的幸福真理，那是没有希望的。而“知识”恰恰是经过实践体验后的清晰的解释标准，知识是人类经过奋斗得来的，就是用来分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答案和方法，知识至少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以“知识”结构的大船，是能够载人去追求幸福真理的。知识船上还是有漏洞的，但是是可以控制的，可以调节的，可以不影响航行。

不过需要明白，具体的“知识”和“常识”之间，是没有绝对界线区分的，某个远古时代的“知识”，到后来就变成“常识”；某人的“常识”，对于另外一个人很可能就是“知识”。“知识”与“常识”的具体区别，是要看其整体效应的，是要看其所在时代、人际环境、个人文化素质

等因素而变动的。

## (二)“精确知识”定位

精确知识之意义:

广义:凡具有组织,而成为一体系之知识,归纳而成原理者,皆属于精确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哲学、史学、信息学等。本文用之。

狭义:专指应用实验方法研究所得,归纳而成有体系之知识而言。例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在目前中国常用此专指为“科学”。)

精确知识定义举例:

“分类之事实是也。”(Pearson)

“凡根据凭证及推论之一切知识之谓也。”(Huxley)

“即有系统可以证明可以传达之知识,系由观察、实验、记录、测量、客观之材料而得者。”(Thomson)

“我们人类对大宇宙探险之历程也。”(Richards)

“我们对宇宙欲得一种清晰的概括及有系统之知识之企图。”

“是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

精确知识之目的:

获得事实。

寻求真理。

解释因果。

概括原则。

精确知识之特质:

思维寻求原则,升华情感及愿望。

反省解释科学思维所遗漏或差错的问题。

思维追求知识全体,包括分析综合摘其纲要。

思维直接而彻底探索事物最后之真象。

求知事物所以然之道理。

精确知识之步骤:

收集事实:观察,实验,建立网络等。

叙述事实:界说意义,分析整理,综合结论,分类材料等。

解释事实:指出近因,共变之关系,自然齐一律等。

由常识到精确知识:由无训练到有训

练,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广泛到精密,由模糊到精确,由特殊到一般,由散殊到总汇,由具体到抽象等。

由精确知识到常识:由专门到普及,由技术到应用,由理论到实践,由高深到浅易等。

比较“精确知识”与“知识”的定位,就明白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范围不同,追求不同,方法不同,层次不同。可以肯定“精确知识”就是“知识”中的精品,是人类经过几千年不断努力奋斗,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所谓精益求精的成果。寻找“精确知识”的过程,正是人类知识进步史,这是一个十分艰苦、十分曲折、十分引人入胜的过程。但是可以说,时至今日,人类所获得的“精确知识”,对于全宇宙的未知状态,恐怕还仅是九牛一毛吧。

在人类精确知识与知识和常识之间,是有层次的区别,但没有明显的界线区别。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自身时,不断地从常识中提取知识,再上升到精确知识,这就是人类进步发展的过程;同时,人类又不断地将精确知识和知识,向常识中推广,给人类以广泛的应用。从常识到精确知识的双向流动,是互相补充的,是加速人类生活丰富多彩又趋向理想的有力行为。

## 二、“知识”定义

知识是人生的一部分,知识现象是人生现象的一部分,知识在宇宙中所占分量十分微小,知识现象在宇宙现象中更为狭窄。知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是研究人类知识的道理,当然与哲学研究宇宙的普遍的绝对的道理不同。但是人类是主观的主体,宇宙是客观的客体,知识则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人类的知识既可以了解哲学理论,又可以认识哲学体系;整个宇宙的普遍的绝对的道理必须人类知识才能够有所显示,理想的哲学体系必须依靠人类知识才能够有所表现。所以,知识既与人生密切相关,又与哲学密切相关,并且

其本身是一种变量，又充满活力，个人探求知识是生活中最大的乐事！人类探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动态！

我们先看看前人所给出的知识定义。由于中国传统知识概念与西方传统知识概念很不同，只好分两部分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们所用的定义。

### 1、中国人用过的知识概念

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对于“知”这个概念很重视，很多人曾经大量运用。“知”在古书中广泛出现，但其内涵要比“知识”广泛得多，所以我们不能够将“知”就等同于“知识”；而且，古代将“知”和“识”连用成“知识”，一般也有两种意思：一是如会让梨的才子孔融曾经说过的：“海内知识，零落殆尽。”这里指的“知识”是说认识的朋友而言；另一种意思，则是同现代相近的，但是很少见。如唐朝诗人韩愈所写：“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应该解释作人类处在宇宙万物中，掌握知识是最为重要的。可惜他的用法并没有在中国推广，依然还是混合用泛泛的“知”的多。例如：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周易·大畜》）

“知几，其神乎。”（《周易·系辞下》）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子·47章》）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论语》）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战国策·魏策》）

“一举兮知山川之迂曲，再举兮知天地之方圆。”（《贾谊·惜誓篇》）

“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王充《论衡·别通篇》）

“人有识真之明者，不可欺以伪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诳以浅也。”（葛洪《抱朴子·博喻》）

到20世纪初期，由于中国处于大变革

之中，现代化的浪潮卷进中国文化中。“知识”一词如何一下子就赋予现代概念了？笔者是还不敢下定论，但是笔者注意到日本人在1868年发布“五条誓约”，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其中就有一句：“求知识于世界。”此话对于日本民族当时的进步曾经起到很大作用，对于后来受“甲午海战”刺激而向日本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起到很大作用，因而在后来的一些中文书中，就陆续有一些有关“知识”的现代定义。

汪荣宝、叶澜在1903年编辑的百科辞典《新尔雅》书中，有两个解释：

“在教育上专发达人之理性，使多得知识者，谓之知识主义。”

“既生主客观对境之分别，而其体用共为意识者，谓之自觉。自觉则近乎知识矣。”①

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前夜，有一位署名“天民”者，在《教育杂志》上长篇论述，其中谈到：“知识二字，与英语之 Knowledge）又 Cognition，法语之 Connaissance，德语之 Erkenntnis 相当。时有单称为‘知’者。此亦有广狭二义。广义之‘知识’及‘知’，为包括作用状态及结果内容者；狭义之‘知识’及‘知’，为依理知作用及认识作用而得之精神内容，适当于 Knowledge。吾国语之‘知识’即此狭义也。……知识为由广义之判断作用（包括知觉、概念、推理及直觉）而成立者，故依于判断作用性质之异，而于其间生种种之别：第一，为由知觉作用而生之知识，所谓常识是。第二，为由概念作用以上之判断作用，而生之知识，所谓学之知识是。而唯此第二者为严密意味之知识。故以严密之意味而言知识也，非唯与感情作用、意志作用、感觉作用有异，又与单纯之意见、想象、假定、直觉、信念，亦复有别，盖具有论理的确定性也。”②

到1926年出版的《哲学辞典》中，条目“知识”如下：“一、泛指意识作用之认识方面。从此谊，则与认识通用。普通别之为二种，一曰直知的知识（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 二曰关知的知识(Knowledge about)。凡言知, 本可解作感知(Perceive)之义, 亦可解作理解(Understand)。从第一义, 则知识不外直接认取之谓。从第二义, 则是从知性比较之结果, 而以断定之形式表现之者。奥图(Otto)举例以说之, 至为明显。曰: ‘盲者虽无光线之直接的知识, 而能有其关知的知识; 又如大地之为球形, 此亦不能直接知, 而出自关知者也。’ 其设为直知与关知之别者, 本约翰格罗德所创意, 而詹姆士、奥图皆袭用之。法语之 Connaitre 与 Savoir, 德语之 Kennen 与 Wissen, 颇与此区别相当。二、知识一语, 往往与之对‘私见’或‘信念’而言。知识, 谓立乎客观的根据之上, 具有确实性者。私见或信念, 无斯根据, 但有主观的之确实性。顾此种区别, 其非从心理学上立言, 无论也。三、亦有不以知识一语, 指知之之用, 而指其所知之物者。如以理化学, 为一种知识, 是其义也。”③

后来在1930年出版的重要工具书《教育大辞典》中, 完全照抄《哲学辞典》中的“知识”条目。到1987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 李德顺先生写的“知识”条目如下: “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事物的了解, 其中可靠的成分就是知识。依照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程度, 知识可以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生活常识是对某些事实的判断和描述。科学知识是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事物的知识。科学知识也有经验的和理解的两种不同水平。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认识的结晶, 又是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知识与无知对立。从无知到有知识, 知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不断运动, 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知识的发展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化和扩展。这种处在辩证运动中的知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不

可逆性和加速度增长等特点。”④

平心而论, 中国古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色, 对于“知识”的深入研究, 是相当不够的, 也即是缺乏“知识论”。这恐怕是因为古哲人觉得没有需要, 一是并不将宇宙分为主观与客观两大对立面, 即并不区分物与我的根本对立, 这样就不会以主观的我, 运用各种方法, 去认知客观事物的根本结构因由; 二是哲人们只是强调知道有我, 不用去知道有物。所以他们是自其本身的我去向外推广, 家庭也说是我, 国家也说是我, 天下也说是我, 亲属也说是我, 人类也说是我, 时间也说是我, 空间也说是我, 天地也说是我, 总之连整个宇宙也说是我, 所谓本身之我说是小我, 宇宙之我说是大我。哲人们都是努力去扩充其小我, 以追求成全其大我。他们并不以本身的我以至宇宙为对象的物; 他们更不以本身为主体, 去以宇宙为对象而进行研究。三是哲人们都强调重道德而轻知识, 实际上的重行轻知。他们的标准是只要有高尚的道德, 虽缺乏独到的哲学体系, 就可以称为哲人; 而如果没有高尚道德, 虽有独到的哲学体系见解, 也不能够称为哲人。古哲人们对于行和知的关系, 表面看有许多争论, 但是并没有因而发展知识论。例如一派强调“知易行难”, 无非是说行多阻力, 行贵有终, 所以勉励人有行也; 另一派说“知行合一”, 是说知所以行, 行贵贯彻, 所以勉励人于行也; 再一派说“知难行易”, 也只不过说行贵有勇, 且有终始, 所以勉励人于行也。总之不管难易的“辩证统一”, 反正要求人去“行”才是根本。四、如果有人强调仅用“知”, 而不用“行”, 那可就绝对要说“不”了。被哲人们斥为知解, 斥为鹜外, 斥为不切己, 斥为空言论; 并且将“知”的理论看作卑贱的, 看作可耻的。这样搞了千余年, 所谓传统就形成了。

中国古哲人虽缺乏研究“知识论”, 但是并不妨碍中国有高深哲学。反倒是正因为如此, 中国传统哲学鼓吹将宇宙人生合一, 即所谓宇宙即人生, 人生即宇宙; 在



宇宙中求人生，在人生中求宇宙；舍弃宇宙即无人生，舍弃人生即无宇宙；宇宙是人生观的宇宙，而人生为宇宙观的人生；宇宙既为人生观的宇宙，故为亲切的宇宙；人生既为宇宙观的人生，故为伟大的人生。但是这样一来，将宇宙与人生合一的理论，美好则有余，分析清楚就很困难，对于宇宙乃至人生都不能够获得深刻的认识，美好的理论不能转变成美好的现实，更难以有现实知识的进步。同样，古哲人最重要是在立德，然后才是立功，至于立言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重要。所以鼓吹的理想人生，是在内圣外王，并不在著书立说。所谓内圣，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这一套修炼，形成内有圣人之德；所谓外王，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一套，形成外有王者之功。只有到这位人物，已经修炼有圣人之德，即内圣了，但是没有赶上圣人之位，也即是没有外王了，于是只好退而著书，以安慰其“想做官”之心意，乃是一种不得已的“安慰奖”。既然是不得已的著书立说，则无心作详细的分析、精密的研究、科学的系统了。试想这样的知识观流行于中国千余年，能够促进知识论大发展吗？这样知识观指导下的著书立说，能够产生伟大精神产品是可能的，但是是偶然的和极其困难的，并不是导向的结果。

## 2、外国人用过的知识概念

从远古西方文明来看，知识概念在西方许多民族中是普遍关心的生活原则之一，在早期书籍中留下许多探讨的记载。如果略加排列其中内容，就是一大部“西方知识发展史”。

公元前 400 多年时候的历史学大家希罗多德曾经在书中写道：“具有丰富的知识而又不能控制行为，这是所有人类疾病中最痛苦的。”

同样是公元前 400 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道：“知识是精神的粮食。”他又说过：“真正的知识是道德。”

在公元前 300 余年间建立“知识论”的大师亚里士多德，更是对于知识有成套的论述。他写过：“要确定一个人是否认识

或没有认识一件事，是困难的；因为很难确定一个人的知识是否植根于和适用于每一属性（即真知识的特性）的基本真实性。如果我们从真实和原初的前提出发作出推理，我认为我们就具有科学的知识。但是这种情况却不是科学的知识：结论必定会与科学的基本事实同一。”他又写道：“从本性上讲，所有的人都想获得知识。我们在感觉中感受到快慰就是一个例证。即使脱离其实用性，它们在其本身仍觉得可爱。”

13 世纪的哲学家阿奎那则写道：“某些知识纯属是思辨的；某些知识纯属实践的；某些知识一部分是思辨的，一部分是实践的。”

为文艺复兴带来新思想和新工具的英国培根先生，他的看法更是很有说服力的。他写道：“对上帝的造物和工作的沉思（当涉及到工作和造物本身时）产生了知识，但涉及到上帝本身时，却没有完满的知识，只有知识破灭后的惊异。”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是近代知识论研究的鼻祖，他给“知识”的定义是：“所谓知识，就是人心对任何观念之间的矛盾、排斥和联系、契合的知觉。”后人因之将洛克说成是知识经验论的发起人。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写道：“知识，对大多数涉猎它的人来说，只是一种货币。他们把它的价值看得很高，但其程度还得以它在交换中的情形而定，它的好处仅在于商业。然而，假如从学者那里去掉获取知识本身的快乐，知识对他们就无甚价值了。”

进化论的鼓吹者英国赫胥黎教授则写道：“在科学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学问和知识是两码事。后者的源泉就在于研究事物，而不是研究书本。”

现代哲学家英国人罗素先生，在具有现代环境下的深入思考后写道：“我们难于定义知识，难于确定我们是否具有任何知识；而且，即使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具有知识，也难于发现我们是否曾经知道：在各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具有知识。”如果

把现代哲学家桑塔亚那的见解也摆在一起，就更可以促使我们作点深思。他写的是：“知识并非进食，我们不能企望吞掉或占有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知识是对某种尚付阙如的东西的确认；它是打了一个招呼，而不是拥抱。正因为它是具有表情性的东西，它才对感觉有所推动。”

从以上西方人的言论中，已经可以获得关于他们对“知识”的判断。但是这还不够，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探索，例如从拥有知识和无知来比较看法，也就够有趣的了。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在他写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录：“我访问了一位以智慧著称的人，想在彼处反驳神谏，复谏语曰：‘此人智过于我，你却说我最智慧’。我见了此人，——不必举其姓名，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对他的印象如此：和他交谈以后，觉得此人对他，显得有智慧，可是不然。于是我设法向他指出，他自以为智，其实不智。结果，我被他恨，被在场的许多人恨。我离开后，自己盘算着：‘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不知。我想，就在这细节上，我确实比他聪明，我不以所不知为知。’”

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说过：“无知——界定为并非对知识的否定，而是作为心灵的一种肯定状态——是由推理产生谬误。”

蒙田则还有一种很深刻的判断，他提出在掌握知识之后，还很可能再因而培养出无知来，确实有历史的深刻教训。他写道：“有某种把握可以说，在知识之前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无知；和另外一种在知识之后的教条的无知：这种无知是知识创造和培养的，就像知识在开初要抛弃和消除无知一样。”他后来还接着说：“这种无知的发现，比知识本身更需要知识。”所以知识就绝对不等于真理，掌握知识也可能再创造无知，这可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人类文化中的现实。

作家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吟颂道：

“有一株叫做知识的树，不准他们吃。

知识得禁止吗？很可怀疑，没有道理。为什么他们的主宰要嫉妒知识呢？知识是罪恶吗？有知识是死罪吗？他们只靠无知无识就能立身吗？无知无识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涯、他们顺从和忠信的保证吗？”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知识树”是具有关键性位置，亚当和夏娃正是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才获得知识的启蒙，才能够在人间传播善和恶、美和丑等等知识，才使得西方各民族衍生繁荣至今。弥尔顿的诗句当然表现了西方传统关于知识是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更能够从以上引用的智慧的系列名言中，观察到他们的知识观念发展脉络是清晰发达的。

以上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对于知识所给出的定义，已经足够多了，读者自己愿意选择哪一种定义，尽可自便；愿意批判哪一种定义，更随你高兴或需要。笔者最怕的事就是因某名人有句名言，而为了自己的需要，在他们不能反驳的前提下，任意给名人划分政治类别，用自己才明白的派类来任意糟蹋他们，其结果对名人名言是毫无损伤，而将自己的无知是当做光荣了。

那么，笔者自己对于以上名人名言有何选择呢？首先是认为深受教育和启发，向他们脱帽致敬；其次，将这些判断知识的知识，应用到自己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那一种见解适合于某类现实活动，就明白前辈确实没有骗笔者；对于另外某类现实活动，可能另外一种见解读起来并不合适，那也并非前辈骗笔者，而是笔者的知识有所进步，笔者将会更高兴，同时就选择更合适的新见解，包括自己编出来的见解；第三，是否需要知识也给出一个自己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已经是很小的事情了。由上可知，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定义成立，能够躲得过那些“批判专家”的明枪暗箭。为此笔者又能够从中作什么高明的选择呢？反正所谓人类知识，总离不开人类对环境对自身的认识过程和理性悟解过程，从而所获得判断或疑虑；知识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又带

来更多的知识问题；只要人类存在，人类永远就在知识海洋中选择、判断、怀疑、利用、论争，换句话说，即是“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问题，目前并没有解决；那么，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与天之间的强作对立的论战，不如将精力用于对知识本身、来源、关系、应用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可以肯定会是21世纪人类所十分必要的知识。

总结笔者对于“知识”定位之看法，依前也简短概括如下几句话：

知识之特质：

体验与思想的结果。

观察与实践——知识之途径。

经验——知识之起源。

观念——知识之单位。

信仰——知识之结晶。

思考——知识之渊泉。

回想——知识之保存。

信息——知识之触角和载体。

知识之范围：

知识是常识中的精品；精确知识是知识中的精品。

叙述的知识——一事一物之近因——零碎片断无组织——常识。

说明的知识——一类事物之众因——摄取种类部分组织——科学。

解释之知识——万事万物之总因——包罗万象全部组织——哲学。

知识之定义：

人类对环境、对自身的认识过程和理性悟解过程，从而能获得判断或疑惑的概念；知识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又带来更多的知识问题。

知识之分类举例：

依方法分类：

经验的——知其然——实际经验之体验。

理解的——知其所以然——经验之因果解释。

引伸的——知其应然——物理法则之假定。

实证的——知其果然——实验之证明。

依组织分类：

相当无组织者——常识。

部分组织者——科学。

完全组织者——哲学。

---

①汪荣宝、叶澜合编：《新尔雅》，上海明权社，估计出版于1903年6月以前，第56、64页。

②《教育杂志》11卷2号，天民文：“哲学之概念”，1919年2月20日，第12—13页。

③樊炳清编：《哲学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352—353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9页。

作者钟少华，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100101）

责任编辑：罗 苹

# 儒家思维的整体特征与内在缺陷

□叶金宝

一

儒学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概括。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儒学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所谓思维的整体性是指：从与它事物或它方面的关系和比较中来认识、把握和评价认识对象，不是把认识对象看成是孤立的或分隔的，它强调认识对象的时空连续性与系统性。儒家思维的整体性特征，宋儒张载有很好的表述：“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正蒙·动物》）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来看，有学者认为西方传统思维重实体，中国传统思维重关系，我认为是在把握住了中西文化的特点。

儒家思维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其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形式来看，儒家思想的许多概念、范畴具有综合性和融通性的特质，许多概念、范畴往往同时具有宇宙论、伦理学、认识论的意义。在概念、范畴的界定方法上，它用的不是属性抽象法，而是用“观象取类”的方法从总体上、从运动过程中来把握对象的具体存在特征。这样，概念范畴就显得笼统而不确切，外延界线朦胧而游移。<sup>①</sup>在判断、推理方面，儒家善于用比喻、象征、类比等形式来说明问题。从内容来看，在世界观上，强调天人合一；在认识方法上，注重体悟、直观；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强调群体本位，强调个体的价值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实现，个体只有在整体中、作为整体的一分子才有意义。因而，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家、国、类、群体的意识较强，而个体意识较弱。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

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在政治的层面，儒家整体思维表现为大一统的政治追求。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这种观念。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将所到范围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表明了政治大一统的理想。这种理想追求在儒家文献典籍中常常可见，例如《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对礼、乐、征、伐不能自天子出而自诸侯出大为不满，《孟子》希望天下能够“定于一”，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在价值与意义的层面，儒家整体思维表现为对和谐的追求。有人认为“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是‘和谐’。”<sup>②</sup>追求和谐是儒家文化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它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诸多内容。早在西周时期，史墨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和同观；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主张“执两用中”、“礼之用，和为贵”，成为儒家和谐思想的理论基础。天人和谐、知行和谐等和谐思想也是以后各时期思想家们探讨的重要内容。这种和谐思想，一方面容许差异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强调矛盾的统一，从而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辩证法。它的经典性表述就是“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儒家的整体追求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从思维和认识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历史的层面看，它都有其正面价值。

在思维和认识的层面，儒家的整体思维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一些非理性因素，带有较强的主体参与意识，而比较缺乏客

观而严谨的逻辑分析研究。从人类的认识活动的全过程来看，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主体的参与，纯粹客观的过程是不存在的。现代思维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科学预设与研究人员的灵感在科学发明与创新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文化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先于逻辑的（prelogical）概念和表达方式之上。”<sup>③</sup>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儒家的整体追求在社会历史方面也有其正面价值。以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历经内忧外患而能绵延存在，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也不能否认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那么，这个现象后面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的力量。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对民族的凝聚力起了重要的作用。儒家整体主义的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有人就说：“就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大概正是宋明理学所发展所突出的儒家整体本位主义精神，强有力的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内向凝聚力、整体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克服内部忧患、抵抗外来侵略的整体坚强意志和自强不息精神，从而使中华民族文明的巨大实体延续几千年而不衰。这大概是整体本位主义精神的优越性和巨大力量所在。”<sup>④</sup>

儒家文化的整体追求使其具有很大的同化力与包容性。儒家文化在世界观上强调天人合一，它把万事万物都看成是相通的，没有隔阂的，把自然看成是善的，那么，它自然也就具有一种博大的情怀，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民胞物与”，正是这种写照。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说：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此种组织与团体组织是不合的。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它由近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

⑤反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也是没有明确的界限的。从儒家文化的主体来说，一面是包容，一面则是排斥，力主华夷之别，但这种区别本身是宽容的。在族类的区分上，儒家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同，四夷宾服，协和万邦，而不是小范围内的利益。它主张用高势能的文化来感化周边民族和国家而不是用武力来征服。具体而言，就是以仁德化成天下。正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包容性与同化力，在历史的发展中，华夏族才能不断容纳周边的少数民族，形成包容甚广的汉族乃至今天的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虽然有激烈的冲突，但最终都被儒家文化所同化，以至征服者最终被征服。

儒家文化具有很大的内聚力。儒家整体思维强调时空的延续性，也必然导致种族延续意识的强化。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文化可说是家文化的扩大。家文化必然培养出种族意识。种族意识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条件。这种意识在儒家文化里是比较强的。所谓“慎终追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观念，本质上是种族意识的光大。潘光旦先生曾说：“种不可灭与血脉相绳的观念，在中国是极强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光前裕后’一类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的独家发明，在外国的文字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并且不限于智识阶级，它在平民的思想中，也早就有了很坚固的地位。有一个很有趣的证明。……子姓的名子……雷同最多的几个字是‘根’、‘泉’、‘茂’、‘荣’、‘源’，尤其是‘根’与‘泉’二字。”<sup>⑥</sup>在现实中，仍可见其影响。“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不仅在农村，即使在大城市也还存在。当然，这种观念在现代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它确实是社会联系和历史承传的重要纽带。现今仍然保存的清明祭祖的传统，便是例证。一般来讲，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不是很强的，有人说中国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但中国却有一和宗教相近的东西，这就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本质上是一种起源认同，而起源



认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儒家文献《礼记》上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祖的意思在于“报本返始”、寻根溯源。民族学的研究揭示，起源认同是民族形成的基本因素。因此，祖先崇拜反映了儒家整体思维的历时性的一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促进因素。

## 二

从现代意识的角度审视，儒家的整体追求也有其严重缺陷，这就是工具理性的不足，其突出表现是科学精神与组织能力的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与团体组织意识的发达与西方传统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儒家的整体思维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生存世界与价值意义世界的相互渗透、本体与现象的贯通等，本质上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理性，从而制约了工具理性的发展。有人说西方文化偏重于知识与理智，中国文化偏重于感情与理性，也相对地揭示出了各自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是大家普遍认同的。中国的书籍很多，但教人如何作人的书占大多数，详于人事而疏于物理。前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讲的读书也主要是指读圣贤之书以博取功名。科学的不发达和落后，在近代以来表现得非常突出。科学精神的缺乏与儒家整体追求有密切的关系。西方科学的发达是与西方文化的天人相离、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它所看到的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所看到的是人性恶的一面，带有非常强的原罪意识。在这种对抗与冲突之中，西方文化特别注重发展工具来解决问题，这表现为科学发达，社会组织较健全。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此为基础的。西方认识的目的在于对客观存在的把握与了解，其认识方法注重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在西方文化中，本体论与伦理学是分开的。这种思维方法有其缺陷，这就是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它却促使思维趋向于精密与准确，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进而带

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所看到的是人自身的身体与精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天然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之中，似乎看到了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人的本性是善的，善通过自身的修养就可达到，不需要借助外物，它所强调的是善的天然的合理性。儒家认识的对象与目的在于对善的体验与追求，其根本方法是反躬自省、反求诸己的自我修养。它与西方的方法有着根本不同，它的本体论与伦理学是不分的。儒家对事物的认识强调整体直觉，带有很强的神秘色彩，用现代认识论的话语来说，它是属于非理性的认识方法，它强调心灵的了悟，强调对事物总体的认识，但不同于西方的综合方法。如《中庸》：“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这就是说心之诚可以通万物之理。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及养浩然之气的神秘方法，张载关于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论说，都是强调宏观、整体的认知，重视经验，而轻视具体分析和理性指导，从而都是与现代认识论、知识论相背离的。由于这种整体直觉的思维方式不在意认识的准确性且带有神秘色彩，所以，尽管中国人较少宗教信仰，但是迷信活动却又是相当发达的。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相区别，各有优长。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对近代科学的发展却没有多大的帮助，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的。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儒家文化中，组织生活的缺乏也为大家公认。群体生活中最重要的组织应是国家。而在中国，国家意识是很淡薄的。从统治的角度来看，统治者所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不依靠严密的社会组织而只依赖于君主个人好恶喜怒的“无为”政治。胡适曾经指出，由于汉朝头70年有意实行的无为而治，才造成了400年的汉帝国，才留下无为而治的规模，使中国2000多年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都受了这“无为而治”的影响。梁漱溟也指出，从来中国政治上所表现之

消极无为，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从被统治者一面来看，也只有纳钱粮、涉讼两事，而且一般的事都由当事人自己调解，不必上公堂。考诸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应该说，胡适和梁漱溟的论析是有道理的。应该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世俗所谓道家思想的贯彻，而是儒家文化在发生作用。儒家欣赏的仁政德治，标榜的“政简刑清”，“垂拱而治”，实际上就是不需要严整的社会组织和治理工具，而是依靠统治者的“动心忍性”，以德化天下，“以孝治天下”。这种无为而治，反对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和酷吏政治。在儒家文化看来，忠君就是爱国，国家就是一个家庭，君主就是家长。因此，有人说中国人有族类意识、天下观念而缺乏国家意识，并非虚言。从文化哲学的立场考察，这是与儒家的整体思维分不开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工商业不发达。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以单家独户、男耕女织的小农业生产为主导。其间虽不乏土地兼并，但始终未发展出大规模的庄园经济。相反，每当土地兼并高潮之时，便是社会出现大的危机之时。就工商业来说，行会并不发达，而且往往又因地域或族姓关系分别自成组织。当然，在中国也有非常紧密团结的群体，这就是家族。家族中所表现出的团结力量是非常强的，民族的许多优点都可从中体现。有人说：保护中国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但是，我们知道家族不过是一小范围的组织，而且它更多的是一依血缘关系组成的伦理群体，而不能算是一社会组织团体，因而也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的组织观念特强。实际上，正是家族组织的畸形功能的发挥，取代了应有的社会组织的功能，从而弱化、淡化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观念和国家观念。而这，正是与儒家将家、国、天下融贯为一，家国一体，政治生活准则与家庭生活准则混为一谈的缺陷分不开的，是儒家整体思维缺陷的表现。

从伦理观念上来看，儒家的伦理与西方伦理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所关注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人与群体组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与组织的关系实际上是消溶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儒家的五伦是社会生活各种关系的比较完善的概括。五伦所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均是此一人对彼一人的关系，而没有讲个人对国家、对家庭、对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个人对国家的关系、个人对家庭的关系也就包容在君臣、父子关系之中了。梁漱溟曾说西方人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与我们很不同，最昭著的有两点：一则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另一则是儒家伦理以处理好人与人的直接关系为道德，以服从事奉一个人为道德。<sup>⑦</sup>本来，关注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这可说是私德发达。但是在儒家那里，它不仅是作为私德而存在，而且还是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而存在，以私德等同公德，公共生活的空间被挤占，制约了社会组织行为的规范化和健全发展。这种将个人与社会的活动准则混同的做法，实际上体现出了儒家整体思维的弊端。

组织能力的缺乏、组织观念的淡薄与儒家的整体追求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儒家的整体追求必然逻辑地得出生存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合一，从而制约生存世界的功能的发挥。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以伦理关系来代替行为组织关系或二者合二为一，这就给社会生活的健全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儒家力图使家与国、伦理与政治统一起来，但二者又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在儒家的理论里有充分的表现，如仁与礼、义与利、知与行、情与理。这也导致了儒家内部的分道扬镳与诸子的责难。儒家内部与外部在一些理论上的长期争论，说明儒学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矛盾。家与国是不同性质的群体存在的形式，二者的组织原则有相通之处，但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以家族群

体的价值原则扩大为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必然导致这种价值原则与现存社会组织制度的矛盾，最终也不可能确立起真正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而导致人的道德规范的不确定性。传统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私德先于公德就是很好的说明。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招来了诸子的责难。韩非认为“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墨子看到了亲亲之爱与泛爱众的矛盾，主张“兼爱”。道家看到了儒家基于亲亲的泛爱的虚伪性，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近代以来的文化反思中，有不少学者看到了此矛盾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如雷海宗、林同济、梁漱溟的论述。

由于工具理性的缺乏，儒家常常落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有人讲儒家文化是一不落实的文化，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从未真正实行过。<sup>⑧</sup>儒家道德主体性的价值理想是圣贤人格的追求和有序的群体生活。但是，儒家的道德价值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又不能实现。就人格追求来说，一方面承认人皆可为尧舜，另一方面，又认为圣的境界是很难的，甚至尧舜也未达到。就经世致用、追求群体生活秩序来说，儒家的道德主张也是不现实的。从个人际遇来看，儒学大师许多是不得志的，尽管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孔子为了实现理想，周游列国，结果是四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孟子游说齐王而不为其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及其学说名噪一时，但在汉武帝内心深处则是另外的想法，这就是“以霸王道杂之”，董及其他儒家人物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生前也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就经世致用的效果来看，儒家士大夫由于不了解社会的真实矛盾，道德与经济的矛盾，道德冲突后面的利益矛盾，到头来，面对社会的动荡，也只能哀叹世风日下，无可奈何。消极一点的，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积极一点的，则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现实

中的失落在儒家的思想观念上的表现就是不得不认命，不仅孔子与命与仁，就连力倡人定胜天的荀子，实际上也是认命的。

不难看出，上述儒家文化的内在缺陷，本质上是由其思维的整体追求决定的。无论是从家到国的经验直观外推，还是以和为贵的伦理价值追求，都是整体为上的思维方式所内在追求的，是儒家价值观念的体现。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无论是在理论建构方面，还是在社会作用方面，都具有两重性的影响，我们今天在用现代意识评判儒家文化的时候，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否则，要么容易陷入简单肯定、盲目认同儒家文化的片面性之中，成为国粹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的附庸；要么容易滑入用政治等同学术，把学术简化为政治，从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窠臼之中，成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认同者。当然，我们今天要努力防止的错误倾向主要是前者。

---

①参见周继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特征及其转型升级问题》，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4期。

②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③朱存明：《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鲁东：《宋明理学的整体本位主义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

⑤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⑥《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222页。

⑦《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⑧参见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作者叶金宝，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510275）

责任编辑：罗 苹

丁日昌，字禹生，亦写作雨生，号持静。道光三年六月初一日（1823年7月7日）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其家开设药店、盐店。20岁，考中秀才。逾年，补廪生。惠潮嘉道李璋煜览其诗文，赞为“不世才”，延入幕府。地方官争相罗致，遂屡游诸幕，亦设帐授徒。

①曾三次赴广州参加乡试，未能考中举人。②咸丰四年八月，三合会党吴忠恕等起义，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正在惠潮嘉道曹履泰幕中，募汤坑勇3000人，③屡与起义军作战，吴忠恕败退。④七年，以潮州军功，选授广东琼州府学训导。十二月，授江西万安知县。九年九月，莅万安县任。在任四个月，政绩优良，受到李鸿章长兄赣南道李瀚章之赏识。十年春，广东大吏奏调回籍办理洋务。六月，重回万安县任。八月，调摄吉安府庐陵县令。⑤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太平军攻吉安，知府命丁日昌扎螺子山，号召乡团。十一日，太平军克吉安。十三日，丁日昌等又占领吉安。⑥清廷上谕：“失土应论斩，姑念相距三日即迅速收复，从宽革职，并追偿遗失公物。”⑦丁日昌流落上海、扬州、山东、安徽。⑧七月，至九江行辕晋谒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条陈进军策略。被曾国藩收入幕府。在这里，正式与李鸿章结识。同治元年春，经曾国藩奏请，开复原官。⑨当时，李鸿章率淮军开往上海，曾国荃正进谋天京，争相罗致丁日昌入幕。结果，曾国藩将丁日昌与李瀚章等派往广东办理厘金。⑩丁日昌到广东后，被广东提督昆寿带赴高州镇压陈金缸起义，“筹划战守，督办火器。”⑪他得到了留美学生黄达权、苏州秀才王韬等人的帮助，仿造出西洋炸炮和炸弹。

## 丁日昌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

□贾熟村

除供在广东镇压农民起义外，还运到上海，供李鸿章的淮军使用。⑫

同治二年正月，李鸿章向广东咨调丁日昌前往上海专门制造军火，晏端书以高州军情吃紧，奏请将丁日昌暂留昆寿军营。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递《催调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片》，要求“速令丁日昌起程来沪，督匠趲造。”⑬清廷即命毛鸿宾、晏端书、郭嵩焘速即飭令丁日昌赶紧起程赴沪。⑭八月二十九日，丁日昌由广州到达上海。九月，在上海设立由丁日昌主持的炮局。十一月，随李鸿章之弟李鹤章攻打太平军防守之无锡，亲手放炮攻城，以此军功，经李鸿章奏准，以直隶州知州补用。⑮

同治三年四月，丁日昌代李鸿章拟定了复总理衙门的信，除陈述“炸弹三局”的制造情况外，还力陈学习“外国利器”的必要和可能，认为“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总理衙门非常重视，特意奏称：“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同年八月，丁日昌再次代李鸿章拟定致总理衙门的信，同时附以丁日昌上李鸿章的“密禀”。在“密禀”中，他提出除了继续办“外洋军火局”外，还应“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并建议试办机器造船厂。总理衙门认为丁日昌、李鸿章的意见“识议闳远”，要求李鸿章对设立机器船厂的“一切章程及如何筹画经费之处，”“通盘核计入告。”李鸿章派丁日昌筹办。丁日昌于同治四年五月，在上海

虹口购得美商旗记机器铁厂，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洋炮局并入，李鸿章命名为江南制造总局，以苏松太道丁日昌为该局首任总办。<sup>①⑥</sup>

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击毙，朝廷一些官员奏请飭江苏巡抚李鸿章派丁日昌解落地开花炮北上支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致函总理衙门，请奏飭李鸿章调遣凤凰山之洋枪队，并“多带上海丁道所制之开花大炮。”于是，乃有上谕，命李鸿章查明该项洋枪队尚有若干，酌量派拨，丁日昌能否令其北上？李鸿章复奏，同意抽调洋枪队，但拒绝令丁日昌北上。同年八月，经李鸿章奏准，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sup>①⑦</sup>

同治五年正月，英国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催办潮州英领事进城问题。总理衙门推荐丁日昌协助办理。清廷即命李鸿章传知丁日昌赴广东办理。<sup>①⑧</sup>丁日昌奉命之后，拟定办法三条：一、立威宜留有馀地；二、劝谕宜曲通民志；三、绅士中宜德才并用。李鸿章认为识虑甚远，曲中窍要，并代为转奏。<sup>①⑨</sup>潮州入城问题，即按丁日昌的办法解决了。该年九月初七日，李鸿章在《保荐人才片》中，称道丁日昌“才猷卓特”。<sup>②⑩</sup>

清政府欲以丁日昌为江苏巡抚，曾国藩不以为然，奏称：“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洊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sup>②⑪</sup>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认为淮军饷源之根本在江苏，“必须确然可恃”，“松岩护抚以来，兵饷未掣肘，远久必难如常，雨生洋务既熟，与敝军息息相关，朝廷自有深意。”“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sup>②⑫</sup>丁日昌终于在六年十二月升任江苏巡抚。

同治九年，天津发生教案，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至天津查办。曾国藩至天津，旧病复发。清廷又命丁日昌速赴天津，帮助办理。丁日昌奏称：“默计彼若决计用兵，定以上海为后路。李鸿章频年平捻、平发，而又熟悉洋务，素为洋人所畏服，可否飭调李鸿章统兵由江东下？以示彼若

无理要挟，则由上海捣其后路，……抑或飭调李鸿章先行移扎近畿，以资护卫之处，恭候圣裁。”<sup>②⑬</sup>同时，也致信函给李鸿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称：“至丁日昌为人，臣在江南即闻有丁鬼奴之称。其抑民奉外，罗织株连，以求快洋人之意，自可想见。”<sup>②⑭</sup>九月，丁日昌奉命由天津回江苏巡抚本任。闰十月，丁母黄氏病逝。丁日昌抚柩回广东原籍。<sup>②⑮</sup>十二月初二日，王家璧第二次弹劾丁日昌，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由丁日昌所主使。清廷认为王家璧仅系得之传闻，毋庸再行提讯。<sup>②⑯</sup>十年正月，丁日昌正式开缺。五月，编著《枪炮图说》，寄给李鸿章。<sup>②⑰</sup>李鸿章在复信中写道：“《枪炮图说》板六箱，谨已拜登，珍同琪璧，《序言》、《凡例》尊处如已脱稿，便中驰寄。兄少暇当另作小序弁之，一并付雕，奚敢掠人之美。《地球图说》，理大物博，望仍悉心校勘发刊。”“琅邪（案：指王家璧）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谗匿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十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sup>②⑱</sup>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执事去官以后，中外议论渐平。其知者尚推鄙人荐贤为不谬，然科甲中人渐多疵议，又不能确指为何项劣迹。王孝凤（案：即王家璧）现已进京，凭空媒孽，皆知其妄，不待申理者。省三（案：即刘铭传）被诬亦甚，尚系其自取也。枢廷文相（案：即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似深知执事不诉。经笙（案：即军机大臣沈桂芬）亦回心向善。”“服阙如不即出，似请制军代陈病状，作一虚宕，所谓‘用则行，舍则藏’，切勿固执为幸！”<sup>②⑲</sup>

同治十一年，丁日昌与李鸿章还不断通信，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更力促其复出，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写道：“未有练达如公而可置闲散者。……公自忖才略，视李、张、钱、王辈当何如？欲于淮部求人，应首屈一指。且不才老病颠连，其能久于人世耶？……直属水灾重，……常思避贤遁世作小结束，此席待公替手，幸留意焉！”



③在九月十一日的信中写道：“吾党如补帆、调甫、振轩、仲良（案：即王凯泰、钱鼎铭、张树声、刘秉璋）联翩而起，不可谓非才，仅比于乡党自好之流，孰是忧国如家，视远若近者。……文、沈今之秉钧，既深知阁下吏治、洋务冠绝流辈，当破群议而起之。……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英、俄窥伺，中国自开煤、铁矿，修火车路，“则万国蹑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④十二年九月，李鸿章写信给潘鼎新说：“雨生来年亦当循例出山。此才究胜时革，乃憎多口，岂有真是非耶？”⑤十三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六月初八日，丁日昌奉命入京觐见。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前闻诏起出出（山）者八人，吾弟亦与其列。……似文、董（案：指文祥、董恂）均有推毂之意。……所延颈企望，惟执事耳。何时奉旨，何时起程，希先示及。……倭兵闯入台湾，瞬已四月内外，……虽奉廷谕，饬办海防，虚张声势，但欲逼令撤退，非真发愤自强。……揆当局之亟起大才，殆将寄以盘错之任欤？……鄙人精力，近大衰减。海内谈洋务者，舍公其谁与归？……众中佼佼，亦当首屈一指矣。”⑥

九月二十二日，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签字。二十七日，奕訢等上奏，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饬各将军、督抚筹议奏复。李鸿章奏请汰陆军、练洋操、购机器，造洋枪、洋炮，购铁甲舰等，裁艇船，暂弃新疆，匀作海防，兴利开矿，暂弛罌粟之禁，加重洋药税厘，开洋务取士之途，派遣公使。⑦丁日昌虽在野居乡，也于秋、冬间，先后有《海洋水师章程》、《海防条议》上奏，同时也抄送李鸿章。李鸿章在复信中称他“披读再四，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

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鄙论渐弃新疆、弛禁罌粟、扩充洋学各节，颇为腐儒所疑诧，实皆万不得已之谋，尊议略为发明而不为过激之谈，足见执事洋学果进，揣摩时趋亦大有进境，直将优入圣域，岂徒四科十哲已哉！……”

⑧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称他阅读各方面奏折54件，“惟李鸿章、丁日昌牖列洋人造船、简器最详而又推极言之，挟以必行之势。……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第三次弹劾丁日昌，该年三月，丁日昌到达北京。十二日，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津门十日之欢，五年积郁情怀为之顿豁。……近闻于、王复议，痛诋鄙论，株及执事，语多诬蔑，其主谋附和者，非止一二人，盖恐悬两江以待之，遂以乱天下也。……仍望耐心守过一月，以全君臣礼意，无从快谗慝之口。”⑩二十五日，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圣意必欲大用，似不为众议所排。三吴父老，犹盼旌节重临，但须待有机缘，……片请赴津一议，只得存而勿论，免得怨家又诧为捷迳朋党也。”⑪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二十九日，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海防一节，虽奉简派，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次则无人，又无激励之法。衰暮负此重寄，瞬见颠蹶，如何可支？初冀执事惠然来助，鼓舞颓唐，乃特旨未由中出，尊体未能全愈。……承允在幕府运筹，是暗帮而不肯明帮之意。焉有如此大幕能容海涵地负之才？”⑫

丁日昌于五月初七日具奏，缕陈病状，请求赏假回籍调理。清廷命丁日昌前赴天津，帮同李鸿章商办事务。赏假两月。⑬丁日昌通知李鸿章，李鸿章复信说：“欣悉请假疏上，奉旨赴津帮办，可谓天从人愿，喜跃曷任！……到津应暂住敝署以便商榷一切。……执事如能量移于庙岛、旅顺口一带布扼门户，大局之幸。”

丁日昌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天津。六

月，办理与秘鲁国换约事。七月，获准在天津休病假三个月。与英使威妥玛交涉马嘉理案。八月二十七日，任福州船政大臣。④九月初六日，丁日昌从天津沿运河南下。十五日，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初六、七、八日，三接龙颜，……末次垂询执事病状、行期，并谓在江苏时察吏爱民，政绩如彼，而谤议如此，深为叹惜。圣明眷倚，可谓优隆温人。云似有牢骚，答以去岁谕令起用，日久无著，群谤众疑，又不一为昭雪，奚怪其然。船饷虚悬，到差后将逼令告退。其意颇动，谓必徐筹位置。沈、李问答略同。……看诸公语意，信任虽不甚专，然皆深佩大才雄略，必不令其肥遁。望克期赴闽接办，从容研画，以待后命。”④十月十二日，丁日昌到福州船政局上任。十一月十三日，补授福建巡抚。二十一日，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阁下拜受新命，……万无可辞之理。前晤高阳（案：即李鸿藻），谈及滇事之兴，执事应愿求查办，乃以病辞，迹近取巧。兄告以请假在先，派查在后，且并未奉派，何由知其必辞，乃语塞。然则袞袞诸公，其不明阁下心迹者多矣！……闽抚固不必辞，即专令巡台、船政，即再调滇、陇，亦不必辞，使天下人人皆知非规避取巧，使朝廷时时信其无苟免危难。以公之才望，何事不成，何入不得耶？”④

光绪二年正月，丁日昌办理福建电线交涉，将丹麦大北公司已架好的福州到马尾的电报线购回，由福建官方经营。④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电线买回自办，改用汉字，谋略深远，徽公之力不及此，钦服曷任。铁路已成，火车试行，……将来如能做到闽中电线一样，或有收束。”④丁日昌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不和，李鸿章在三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写道：“云中（案：即李鹤年）请覲，已见邸抄。……吾宗（案：即李鹤年）腹有鳞甲，此来若即求退，必腾谤议，幸中朝知执事认真，不避嫌怨，……风声既树，济之以宽容，使人易亲，功效当亦可观。”④在五月二十四日的信中写道：李鹤年有不再回任之意，“欲求替

人，舍公其谁？幸勿预存退志，以诸葛公鞠躬尽瘁自矢而已。近闻都下舆评愈甚允服，不如从前之谣诼，吾宗即有莽其言，亦不足取信于人。”④在八月二十三日的信中写道：“和翁（案：即李鹤年）移督东河，闽浙一席久未放人，岂执事资望尚有不足，抑有谤忌，中朝不免迟疑耶？”④

光绪三年，袁保恒、李鹤年、王家璧等联合起来，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逼丁日昌于危地。④李鸿章奏称福建、台湾分而为二，“缓急难恃，台防必将坐困，非计之得者。”④结果，袁保恒等的意见为清政府议驳。④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给丁日昌写信，说俄土开战，日本内乱，乘此机会，中国厉兵练甲，事有可为，“全赖阁下提纲挈领，振此颓风，不才老惫，引领企之！”④丁日昌请病假回籍，李鸿章写信说郭嵩焘怂恿兴办铁路、电线，“绵力奚足以提倡，方盼我公为中土开山老祖，而今已矣！”④丁日昌被赏假回籍，李鸿章写信说：使铁路、电线、煤矿做出榜样，“开中国未有之事，留万古不朽之名，此大丈夫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不愈于老死牖下向人告帮耶？”④

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遭大旱灾，李鸿章请丁日昌劝捐助赈，成绩卓著，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称“夏禹之手足胼胝，腹踵无毛，不是过也。时艰日棘，干济无人，若得公等三数，大足整理乾坤，其如孤掌难鸣何耶？”④还向清廷递《丁日昌劝捐得力片》，表彰丁日昌的功绩。④

光绪五年闰三月，清廷给丁日昌加总督衔，命驻南洋，办理海防，沿海水师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李鸿章对沈桂芬、宝鋆说：“此后闽疆事尤吃紧，非才望如丁日昌者，不能有济。”沈桂芬拊髀叹曰：“诚则是言”。李鸿章回天津后，总理衙门密函与李鸿章商日本废琉球办法，李鸿章称：“台防须得人整顿。”总理衙门奏准丁日昌以总督衔会同督办南洋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楨适交卸，“即以执事署江督，事权更专，窃料或南或北，早迟必是替人，目前暂以虚衔笼络之

耳。”<sup>⑤7</sup>四月，丁日昌上奏不能胜任六条，呈海防应办事十六条。五月，清廷命丁日昌病愈后入京。<sup>⑤8</sup>十月十三日，李鸿章写信说：“顷都中人来，传述两宫召对语，颇怪执事引疾偃蹇不出，盖倚畀甚殷，责望亦重。来春北上，似不可缓。”日本兼并琉球，俄国强占伊犁，“东西情事如此，所待阁下筹商者，非止一端，其能晏然高卧无所动于中也。”<sup>⑤9</sup>沈葆楨病死，刘坤一乞养，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写信说：“外间众论，则执事宜首屈一指。”“若幡然入覲，江左舍公其谁？鄙人更赖有同志之赞助也。”<sup>⑥0</sup>

光绪七年，李鸿章仍极力活动，欲使丁日昌出山而未果。五月二十七日，他写信说：“因江左不甚得人，曾密陈周公（案：即恭亲王奕訢），起用执事，乃谓举朝谤议，徐荫轩疏口为奸邪，如何敢撻其锋。枢务举措，大概取决于吾宗（案：即李鸿藻），专亲虚誉。当世之所谓正人君子者，率多无用知浅之人。”<sup>⑥1</sup>七月二十一日，又写信说左宗棠与他“外和内芥，必排挤其同党，亦难望为公推毂。”<sup>⑥2</sup>

光绪八年正月初十日（1882年2月27日），丁日昌在原籍逝世，终年59岁。李鸿章致丁日昌之子的唁函中写道：“惊悉尊甫大人凶问，复展遗墨，怆痛良深，两世深交，千秋重托，岂谓平生之约，更烦垂没之言，感旧伤怀，弥增凄恻。尊公少负逸才，长承家学，方期国器，无忝门风，何意中年，遽即长夜。”<sup>⑥3</sup>

丁日昌是李鸿章最重要的助手，是他物色的接班人，尊为办理洋务的圣贤。在李鸿章的提携之下，丁日昌四年四迁，由知县升为巡抚，升转极速。丁日昌对准军军饷械弹的供应，无不周密快捷。他不仅对准军的发展有大的功勋，同时，对于世局的了解，外交的肆应，海防的设计，其才识均远非其他疆吏所能及。离职引退后，李鸿章时为安排起复，终因守旧人物的疑忌排斥而未能如愿。纵观丁日昌的经历，他与李鸿章的关系确实是很不一般的。

<sup>①⑤⑦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sup>江村：《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第12，14，15，15，16，116页。

<sup>②⑧⑫⑮⑵⑶⑷⑸⑹⑺⑻⑽⑾⑿</sup>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2，4，5，130，134，69，134，135，95，137页。

<sup>③</sup>卢蔚猷等：《光绪海阳县志》，卷25，第22页。

<sup>④</sup>陈坤：《粤东剿匪纪略》，卷1，第23页。

<sup>⑥</sup>《剿平粤匪方略》，卷264，第17页。

<sup>⑩</sup>《曾国藩全集》、《奏稿》4，第2226页。

<sup>⑬</sup>《李文忠公奏稿》，卷4，第44页。

<sup>⑭</sup>《筹办夷务始末》，卷20，第14页。

<sup>⑯</sup>赵春晨：《丁日昌与江南制造总局》，见孔令仁：《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第578页。

<sup>⑰</sup>《李文忠公奏稿》卷9，第39页。

<sup>⑱</sup>《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24页。

<sup>⑲</sup>《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第30页。

<sup>⑳</sup>《李文忠公奏稿》，卷10，第42页。

<sup>㉑</sup>《曾文正公奏稿》，卷23，第18页。

<sup>㉒</sup>《朋僚函稿》，卷6，第46页。

<sup>㉓</sup>《丁禹生政书》（下），第560页。

<sup>㉔</sup>《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17页。

<sup>㉕</sup>《朋僚函稿》，卷11，第8页。

<sup>㉖③③③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sup>《丰顺文史》，第2辑，第67，72，77，78，80，81，86，88，96，97，101，106，113，115，118，123，133，155，160，163，166，167页。

<sup>⑳</sup>《朋僚函稿》，卷12，第26页。

<sup>㉑</sup>《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88页。

<sup>㉒</sup>《筹办夷务始末》卷99，第12页。

<sup>㉓</sup>《朋僚函稿》卷15，第6页。

<sup>㉔</sup>《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sup>㉕</sup>《洋务运动》（二），第355页。

<sup>㉖</sup>《朋僚函稿》，卷17，第4页。

<sup>㉗</sup>《李文忠公奏稿》，卷31，第30页。

<sup>㉘</sup>《李文忠公尺牍》，卷1，第2页。

作者贾熟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00006）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关于嘉庆年间 广东海盜的几个问题\*

□刘 平

清朝中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起义与各种社会动乱交织一体。嘉庆年间浙闽粤沿海大股海盜的出现，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

在国内关于嘉庆时期海盜问题的研究中，闽浙方面的蔡牵匪股曾有人作过探讨，<sup>①</sup>但广东方面郑一、郑一嫂、张保仔等大股海盜的活动却被人忽略了（在其高峰期，人数达5万以上，船艇上千只）。<sup>②</sup>本文针对这一时期广东海盜的联合与演变情况进行论述，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 一、广东海盜崛起的契机

广东沿海破产失业的渔民、水手下海为匪，剽掠为生，历有所闻。雍正时期的蓝鼎元指出：“在洋之盜，十犯九广”。<sup>③</sup>但在乾隆末年以前，广东海盜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匪股规模不大，旋起旋灭，除了危害商渔外，他们无意与官军对抗。

然而，到嘉庆时，广东海疆匪氛大炽，两广总督那彦成坦承：“粤东之患，莫大于洋盜。”<sup>④</sup>究其一般原因，人口、地理、对外贸易和社会经济危机等方面的因素固然不容忽视，当时国内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的影响也很重要。鉴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或多或少地说及，这里要谈谈越南西山政权包庇、利用中国海盜，致使广东海盜迅速崛起的问题。

18世纪70年代，越南（时称安南）

黎朝衰微，以阮文惠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爆发。1787年，西山军入据河内，阮文惠得国，乾隆帝被迫封其为安南国王，并改名为阮光平。

但是，西山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其国内的稳定，相反，南方“农耐王”阮福映在法国人支持下，与西山军展开了十几年的战争。西山军未及喘息恢复，又被迫全力以赴对付阮福映。至乾隆五十七年，“光平卒，子光纘立，年仅十五。……光平父子，以连年战争，国用匱乏之故，乃奖励海賊，四出剽掠，遂酿成嘉庆朝海疆之巨患”。<sup>⑤</sup>

时人程含章分析道：“逮乾隆五十四五年后，盜賊复起，祸缘安南夷主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国内空虚，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资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渔，以充兵饷，名曰‘采办’，实为粤东海寇之始”。<sup>⑥</sup>两广总督吉庆也奏称：“洋匪聚集并藏匿船只各处，在安南境内，且有该国隐匿賊匪之情”。<sup>⑦</sup>

从乾嘉之交的大量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中国海盜尤其是广东海盜与越南西山政权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山政权引诱、胁迫居住或流落至越南的中国民人投入西山军，纵使为匪。如著名盜首莫官扶、樊文才、梁文庚，原系广东遂溪等县民人，分别以砍柴、腌鱼、贩鱼为生，后“被盜掳捉入伙，随同行

\* 本文系作者提交“清代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烟台，1997年8月）论文的节略（原题《乾嘉时期广东海盜问题研究》，计三万余字）。

劫”，又受陈添保之招，投顺安南，“受封伪职”。<sup>⑧</sup>当上西山军“统善艘道各支大总督”的陈添保，原是新会县蛋民，后“被风飘至安南海面”，船破登岸，在黎城“小贩生理”。乾隆四十八年被“夷官”掳去，“逼令在船上做舵工”，因作战“著有功劳”，得以迅速攀升。<sup>⑨</sup>

（二）西山军对中国海盗封以官爵，授以印记（清方称为“夷照”），令其招兵买马，扩张势力，以为己用。大盗首陈添保供称：“阮光平做了安南国王，封小的总兵、保德侯，给过夷照一件，并夷兵二百名，战船六只，并炮械各物，交小的经管。五十三年内又给夷照一件，叫小的招纳贼船十六号，也给小的经管”。<sup>⑩</sup>盗首吴亚二也供称，平日在江坪地方佣工，因无人雇请，遂“领取夷照，……纠伙造船随往劫掠”。<sup>⑪</sup>海盗劫得的大宗赃物都由阮光平处理，中国海盗称他为“粤南大老板”，<sup>⑫</sup>因为他能很顺当地“销变”赃物并在雇用他们作战时给以丰厚的报酬。

（三）中国海盗从西山军那里学到了高超的作战技术和组织方法。海盗在随同西山军与南方阮福映军作战的过程中，获得了与敌抗衡的宝贵经验，具备了一定的纪律，懂得了怎样在海上使用火炮和建立据点。

（四）西山军向海盗提供的武器船械十分精良。时人述称：海盗船“比兵船大至三四倍。兵船炮子重者不过斤许，匪船炮子重至十三四斤”。<sup>⑬</sup>

以上种种，使陈添保、莫官扶、郑七等大帮海盗迅速崛起。而受到内陆起义和动乱牵制的清政府对此采取了消极的防守政策，即谕令粤省官员“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嗣后洋面盗匪，无论内地外洋，一经缉获，即按律严办”。<sup>⑭</sup>这一对策对海盗势力的壮大并不构成威胁。

## 二、“立合约”与广东海盗的联合

最终改变海盗命运的是西山军军事上

的失利。1802年（嘉庆七年）上半年，西山军在与南方军的战斗中连吃败仗，尤其是在洞海保卫战中，西山军惨败（当时郑七匪股约有40艘帆船被调派保护该港口）。阮福映军于7月攻入河内，俘获光纛皇帝。<sup>⑮</sup>

西山政权灭亡不久，阮福映军开始扫荡逗留在越南的中国海盗。在一次遭遇战中，郑七被俘斩（此前一年，莫官扶等被阮福映军俘获，陈添保则潜回内地向粤省当局“投首”）。同时，阮福映还遣使将莫官扶等巨盗缚献清廷。<sup>⑯</sup>此举受到清廷赞赏，《圣武记》称：阮福映“新受封，守朝廷约束，尽逐国内奸匪，由是艇贼无所巢穴”。<sup>⑰</sup>

由于失去越南屏障，海盗只得返回中国。在嘉庆七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海盗们遇到了两大麻烦，一是要在失去退路的情况下直接与清军水师对敌，二是由于主要海盗首领的丧失，各大小匪股群龙无首，为了争夺地盘，火并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尤雄桀者，辄兼并群盗，自谋进取”。<sup>⑱</sup>从当时的一些零散记载来看，仅在广东就有十几位盗首互争雄长。

但是，到嘉庆十年（1805）六月，广东海盗在“立合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该“合约”由当时有实力的盗首郑文显（郑一）、麦有金（乌石二）等7人联合订立。<sup>⑲</sup>“合约”开列了八项条款，主要内容是：1、通海大小船只，编为天、地、玄、黄、宇、宙、洪七支，“各支将行网、花名登簿列号”；2、不得假冒别支旗号；3、不得阻截有单之船；4、“打货船”时，所有船艇货物，先到先得，不许“恃强冒占”；5、凡“牵取有单之船”者，出面阻止者奖，“坐视不首者，以串同论罪”；6、不得私自驶往各港口、海面劫掠；7、不许陷害前来“买卖”的客商；8、统一“齐集会议”、下达命令的信号。

该“合约”的宗旨十分明显，即“会同众议，以肃公令”，“抗行例约者，合众究办”。而从八项条款中，可以看出：（1）广东海盗开始统一编队；（2）强调行动纪



律，违规者，或“合众攻之”，或处决行网、老板，等等；（2）海上行动的重点是保护“通商”，即有组织地发单勒收保险费，劫掠港口，打货船；（4）通观全文，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海盗行动纲领，其中不包含任何“反清”、“抗清”的意图。

根据以后几年的情况来看，“立合约”后的广东海盗基本上是各按地域行事的，这说明，“合约”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这种联合是松散的，各大帮基本上是各行其事。

参与订立“合约”的共有7位帮主，其中，郑流唐在订约后不久即带领人船投降了清廷，故以后广东海盗实有6帮。

后来的史料里，一般不以“合约”中所说“天地玄黄宇宙洪”来划分，而以各帮所用旗色加以区别。据南海县参与防匪抗匪、岁贡生出身的朱程万在《己巳平寇》中记载，郭婆带一股，“领船百余，号众万余人，旗色黑，曰黑旗帮”；张保原是郑一部下，郑一死后，与郑一嫂共掌郑一余部，“领船二百余号，众二万余人，旗色红，曰红旗帮”。梁保一股，“船差少，附于张保，旗色白，曰白旗帮。”以上三股，“分据东中两路，有急则互相救护，互为首尾者也”。西路则有吴知青、李相清、乌石二分领黄、绿、蓝三旗，其中蓝旗帮乌石二势力最大，“敛财物岁计银不下十万两，而涠洲、碇洲孤悬海外，遂据为巢穴。李相清、吴知青又朋比以益其势。由是东中西三路俱扰，中外商民，不安业者弥年也”。<sup>②0</sup>

盗帮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是郑一所领红旗帮。郑一出生于海盗世家，其堂兄郑耀煌即前面提到的巨盗郑七。郑一早年住在广州湾南端的东海村，娶粤妓石香姑为妻（即郑一嫂），后曾投入西山军打仗，返回广东后，与乌石二协调行动，势力迅速壮大，并最终促成了广东海盗的联合。<sup>②1</sup>

“立合约”之前，郑一就领有200多艘帆船，到嘉庆十二年时，单在香港鲤鱼门地区就有他的大小600艘船只活动，<sup>②2</sup>由此可见其势力发展之迅猛。

但是，郑一的时代很快结束，嘉庆十二年冬，“郑一身故”，时年42岁。郑一死后，红旗大帮的权力落入郑一嫂及其情夫张保手里。

张保，即张保仔，“本系蛋户，幼嗣郑一为子，并受安南国伪封”。<sup>②3</sup>所谓“幼嗣”，指的是张保15岁时被郑一掳逼入盗，作为郑一宠幸的男童兼养子。张保后来在匪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sup>②4</sup>据《己巳平寇》记载：“张保居郑一部下，事郑一侄安邦。安邦软懦不能馭众，恃张保左右之。保每劫掠，不前者手斩之，得财瓜分不私蓄，虏人不妄杀，赏罚仍请命于郑一妻石氏，或云张与石阳主仆，实夫妇也”。<sup>②5</sup>在郑一嫂、张保的统率下，以红旗帮为主的广东海盗取得了比郑一时代更为耀眼的成就。广东海盗活动进入了全盛期。

### 三、社会危害与官方对策

广东海盗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不择手段地袭击大小商渔船只，劫船夺货，绑票勒赎，严重破坏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及商业经营活动，包括中外贸易往来。拿绑票勒赎来说，不仅绑活人的票，而且绑死人的票，据乌石二供称：“在洋劫掳拒伤事主官兵，均不能记忆次数，每年收取打单银五六万两不等，……并发掘绅民坟墓，匿棺勒赎银两”。<sup>②6</sup>

2、各帮各股划定海域，向商渔盐米各船勒收保险费，其名目有“号税”、“港规”、“洋税”等，如《圣武记》记载：“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无论是官府控制的大队盐船，还是普通百姓的“小料民船”，都被迫购买“盗艇免劫票”。嘉庆十年后，广东海盗向盐船收取保险费的比率是每百包盐缴纳50元，也有以每船缴纳200元番银计的。<sup>②7</sup>如果不愿听命或是抵抗的话，海盗便施以集群攻击。如嘉庆十年夏间，在大洲盐场，有70艘进行抵抗的官盐船被海盗焚毁，不久，另有110艘官盐船化为灰烬。<sup>②8</sup>后来，

收费保险制还从海上发展到沿海沿河村庄市镇。

3、当官府海禁政策著有成效时，海盗在海上不能立足，便沿海岸沿内河大肆攻掠焚烧村庄市镇，杀害居民，绑掳人票，勒索粮食银两。如嘉庆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曾报称，从广州至澳门的珠江两岸，许多因海盗与土匪勾结烧杀抢掠的市镇废墟历历可见。<sup>⑲</sup>嘉庆十三年，红旗帮海盗先后击毙清军总兵林国良和护理总兵许廷桂后，<sup>⑳</sup>气焰嚣张，与黑旗帮分头数度闯入内河水道，大肆攻掠。又如嘉庆十四年八月，张保率数百艘船“从蕉门闯入，沿河居民再遭荼毒，……鸡洲、乌洲、大洲、上直、下直、熹涌、紫泥、澜石等处被难之家”，不计其数。<sup>㉑</sup>在三善地方，黑旗帮将整个村子劫尽焚烧后，将被杀村民的80多颗头颅悬挂在村头河边的大榕树上，复将关押在村庙里的妇女儿童悉数掳往匪船。<sup>㉒</sup>海盗的行径对珠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30年后（道光二十年），林则徐还谈到：张保“所聚大小匪艇数百艘，盗伙数万人，劫掠商民，戕伤将士，其罪逆更有甚于郑一，粤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闾巷传闻，痛心切骨”。<sup>㉓</sup>

4、海盗们带着扭曲变态的心理蔑视他们原先生存的那个社会，以凶恶残暴的手段对待落入其手的百姓与官兵人等，从而达到震慑人心、自觉买单保险交纳赎金以及水师官兵畏匪通匪的目的，鞭笞、割耳、剝指、肢解是常用手段，至于强奸女票、鸡奸男票、杀人吃食肝胆等暴行也时常发生。如嘉庆初年的吴亚二、黄亚五匪股，第一次纠伙109人，分驾8船，于嘉庆元年三月至十二月在粤闽浙洋面行劫，“不计次数”，并掳捉韦阿彦等12人“在舱服役”，余炳中等“在舱鸡奸”，林氏、卢氏等“奸宿押禁”。吴亚二第二次纠伙151人，于嘉庆二年正月至五月，“仍坐原船出洋，叠次抢劫十五次。黄亚五在新宁县大金洋面杀死布船事主一人，开膛取胆”；又先后掳捉蔡亚牙、陈亚真等数十人，“逼胁

入伙”，不从者，或“押令接递赃物”，或“在船扫舱煮饭”；又捉卢亚权等4人“逼胁鸡奸”；并将女票陈氏、王张氏等人“押禁舱底”、“强迫奸宿”。因遭遇师船，一场混战后，该股或死伤、或被捕捉。<sup>⑳</sup>吴亚二匪股从纠集成股到败灭的一年多时间里，犯案累累，罪行令人发指。

对于广东海盗的连年肆扰，清政府尤其是粤省当局采取了什么对策呢？

清军水师对海盗的围剿政策基本上是一贯的。水师师船常年巡海，官匪之战时有发生。但由于广东海盗大帮迭出，加上“营伍废弛”，官不敌匪，师船往往消极避战、守港自固。嘉庆九、十年间，因剿匪不力，广东提督一职三易其人，其中孙全谋被降为都司，并褫花翎；<sup>㉔</sup>魏大斌则被降为干总。

嘉庆九年底，素以“平叛”著称的那彦成被任为两广总督。那彦成抵粤后，在兵力部署、地方团练、海上作战等方面确曾进行了一番整顿。嘉庆十年秋，他甚至组织了一场颇具规模的雷州洋面剿匪战。此战共击毙海盗600名，俘获200余名，击毁大小匪船18艘，俘获6艘。但这些对当时的广东海盗根本没有构成伤筋动骨的威胁。<sup>㉕</sup>

此后，那彦成迅即把精力投到“招抚”海盗的计划上。他命人在沿海城乡遍贴“通谕口岸接济自首免罪”、“通谕裹胁难民杀贼投诚立功”等告示，<sup>㉖</sup>规定一名海匪来投，可免其罪并赏银10两，有些匪目还可得到官衔。当年秋冬，约有3000名海匪投诚，数十名匪首当上千总、把总等官。<sup>㉗</sup>对此，清廷与广东巡抚孙玉庭都持反对态度。孙玉庭奏称，粤省洋盗不下数万，若尽行招抚，“藩库缉捕项”银两不敷，对那些“罪皆凌迟斩梟”的海匪，不但不问其罪，且赏以银两，荣其顶带，以致民间有“为民不如为盗”之谣，实属不妥。<sup>㉘</sup>清廷也认为投诚海盗“皆悬赏购募，非穷蹙求生”，下旨申斥，那彦成我行我素，最终被革职查办。<sup>㉙</sup>此后，清廷名为主剿，实则剿无成效。

#### 四、广东海盗的结局

嘉庆十四年底至嘉庆十五年（1809—1810），令人感到困惑的现象出现了——处于颠峰状态的广东海盗很快走上了大批投降、被剿灭的道路。

嘉庆十四年冬，郭婆带与其头目郭就善等就“投首”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辩。最后，郭婆带决定率众投首，“令随库作呈投递”。这份投降文书是否出自郭婆带黑旗帮还有争议，<sup>④①</sup>但它对广东海盗的起因、活动状况与投降动因作了解说，其中说到：

“今蚁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因结交不慎而陷入萑苻，或因俯仰无资而充投逆侣，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其后遂至盈千累万。加以年岁荒歉，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夺无以延生，不抗师无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残商贸，势所必然也。然而，别井离乡，谁无家室之慕；随风逐浪，每深萍梗之忧。倘遇官兵巡截，则炮火矢石，魂散魄飞；如逢河伯行威，则风雨波涛，心惊胆落。东奔西走，时防战舰之追；露宿风餐，受尽穷洋之苦。……伏悯虫蚁之余生，拯斯民于水火；赦从前冒犯之愆，许今日自新之路。”

郭婆带为投降作了充分准备，先是与官府“间谍”取得联系，接受当局“擒获巨匪，呈缴船只炮械，方准投首”的指令。后在大屿山之战时，张保红旗帮陷入重围，向郭发出求救信号，郭因“投诚心切，不肯往救”，并于十一月间将家属“报明上岸”，并令“未能归帮之头目”冯用发等“陆续报明投首”。不久，郭亲率大帮投降，途中遭遇红旗帮，双方发生激战，张保红旗帮因连续与官兵作战，人困船破，被郭婆带打败，郭部“击毙张保仔伙党并落海淹死者一千余人，生擒三百余人”。当时另有“东海霸帮内头目冯超群等欲行投首”，郭遂带同往投，两股“共伙众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妇女幼孩八百余人，大小船一百一十三号，大小炮位五百余门，刀枪等项

器械共五千六百余件”。<sup>④②</sup>时当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粤督百龄亲往受降。

郭婆带投降后，被授予把总官衔，加入清军水师行列，参与海上剿匪行动。

郭婆带黑旗帮的投降并受到官府的重用，对各大小匪股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继郭部投降不久，又有各帮匪目匪众数千人投顺官府。<sup>④③</sup>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对所有广东海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尽管张保的攻掠行动仍在进行，但他也开始做投降的试探了，他先派一名头目与官府接上关系。嘉庆十五年二月，郑一嫂亲自出马，“诣省城乞降”，与百龄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最终，谈判以海盗方面的胜利而告终——张保可保留数十艘船随同官军打仗及进行盐斤贩卖。<sup>④④</sup>

三月下旬，张保仔、香山二等率红旗帮投降，计有匪众 17000 余人，船 200 余艘，火炮 1300 余门，刀枪器械数千件。<sup>④⑤</sup>张保被授予千总职衔，跟随清军水师行动。

嘉庆十五年四、五月间，粤督百龄发动了一场全省规模的围剿海盗战役。此战进展顺利，开始不久，即“歼毙不计其数”，俘虏收降千余匪众。五月十三日，清军水师与乌石二蓝旗帮在新英港外遭遇，清军立即“四面围攻，用大炮连环轰击，……贼匪落海淹毙者无数，该匪等仍复抵死拒敌。时有白底开波船一只，直前扑敌。首民张保认系乌石二坐船，立即奋勇逼拢，首先跳过，杀死贼匪数人，将盗首乌石二即麦有金擒获”。<sup>④⑥</sup>以后数日，又收降乌石二余部 3000 余名。黄旗帮盗首东海霸眼见大势已去，遂率领匪众 400 余名“驶来乞降”。此战，共计击沉烧毁盗船 24 只，拿获 25 只，收缴 89 只，投首匪伙 4000 余名，拿获 500 余名，“击杀淹毙者……正复不少”。<sup>④⑦</sup>稍后，清军乘胜追剿残余小股，俘斩受抚者甚众。至此，全省洋面“一律荡平”。皇帝龙颜大悦，大赏百龄以下各出力员弁，张保也因擒斩有功，擢升守备，赏戴花翎。

广东海盗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从鼎盛走向了败灭呢？这里，我们先对这一

现象的外部因素作些分析。

其一，嘉庆七年（1802）阮福映推翻西山政权后，对中国海盗“严加防剿”，清廷“深为嘉与”。<sup>④⑧</sup>因此，广东海盗逃往西南外洋的路被切断了。

其二，当时，江浙闽粤沿海的海盗，主要有闽浙方面的蔡牵匪股（广东籍的朱溃、朱渥兄弟与之合股）与活跃于粤海的张保仔、郭婆带、乌石二诸大帮。嘉庆十四年初至八月，朱溃、蔡牵先后被剿杀。闽浙洋面肃清，广东海盗难以北窜。

其三，粤省地方防御计划如保甲制（沿海称“澳甲制”）、团练等开始发生效用。张保、郭婆带攻入内河后，蹂躏地方，百姓愤起自卫，一些地方绅士积极“联防练丁，铸炮置械”。如红旗帮袭击顺德黄连乡时，顺德、南海、鹤山等县数十乡“皆率勇赴援，相持月余”，终于免遭劫难。<sup>④⑨</sup>

其四，百龄的海禁政策、招抚政策运用得当。百龄督粤后，在各方面实行整顿。首先，协调水师行动，添造、修理战船；其次，将盐斤海运改为陆运，断绝海盗利藪；再次，从陆上断绝海盗给养与情报来源。由是“贼党大困”。<sup>⑤⑩</sup>后来，百龄还利用盗首之间的矛盾，加以离间，他说：“欲挫贼之锋，则利用剿；欲涣贼之势，则利用抚，以贼攻贼”。<sup>⑤⑪</sup>

至于海盗内部的分裂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海盗之所以为海盗，是因为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恶化的结果。寻求更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是海盗为匪伊始的动机，也是海盗寻求“善果”的动力——条件不成熟者，如蔡牵、乌石二，往往被剿灭；条件成熟者，往往接受招抚，跻身于比他们原来的环境要好得多的新生活。如张保“投首”后，从千总、守备直升至澎湖协副将，郑一嫂则作为张保的妻子受到清廷“诰封”。<sup>⑤⑫</sup>

第二，海盗首领缺乏明确的行动目标，首领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海盗“联盟”关系的瓦解。拿郭婆带与张保、郑一嫂之间的关系来说，郭原想在郑一死后能接管红旗

帮并赢得郑一嫂的芳心，结果被张保后来居上，双方裂缝由此产生。<sup>⑤⑬</sup>同样，乌石二在雷州战役开始前曾派人到张保处请降，张保立功心切，竟将使者扣留，乌石二被迫顽抗到底。<sup>⑤⑭</sup>匪首动机不纯，利欲熏心，这是盗匪活动败灭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三，海盗内部组织发育不完善。尽管广东海盗各大帮在一定时期达到相当规模，但各大帮、大股与股、伙、船之间，帮主、大盗首与一般匪目匪众之间，联系松散，离心力随时存在。各匪帮在一定时期可以互为羽翼，但一旦海域被分割，即某一帮或数帮的或降或灭，剩余各帮的末日也就屈指可数了。

---

①关于蔡牵匪股的海盗性质，可参见关文发：《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日）松浦章：《明清时期的海盗》，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以及 Chang Chung-shen, “Ts'ai Chien, the Pirates King Who Dominates the Seas: A Study of Coastal Piracy in China, 1795 - 181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83.

②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 Murray）教授对乾嘉时期的华南海盗作了一个很好的个案研案，她认为当时广东海盗的最高人数在5万—7万之间，见穆著“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 - 1810”，Stanford, California, 1987.

③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下），中华书局，1992年，第2104页。

④⑫⑰⑱⑲⑳㉑㉒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12，第72页；卷13，第66页；卷12，第31—32页；卷13，第72—82、31—37、54—59页。

⑤⑱萧一山：《清代通史》（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140、336页。

⑥程含章：《上百制军筹办海匪书》，载《清经世文编》（下），第2117—2122页。

⑦⑧④④《明清史料》（庚编，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52、486、487—490页。

⑨⑩“陈添保供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一档藏”），缩微卷，649：001888—9。

⑪⑳“吴亚二供词”、“黄亚五供词”，一档

藏，缩微卷，649：001837—42。

⑬阮亨：《瀛舟笔谈》，卷2。

⑭⑮《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3、290页。

⑯⑰《大南实录》前编，卷16，第1页；卷18，第5页。

⑱魏源：《圣武记》，卷8，“嘉庆东南靖海记”。

⑲“朱批奏折”，嘉庆十年十一月廿二日，一档藏。该“合约”最早由穆黛安发现，并在其有关研究中译成英文使用，后《历史档案》（北京）1989年第4期以《嘉庆十年广东海上武装“公立约单”》为名公开发表。

⑳㉑㉒㉓朱程万：《己巳平寇》，载郑梦玉修：《南海县志》，卷14。

㉔胡洁榆：《西营盘与张保仔祸乱之平定》，载罗香林编：《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1959年；《南海县志》，卷14，第20页。

㉕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上，第3页；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12，第47页。

㉖㉗《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第831页。

㉘“郭婆带供词”，一档藏。

㉙“乌石二供词”，载《明清史料》（庚编，上册），第487页。

㉚郭汝诚修：《顺德县志》，卷27，第1页（对照有关档案资料，该县志所记嘉庆九年应为嘉庆十年）。

㉛Canton Consultation, East India Company, India Office, London, Nov. 2, 1805.

㉜有关战斗情况可参见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上，第8—13页；《清仁宗实录》，卷215，第7页。

㉝张保、郭婆带数度攻入内河的情况，可参见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上，第15—17页；李福泰修：《番禺县志》，卷22；祝准修：《香山县志》，卷6；戴肇辰修：《广州府志》，卷81等资

料。

㉞《清史列传》，卷27，第25—30页。

㉟“朱批奏折”，嘉庆十年八月廿一日，一档藏；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12，第92—95页。

㊱孙玉庭：《延鳌堂集》，卷1，第53—55页。

㊲后来有很多人认为该文书出自张保仔匪股，参见罗香林编《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一书有关章节；《靖海氛记》的作者袁永纶认为出自郭婆带黑旗帮；叶林丰在《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一书中认为系由百龄的幕僚捉笔。以下引文出自《靖海氛记》卷下，第10—13页。

㊳“郭婆带供词”，一档藏，缩微卷，649：002428—30。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上，第15页。

㊴“朱批奏折”，嘉庆十五年正月廿二日，一档藏。

㊵“朱批奏折”，嘉庆十五年三月六日，一档藏；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下，第20页。

㊶“朱批奏折”，嘉庆十五年四月九日，一档藏；《清仁宗实录》，卷227，第21—22页。有关红旗帮投降时的具体人船数各种资料记载不一，此处取最保守数字。

㊷印鸾章：《清鉴》（下），中国书店，1985年，第524页。

㊸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下，第13页。

㊹《林则徐集》，奏稿（上），第3页；奏稿（中），第831页。

㊺参见叶林丰：《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的有关章节，以及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下，第8页。

㊻“朱批奏折”，嘉庆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一档藏；袁永纶：《靖海氛记》，卷下，第23页。

作者刘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100872）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庄子》与齐

## ——对《庄子》文化归属的再思考

□ 孙 立

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发表后，承蒙刘绍瑾先生关注，他在1997年第11期的《学术研究》上对拙文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引起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 一、再谈《庄子》的文化归属问题

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的写作，是缘于对不少文章将老庄归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一说的疑惑。拙文从老、庄故里的考辨开始，说明老、庄一不是南方人；二不是楚国人；再由老、庄与战国中期以前楚文化接触的情况，说明不是南方楚国人的老子和庄子不应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

对于拙文上述的主要论点，刘文是认可的，他说：“我们很难把老庄完全归于纯正的南方文化系统，更不用说他们是南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创始人了。”“说老庄思想属于南楚文化系统，确实有些牵强。”在认同老庄不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的前提下，刘文与拙文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最显著的乃在于刘先生认为《庄子》一书虽不属于南方文化系统，但“受到楚文化非常深刻的影响”。而我则认为，从《庄子》书中来看，无法确认庄子受到过某个楚人的影响，《庄子》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可能于楚文化中汲取更多的东西”。这一判断，是基于与庄子生平有关的史料，它们（如《孟子》、《国语》等）所记载的多是楚人向中原人学习先进的文化，而比较少见中原人是如何学习楚文化的。

至于《庄子》曾受到楚文化的一定影响，拙文并未否认。我在文中曾说：“从春秋战国的政治格局、文化格局来看，楚国、楚文化与中原各国，与中原文化有一个由敌对交锋，到逐渐同化的过程。”其中自然包括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影响，但相较而言，我以为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显然要大于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刘文强调了《庄子》与楚文化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拙文因主要为辨析《庄子》不属于南方文化系统，而较少涉及这种联系的不足，这是应该向刘先生致谢的。但这种联系欲成为一种“深刻的影响”，甚至于动摇拙文有关《庄子》应属北方文化系统的结论，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我所说的《庄子》应归属于北方文化，是从根源、渊源和所受影响的主要方面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庄子与齐鲁等北方文化的关系自然要比与楚文化的关系密切得多。

刘先生认为楚文化对庄子的深刻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楚地巫风盛行，产生了大量的神话和想象，对庄子产生深刻影响；二是他引述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及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中的两段话以说明南方地理及山川的特征。第一点所讲楚地巫风等宗教习俗，是学界熟悉的事实。《庄子》中有楚文化的印记也是有目共睹的，如《逍遥游》中的“楚之冥灵”、若干可考或不可考的楚人及楚神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楚文化因素在《庄子》中的比例究竟有多大，能否称为“深刻的影响”还有疑问。至于刘师培将庄子归属于南方文化系统，其不当处与

梁启超相同，拙文已予辨析；王夫之的序例，主要是讲屈辞与楚地风物的关系，尚不足以引证庄子与楚的关系。

为了说明庄子与楚的关系，刘先生从《庄子》找到一些例证，如说书中出现过不少楚人，庄子游历过楚地等，这是符合实际的。但问题是，这些并不能证明庄子就一定受楚人“深刻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刘先生又进一步说到《庄子》中出现的楚人多为正面形象。对此，我们也要做具体的分析。刘先生所列举的楚人中，有些并不一定是楚人，如南郭子綦（又作南伯子綦、东郭子綦），近人朱桂曜引《徐无鬼》篇证其为齐人（见《庄子内篇补证》）；九方歆，据袁珂先生说，即善相马的伯乐，在《列子·说符》中又作九方皋，其原型一说为晋大夫王良，出自《国语》晋语九韦昭注，一说为秦穆公子孙阳，出自《姓氏书辨证》引《英贤传》；伯昏瞀人也是无名氏寓托，并非楚人。而大致可确定为楚人的有些也不一定是正面形象，像刘文中提出的夷节、王果、叶公子高等人，多为中性人物，很难界定他们是正面形象；书中出现的楚王，有时也作反面形象，《徐无鬼》中楚人谪閻造怨一事也不能说是正面形象。至于说庄子游历过楚地，而且可能游历楚地最多，这能否成为受楚文化深刻影响的根据，也值得商量。相信在春秋战国诸子中，游历过楚地的为数不少。《庄子》中就明言“孔子适楚”（《人间世》）“仲尼之楚”（《徐无鬼》），我们也不能据此说孔子受过楚人“深刻影响”，甚至是南方文化的代表。荀子长期居于楚，并为楚兰陵令，学界也并未因此而视荀子为楚文化的代表，并将其归于南方文化系统。可见，即便是与楚人有过交往，甚至是生活于楚，也不能作为受其深刻影响的重要根据。

刘先生又说“江淮一带是庄子及其学派的主要活动地区”，这一推断也可商议。庄子是宋地蒙人，蒙地过去通行的说法认为在商邱东北，我写《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时即采用此说。近年来对庄子故里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经有关学

者野外发掘，认定庄子故里应在今山东省东明县北（按：此地更在原说蒙地的西北面）。1995年11月，全国庄子讨论会上，各地学者对庄子故里和生活地点依据新发现的材料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达成共识：“庄子故里在今山东省东明县，庄子为吏的漆园在今东明县裕州屯村一带，而庄寨村一带则是庄子长期生活和著述、归隐及死后安葬的地方。”（见《全国庄子研讨会综述》，载《文史哲》1996年第1期）有关学者还考证了刘先生文中所认定的位于江淮一带的“濮水”，实际上战国时它是由西南而东北流经今东明县北，《庄子》中多次提及的“河”即距东明北仅六七十里黄河，这恰好可与《外物》篇中所说“庄子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一事相印证。至于刘先生文中提及的“庄子之楚”，“庄子惠子游于濠梁”两条，也并不等于他主要活动于楚或濠梁，更不能说明庄子因此就必然受到楚人深刻影响。所以刘先生说“江淮一带是庄子及其学派的主要活动地区”是言之失据的，用以说明楚文化给庄子以深刻影响也觉乏力。

刘先生还对拙文中提及《庄子·天下篇》对孔子尊重的态度表示疑义，我在文中主要是为了说明在最能体现庄子学术思想的《天下篇》中，庄子对中原各家思想如儒法墨名阴阳诸家是熟悉的，并各有所论，而对楚人思想就没那么熟悉，甚至没有涉及。从《天下篇》看，庄子以为邹鲁之士对《诗》、《书》、《礼》、《乐》多能明之。甚至说“其数散于天下而没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道之。”表明庄子在《天下篇》中对待孔子及其学说还是尊重的，这段话，恐不能说是“与事实相违”。此外，刘先生还指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剝剥儒墨”的问题，这也是稍读过《庄子》的人都知道的，而且庄子及其门徒为了独树一帜思想，在书中不止“剝剥儒墨”，尤其是在“藉外论之”的寓言当中，他们对当时除老子外的各家显学均有诋毁。话说回来，即便是在寓言当中，孔子也并不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在不少篇目中，孔

子也经常以正面人物出现，这是刘文所疏忽了的。因此，欲了解庄子对孔墨及其他学派的想法，当然应该联系全书，但相较而言，《天下篇》能以平和的态度研讨各家之说，所论也较持平，作为学术史的资料而言，我以为《天下篇》的可信度要高于“藉外论之”的寓言。所以，庄子在“剽剥儒墨”的同时，在《天下篇》中不仅能以平和尊重的态度对待邹鲁之士，在谈到墨子的时候，一方面指出其“意则是，其行非也”；另一方面也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表明庄子在寓言、重言、卮言之外，对各家之说还是能够有持平之论的。

以上回复了刘先生对拙文提出的主要质疑，文中还有个别问题这里也一并简略予以说明。一是刘文引用《庄子·天运》中的一段话，以为庄子隐然以南方之贤者与北方之贤者对举老子和孔子。需要辨析的是，这里“隐然以”南北方对举孔老，前提是老子当时在沛，沛即今江苏沛县，与孔子在鲁相比，自然是在南。但这段话明显是寓托，能否作为根据还是两可。二是刘文指出拙文“庄子足不出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一语大误，拙文此言主要是“从《史记》的有关记载来看”，说明老子的形迹仿佛隐士，而庄子拒绝楚威王礼聘，不欲之楚任职，再加上《史记》本传中也未说明庄子是否到过楚地，故以“足不出齐、鲁、滕、宋、大梁之间”来说明《史记》中未直接记载庄子与楚地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是借用朱熹的话，所以在表述上不够严谨，这是需要检讨的。三是刘文认为拙文提出的庄子应归属于大齐鲁文化圈令人难以接受。其实，认为庄子属国宋国归齐鲁文化圈的并非笔者一人，李学勤先生曾在《东周的七个文化圈》一文中（收在作者《失落的文明》一书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齐鲁文化圈为当时七个文化圈之一，并认为“子姓的宋国也可附属于此”，另李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曾指出宋人以东夷习俗安葬滕国等地俘虏，也可佐证此点。尽管战

国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并不会随之即刻割断。其二，庄子属国宋地不仅在地域上接近齐鲁，而且他还长期浸淫于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齐鲁文化之中，在《天下篇》中他评述最多的思想家就在此地，而对楚国的思想文化则几乎没有触及；三是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庄子在思想上所关注的问题、书面语体等方面与齐鲁文化的关系要比与此前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至于此后楚文化受到老庄极大影响又是后话了）。关于这一点，拙文中已稍有涉及，下面两部分再集中叙述《庄子》与齐文化的关系，这样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刘先生的质疑。

## 二、《庄子》与《邹子》的学风及民俗文化的关系

《庄子》与齐地的关系可以从远近两个方面说。从远处说，庄子故里蒙地在夏商时期属岳石文化区，岳石文化中既有中原文化的成分，也受东夷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相混合的文化形态。因此远在夏商时期，庄子所处的蒙就与东夷文化有过密切接触。<sup>①</sup>从近的方面说，据上文所引李学勤先生的意见，东周时子姓的宋国与齐鲁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多，士奔走于列国，思想与所受的文化熏染不限于一时一地。《庄子》一书有相当多的齐文化印记。历来的文评家都指出《庄子》具有浪漫的文风、虚拟的幻境和飘渺的玄想，这种独特的文风与齐地的传统文化形态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要通过现有齐人的文献说明齐地文化的特征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具有齐地传统文化特征的《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随时已亡，虽然在汉人的著述中还残留极少量有待考究的佚文，但全貌已不能窥见。目前完整的齐地典籍传世不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管子》和《晏子春秋》，但这两部书的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

有学者将《管子》视为齐学的代表，在目前没有其他更具代表性的著作的情况下，似乎也只有从这部经过后人加工过的著作中去探究齐人的思想。现存《管子》的思想较为驳杂，但重视经世，强调法制为其突出的特点，文风也较为平实，这大约是由管仲特殊的政府官员身份所决定的。如从现存《管子》这部书而言，它与《庄子》一书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区别。在齐文化中，除了《管子》之外，能体现齐文化特征的还有兵家（据李学勤先生意见）及邹氏二子的阴阳五行文化。现存《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史记·平原君列传》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等文字中有邹衍的片断佚文，从有限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邹衍善于用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的观念及各类自然物去附会历史和人事，并表示出对名家饰辞善辩的作风不满等。但现存的佚文在文风上尚看不出飘渺玄想的成分，因为佚文毕竟是有限的。从汉代学者的有关记录看，邹氏二子的著作在内容和文风方面则多有玄想夸饰的成分。由于记录者本人均读过邹著的原文，所以他们的记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邹衍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两部，共一百余篇。《史记·孟荀列传》评述邹衍的学风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及）并世盛衰，因载其襍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涉及到邹奭的有下面两段：

“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

“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

从《孟荀列传》所叙述的邹氏二子的著述风格看，它与《庄子》一书有不少相类之处：一是文风都表现出浪漫怪异的特点；二是多用闳大广博之言；三者都善用飞潜动植等细物去推衍比附说理，精于小大之辨；四是均极富文采。此外，邹子所说的“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二语，其中“符”“应”不仅为汉代讖纬神学所袭用，在《庄子》一书的篇名中也有体现，如《德充符》、《应帝王》。《吕氏春秋》中的《应同》、《召类》两篇，学界多认为是邹子后学的作品，篇中所说“类同相召”“声比则用”等话语，与《庄子》的《渔父》、《徐无鬼》中的若干文字也有相像之处。

王先谦在《庄子集释序》中的一段话也值得注意：

“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冯闾，验小大之无垠，究天地之始终。”这与司马迁论述邹衍如出一辙。《盐铁论·论邹》一文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谈，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其中“非圣人”，“作怪谈”，与《庄子》不颇为相近吗？又王充《论衡·案书篇》：“邹衍之书，潢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这与庄子的寓言、卮言也颇有相像。扬雄《法言·问道》云：

“或云：‘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睹也。”这一段话是扬雄作为一个儒者对庄子和邹衍的认识和评价。他认为，庄子可取的地方在于“少欲”，邹衍可取的地方在于“自持”，但庄子的非君臣之义、邹衍的阴阳五行侈谈天地而蔽于人事（《汉志》所谓“舍人事而任鬼神。”），却是要否定的。扬雄在文中将庄子、邹衍列在一起评说，正可以说明他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扬雄还批评邹衍“迂而不信”（《法言·五百》），其中若

就《庄子》中的寓言、卮言、重言来说，也可以移用到《庄子》身上。此外，《汉书》说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荀子·解蔽》中说许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二者一信鬼神，一执于天道，但都蔽于不知人事或舍弃人事。荀子对庄子的看法尽管不一定准确，但邹子与庄子在善用外物来说理方面无疑是相通的。

关于邹衍的生平，《史记》记载他曾与梁惠王“执宾主之礼”，如此则与庄子同时。但当今学界多认为邹衍的生活年代应在齐宣王后期、齐湣王前期，这样他的生平活动期就略晚于庄子。从《史记》所述邹衍的著作情况来看，它与《庄子》有相类似的写作风格。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二者虽在“天道”等自然宇宙观及对天、地、人三才的整体关注方面有相同的一面，但总的思想倾向却有明显的距离，而且他们之间未见有相互称引的文字，读过两人著作的司马迁、扬雄、桓宽、班固等人虽然有的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相类性，但也没有言及他们之间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近年国内有个别学者注意到邹子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系，认为邹子在上述几个方面受道家的影响。这一说法可以参考。但我以为，邹子在可能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同时，在文风的相似方面，《庄》、《邹》极可能有共同的文化源头。

关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和他的大九州说，历来的学者都认为其源于齐燕神仙方术文化，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作为与邹衍具有相同文化形态的《庄子》，它的浪漫文风与邹子的著作一样，也应受到过齐地传统文化的影响。《庄子》一书中关于“真人”的描写、对《齐谐》一书的称引、对姑射山神人行事的叙述、以及有关“河伯”、“野语”、“南冥”、“东海”的描绘、对“养生”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庄子对齐地神仙传说的熟悉。

除此之外，齐民俗文化的一些特点与《邹子》和《庄子》也是一致的。比如关于齐人的性格智慧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多有记载，其较为集中和一致的看法是认为齐

人多智、狡黠、善滑稽、喜制谜语（隐）等。在《孟子》中，明显地嘲笑过两个邦国的人，一是宋人，他们愚笨呆傻，做出过象“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一类的傻事。二是齐人，慕虚荣、好怪诞，像“齐人有一妻一妾”、“齐东野人之语”等就明显地不同于宋人的愚笨。齐人的智商似乎是很高的，在秦以前的文献中保留了不少齐人所创制的寓言，如《战国策》中的“土偶人与桃梗”、“海大鱼”；《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晏子论天下有极大极细”；庄子所读过的《齐谐》当然也应该保留不少寓言故事。就是到了汉代，齐人的多智也见于文籍。《史记·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汉书·地理志》也说齐人：“舒缓阔达而足智。”齐人的多智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创造了不少寓言故事，另一方面，则是滑稽幽默，长于隐语。有名的如淳于髡，他的滑稽和善于论辩屡见于《孟子》、《国策》和《史记》；他长于隐语，以“大鸟止于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力劝齐威王发奋（事见《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的滑稽至汉以东方朔为传人）。荀子以隐文写成的《赋》篇，也未尝不是他游学于齐的结果。齐人的多智还表现在齐地的诗歌极富想象力，《齐风·鸡鸣》的诙谐幽默，《小雅·大东》以“牵牛”不能拉车，“北斗”不能盛酒，“箕”星不能簸扬为喻，均显示出作者超凡的艺术创造力。

齐地的这些文化特征是鲜明的、独特的，与庄子、邹衍的风格十分相近。他们具有相类的喜言神仙、善用譬喻、用推类法、富想象力、风格诡怪、狡黠聪慧。这种情况说明，《庄子》《邹子》都受到过齐地土著文化的浸淫，与齐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 三、《庄子》书中所见齐地之神话仙话

《庄子》中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神话，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在齐地流传的神话也



为数不少。下面我们将有关材料予以排列，并略加说明。

其一，《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一段不仅说明庄子读过《齐谐》这本书，而且在文中还加以引用。有学者甚至认为从《逍遥游》的开篇直到“汤问棘”一段均是庄子引用《齐谐》的原文<sup>②</sup>，是“书名插在引文中间”的例子。如若《庄子》所引确为《齐谐》原文，那么它在文风上与《庄子》之间的联系就显而易见了。

其二，《庄子》中的《骈拇》、《肢篋》、《天地》等篇中屡见有关“离朱”的记载，“离朱”原为齐人的始祖鸟跂乌，跂乌又名三足鸟、太阳鸟等。在《庄子》里，“离朱”变为一个目力超人的明目人。袁珂先生说：“是（指“离朱”）乃日中神禽即所谓跂乌、阳乌或金乌者。而世传古之明目人，又或冒以离朱之名，喻其如日之明丽中天、无所不察也。”（《山海经校注》）说明“离朱”是由齐人的始祖神跂乌演变而来，庄子以其“如日之明丽中天”，而且以为明目人。但其根源则在齐地有关“离朱”这则始祖鸟的神话。

其三，《逍遥游》中有关于“姑射山”神人的记载，原文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和飘渺的意境：“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这段为人熟悉的神话亦源自齐地的传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描述的许多景象是齐地的名物或流传于齐地的神话，由于整理者的原因误入《海外北经》，清人吴承志、今人袁珂先生都指出其中若干条应并入《海外东经》，像“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就是如此。郭璞注云：“山名也。山有神人。河州在海中，河水所经者。《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也。”其中“河水”云者，应指黄河，故姑射山所在之海应为黄河入海处之海，亦即春秋战国时期近齐燕之地的渤海。从《山海经》的记载来看，在当时的齐地应该已经流传有关于附近列姑射之山及山上神

人的传说，庄子从齐人处听说并采用了这则神话。有关姑射山神人的记载，还见于《列子·黄帝》，内容与《庄子》所记大同小异。列子早于庄子，为郑人，在《庄子》一书中屡有称引，如《列子·黄帝》篇不属伪托的话，《庄子》中的相关记载引自于《列子》一书也有可能，但其源头仍是齐地的神话传说。

其四，《秋水》篇有关河伯“顺流而东行”的记载是由中原到齐一带的景象。

从文中记叙的百川灌河，到河伯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写的应该就是黄河在秋汛时节由中原向东而流，经齐入海的景象。关于这一点，顾易生先生曾敏锐地予以指出。<sup>③</sup>事实上，《庄子》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到了东海或黄河东注入海，其中相当多的部分与齐地沿海有关，如“故海不辞东流。”（《徐无鬼》）“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天地》）“谓东海之鳖曰”“此亦东海之大乐也”（《秋水》）“东海有鸟焉”（《山木》）等。《庄子》中的“东海”有时也指吴越之地的东海，如《外物》篇中的“我东海之波臣也”、“投竿东海”等，更多的则指齐燕以东的渤海，说明庄子对由中原至齐沿海一带的情形是熟悉的。

其五，《庄子》书中对齐稷下先生和神巫方士也有记载。《逍遥游》中的宋荣子，即是稷下有名的宋钘；“汤之问棘”中的“棘”，多数人注为汤时贤人，但晋人崔骃的注值得注意，他说“棘”乃“《齐谐》之徒识冥灵大椿者名也。”“棘”在《列子》中作“夏革”，与“棘”同一人。也许由于“汤之问棘”一段“棘”所描述的为齐地景象，而熟悉齐地景象的又莫过于齐人，故崔注以为“棘”为齐人，作了汤的大夫。《庄子》中所引“汤之问棘”一段，有学者认为出自《齐谐》原文，<sup>④</sup>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棘”是齐地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另据《史记·封禅书》，燕齐多神仙方术之士，这在《庄子》中也有记录。《应帝王》云：“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而在《列子·黄帝》篇则记曰：“有神巫自齐

来，虞于郑，命曰季咸。”可见季咸原为齐人，后到郑国谋生。

其六，庄子对养生保命予以特别的关注，除了《庄子》各篇中散见的文字外，还专门有一篇《养生主》来探讨这一问题，此一情形为春秋战国其他诸子所罕见。其中固然有庄子生逢乱世、“怵然为戒”以苟全性命的原因，但也有齐地养生保命之风盛行的背景。战国中期以来，齐地一方面是邹衍阴阳五行与五德终始之说兴起，一方面是采药养生、炼金御女、羽化登仙的方士风行，威、宣二主更乐此不疲。《史记·封禅书》云：

“自齐威、宣之时，……邹衍以阴阳方术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敬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蓬莱、方丈、瀛州。”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在齐威、宣二世，邹衍之说已显于诸侯。方士虽不能通达于诸侯，但依然风行，威宣二主甚至还派人到海上寻找三神山，可见神仙方术和方士的怪说不仅在民间，就是在齐燕两地的统治者中间都颇有市场。据《汉书·楚元王传》，邹衍也曾写有《重道延命方》，并在淮南一带士人中流传，但到东汉班固时期已不易见。即便这一延命之方可能是伪托，但表明神仙方士的行为在士人中也有影响。庄子对神仙方术的态度表现出复杂性，一方面在《庄子》一书中有关于仙人（如姑

射山神人、真人等）的记载，说明他对流行于齐燕之地的神仙方术是了解的，也重视养生保命；但他又不赞同社会上所流行的神仙方士采药炼丹那一套办法，所以专设《养生主》一章倡导养生在于顺任自然，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不在于刻意的炼丹食药。这种两面性，一方面说明庄子不赞成流行于齐地的采药炼丹的养生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齐地流行的养生学引起了庄子的关注。

因此，齐文化对《庄子》的影响是广泛的，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庄子》一书所涉及的齐地的人物、神话和民俗，给《庄子》一书增添了浓郁的浪漫色彩，使之在战国诸子文中别具一番面目。我认为，这是《庄子》浪漫文风的一个来源，也是形成《庄子》独特文化品味的一个重要原因。

---

①可参阅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②④参见徐仁甫《庄子辨证》“齐谐条”：“按此引书将书名插在引文中间。上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至‘南冥者，天池也’一节，证以下文‘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一节为‘汤问棘’的引文，则此为引《齐谐》文可知。”全文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

③参见王运熙、顾易生著《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作者孙立，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试论客家文学

□ 罗可群

“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分支。它又是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少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钟情于客家文学，许多从事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民俗研究的人，也极为关注客家文学。近二三十年来，一直成为学术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内地在议论，台湾也在议论。五年前，在广西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曾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还提出了编写客家文学史的设想。1997年夏天，广东《梅州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又提起这个“老话题”。①最近，我们到福建的客家地区调查，还看到闽西连城出版的一份文学刊物，刊名就叫《客家文学》。由此可见人们对“客家文学”关心、重视的程度。然而，“客家文学”还有待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抛砖引玉，就下面的三个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 一、“客家文学”的特质

关于“客家文学”的界定，有过种种不同的意见，可分为从宽说与从严说两大类。

台湾的罗肇锦先生、黄恒秋先生和广西的卢斯飞先生明确主张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

黄恒秋先生说：“客家文学的界定，有必要再把眼光放远放宽。”②

罗肇锦先生说：“一个客家人，自然表达的语文形式是‘国语’，且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是以客家话来思考，所写的又都是与客家事物有关，那么这类作品也应当归入‘客家文学’。”③

卢斯飞先生在《客家文学研究刍议》一文特别强调：“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这是因为：划分得太严太细，……也就不可能到丰富的资料海洋中去翻滚梳爬，自然也就难于探索到客家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客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显而易见，“从宽说”从总体上去认识客家文

学，不自树藩篱，划地为牢，这是有利于“客家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的，因此，并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

“从严说”以湖北的古远清先生为代表。他在《“客家文学”界说》一文中，虽然也同意“标准不妨放宽些”，但在实际操作时，他却是从严的：“客籍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学呢？这也不一定。”“更多的客籍作家不写客家生活，但有时用某些客家生活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如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一首颇有名气的作品《弃妇》，据说就是以作者故乡梅县一位名叫刘义妹的女人为模特儿写成的。但《弃妇》没有一点客家风味，而有的是浓郁的法国风味。故客籍作家取材于某些客家生活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学。”古远清还认为，蒲风的客家方言叙事长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所写的题材是外国的，蒲风的另一部客音体叙事诗《鲁西北的太阳》所写的是山东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的事迹，“有客家语言但无客家生活风味，故这类作品严格说来，也不是客家文学。”④

《梅州日报》上《罗嗦一个‘老话题’》则走得更远。文章说：“何为‘客家文学’？说白了，就是客家方言小说。客家人写的作品，并不就叫客家文学，如《日本杂事诗》（黄遵宪）《女神》（郭沫若）《苔莉》（张资平）《风雨太平洋》（杜埃）《爱情至上》（韩素音）等。写客家人的作品，也不就叫“客家文学”。如《洪秀全传奇》（陈仕元），即使客家人写客家事的作品，也不一定就叫“客家文学”，如《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新娘娘诗》（黄遵宪），以及近年发表的好些中长篇小说。“客家文学”依我来看，不是就作者而言，不是就题材而言，而是就作品的形式、风格，主要是语言风格而言。”⑤

众所周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来源于物质生产实践。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同时又表现了作者的主观世界。

它是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的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它所处的客观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别的民系有不同之处。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客家人的特殊的思想意识，形成了有其特色的客家文化，孕育了人们公认的“客家精神”。客家文学便是这有特色的客家人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客家人主观世界的表现。界定客家文学，必须首先把握客家文学这一特质。简而言之，文学的实质是“人学”，“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情。

如果我们以此为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那么，我们会同意：

一、凡是用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如客家谣谚、客家民间故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剧、采茶戏、文人创作中的方言小说、方言诗等等都是客家文学；

二、客籍作家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只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了客家人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理所当然地属于客家文学；

三、非客籍作家若能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谭元亨的《客家魂》，也应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由此可以看到：客家文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又是有其特色的。正因为它有“客家”的特色，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客家文化史上，都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 二、“客家文学”的历史

“客家文学”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的历史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伴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秦汉说，有五次大迁徙说（以罗香林先生为代表），还有明清说。此外，还有所谓“土著说”、“混合体说”。我认为，“客家人”的出现，是中原汉人南迁的结果。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经过孕育、形成、生长、发展的阶段。“客家人”——客家民系是中原汉人多次南迁的集合体。客家先民虽然早就存在，但这一民系

的正式形成，应不早于东晋末年，不晚于宋末。我赞同客家民系形成于唐宋的见解。

客家文学可以说是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步。我认为客家文学孕育形成于唐宋，生长发育于明清，蓬勃发展于近代。现当代的客家文学则已经有了自觉意识，逐步走向成熟。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学中的瑰宝。它的表现手法，明显地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它和汉乐府、南北朝民歌也有密切的关系，直接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黄遵宪在辑录《山歌》时就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之意”，<sup>⑥</sup>而它那七言四句的形式则类于唐宋近体诗中的绝句，只不过客家山歌来自民间，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这是因为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地位的变化而使然。目前虽然没有史料具体证明客家山歌形成的时间，但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所记唐朝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事，以及客家地区关于唐朝诗人罗隐与刘三妹对山歌的传说来看，认为客家山歌形成于唐宋不完全是无稽之谈。若以明清时期已经大量出现客家山歌来反证，也可说明唐宋时期应是客家山歌的孕育、形成阶段。

从文人创作来看，唐宋也还属于孕育形成时期。唐代的贤相张九龄，是杰出的客家先民。《唐诗三百首》的开篇，便是其五言古诗《感遇》四首。虽然他的大部分诗文还没有明显的“客家文学”的特色，但是在他的作品中，确实有一部分（例如这四首《感遇》诗）真实地表现了客家人在复杂的斗争中谦和而刚毅的心理，蕴含着客家人群体性格的特点。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称张九龄为客家文学的代表作家，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有些作品确实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围。唐宋时期的客籍作家大都可作如是观。

明清是客家文学的发育成长期。从民间文学来说，客家民系的群体生活产生了许多童谣民谚，有许多民间故事，更有大量的客家山歌。还有独具特色的客语对联。这些作品无不是客家人生活的写照。例如著名的儿歌《月光光》就是流传极广的客家童谣，它是客家人教育孩子的启蒙教材，是熏陶儿童性情的文学创作，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

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较有客家文学味道的，首推廖燕的《曲江竹枝词》。它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风土民情，如：“遇仙桥下水澄鲜，遇仙桥

上路通天。谁信神仙容易遇，遇郎难似遇神仙”，就表现了客家山区的妇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至于乾嘉时期的宋湘，他的许多诗作已充满了浓郁的“客家味”（详见拙作《宋湘诗歌中的客家情调》，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4期）。其他客籍诗人李黼平（绣子）、颜检、李光昭、黄钊、温训、吴兰修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客家文学的成长发育，不仅作品数量激增，而且门类较为齐全。除上述的童谣民谣、山歌、民间故事、客语对联、竹枝词、文人诗歌外，还出现了小说，例如黄岩的《岭南逸史》。

到了近代，客家文学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它的显著特点就是客家文学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客家歌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稍后的“岭东诗派”，以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丘逢甲以及胡曦、温仲和为代表，更因其诗作富有客家风味而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详见拙作《试论近代的‘岭东诗派’》，载《客家学研究》第2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他努力辑录、赞颂客家山歌诚属可贵，又有真实反映客家地区乡情民俗的名篇。如《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客家的人文景观。如：“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写曾祖母对自己的启蒙教育。“三岁甫学步，送儿上学堂”，则反映出客家人重视教育的程度。写客家人扫墓：“上头蒸红香，中间酌黄酒。青箬苍黍粽，紫丝络莲藕。大父在前跪，诸孙跪在后，森森排竹笋，依依伏杨柳。”客家人敬祖先、重亲情的传统在长诗中得到形象的体现。黄遵宪的《新嫁娘诗》更是详细描绘了客家新娘复杂的思想感情，微妙的心理活动。这些都是文人诗歌中的佳作。至于胡曦的乡土风情诗以及客家地区的竹枝词（如《梅州竹枝词》、《宁江竹枝词》、《镇平竹枝词》等等）全都有浓郁的客家风味。此外，客籍女诗人范萸香、叶璧华也有颇具特点的华章，抒写了客家“才女”的心理。

在辛亥革命斗争中，客家文学注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内容。许多客籍诗人本身就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特别是南社诗人古直。民国以后，他为弘扬客家文化做了许多工作，编纂《客人丛

书》，撰写《客人对》，非常重视继承客家文学的传统，专门编选了宋湘、李黼平、黄遵宪的诗集，名之为《客人三先生诗选》付梓发行。

现代是客家文学走向成熟的时期，它有了明显的自觉意识。客家山歌最贴近社会生活，在客家山乡，山歌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形式，恋爱、社交、娱乐、劳动都有山歌。真正是时时可见，处处可闻。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山歌也发挥其“自古山歌从口出”的特点，成为对敌斗争的武器。如五华县烈士张剑珍在刑场上唱出了气壮山河的山歌：“人人话偈共产嫌，死都唔嫁张九华（反动头目——笔者注），红白总会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在文人创作方面，这种自觉意识表现为作家主动地、有目的地运用客家方言去进行创作，或着意地表现客家情调，反映客家人生活。著名的现代作家张资平，他的《梅岭之春》被认为是最有客家风味的小说。中国诗歌会的主将蒲风，致力于诗歌大众化运动，他的客方言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鲁西北的太阳》是专门为客家人而创作的。而他的力作《茫茫夜》、《六月流火》都取材于客家地区，是典型的“客家人”写“客家事”。在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积极投身方言文学运动，楼栖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小说有浓郁的客家氛围，如《枫林庄》、《没落》，他的方言长诗《鸳鸯子》更是自觉地以客家山歌的形式，反映一位饱受苦难的客家妇女进行反抗斗争，翻身求解放的历程。

这一时期，有些客籍作家由于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客家生活在他们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不一定有意识去创作客家文学作品，但其作品的客观效果仍然有或多或少的“客家味”。这类作品也不应该排除在客家文学之外，例如上文所提到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名篇《弃妇》，“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为灰烬，从烟突里飞去”“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邱墓之侧”，当我们反复吟咏，体会这些富有象征派诗歌特点的诗句时，就仿佛感到一位饱受命运捉弄的客家农村的弃妇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这正是李金发以他的故乡梅县的刘义妹为原型创作的结果。我们不能因它采用的是象征主义的手法而否认它属于客家文学。至于有些长期不在客家地区生活的客籍作家，他们的作品既不是“写客家人”，也不是



“写客家事”，虽然他们创作有优秀的作品，如碧野，却也不必硬把他列为客家文学的作家。

在现代，台湾的客家文学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局面，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评述。

### 三、“客家文学”的发展

解放以后，大陆的客家文学在曲折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

客家山歌的发展历程具有代表性。推倒三座大山，农民翻身作主人，山歌也从岗头溪尾走进了乡镇城市，面对大庭广众。形式亦由独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表演唱，乃至形成了新的剧种——山歌剧。出现了《闹公堂》、《唱夫归》、《挽水西流》、《彩虹》等优秀作品。经“文化大革命”的沉寂后，1978年客家人的中心——梅州市组织全市优秀山歌手巡回各县，举行了山歌擂台赛，1980年征集了一万多首山歌，从中整理出近二千首编辑出版，题为《粤东客家山歌》。在客家山歌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歌手，也孕育了以创作客家山歌而著名的新人，如黄火兴、余耀南、汤明哲、张振坤等，他们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有的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出版了专门的论著。人们对其它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客地谣谚、民间故事等，也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工作。采茶戏、提线木偶戏、广东汉剧也都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影视文学是客家文学的新品种，客家民间文学中的精品搬上了银幕荧屏，还出现了《生死树》等富有客家风情的电影，也有反映客家人生活的电视连续剧。

至于小说创作，更不应妄自菲薄。客家人“写客家人”，已成为许多客籍作家的共识。有全国影响的客家文学的代表作家程贤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反映了客家地区的“改革风云”与“地域文化”，被誉为“客家韵味境界新”，其代表作《神仙·老虎·狗》和《围龙》引起全国评论界的重视，这便是当代客家文学的实绩。我们如果仔细研读程贤章的作品，便不难发现：它并不是方言小说，却有浓郁的“客家味”。它用事实告诉人们：“客家文学创作”，并不一定要写“客家方言小说。”正因为我们的社会

中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客家文学”，我们也就无须强调“创立客家文学”，而应该大声疾呼：“发展客家文学！”

如何发展客家文学，促进客家文学的繁荣呢？我认为应从三方面着手：一、应深入研究客家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客家文学创作的经验，认真分析其长处及短处，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二、客家地区凝聚着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客家民系是富有特色的群体，应提倡作家深入客家地区（包括已经比较富裕的，如深圳、东莞等地区，也包括还较贫困的粤赣闽边界地区），到群众中去，创作出能深刻地反映客家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表现客家人喜怒哀乐的佳作；三、加强语言方面的锤炼。这里所说的语言，既是指我们经常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更是指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载体。语言的功夫如何，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质量。程贤章的成功之处在这里，不足之处也在这里。就拿其代表作《神仙、老虎、狗》和《围龙》来说，他能熟练地运用客方言的俗语、谣谚来描绘风土人情，刻划人物性格，但在好些地方，仍存在语言粗疏之处。我们强调语言，并不等于说语言就是一切。那种认为客家文学就是方言小说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只局限于写“方言小说”，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客家文学的繁荣。

---

①胡希张《罗嗦一个老话题》，1997年8月23日《梅州日报》。

②黄恒秋《客家文化的省思与前瞻》，转引自《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第189页。

③罗肇锦《何谓客家文学》转引自《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第189页。

④卢斯飞《客家文学研究刍议》，载《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第189页。

⑤古远清《“客家文学”界说》，载《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第2期。

⑥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作者罗可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510421）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中的情与理

## ——《牡丹亭》与《欧拿尼》比较

□ 徐顺生

我国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1598年）和19世纪法国雨果的《欧拿尼》（1829年），是中西浪漫主义戏剧的巅峰之作。它们以人性之“情”反对封建主义之“理”，让觉醒了的具有“自我”个性的人，冲决各种阻力，勇往向前。这两部浪漫主义剧作，昭示了新兴社会力量的无穷生命力，有其社会的和戏剧艺术发展的必然性。

### 一、“情”胜“理”的两种形态

与不同历史阶段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相适应，也受各自戏剧艺术传统的影响，《牡丹亭》和《欧拿尼》在表现情与理的冲突斗争时，体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形态。《牡丹亭》向人们展示梦幻的境界，细腻描绘人物柔婉曲折的心理，以动人心魄见长；《欧拿尼》则直接描写现实中人物尖锐的矛盾冲突，以决绝悲壮的风格取胜。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热烈地讴歌“情”胜于“理”的伟大力量。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词》中申明创作主旨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

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剧中杜丽娘因追求爱情生梦，因梦而病而死，表现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历来的戏曲小说在写“情”时，多安插父母反对、小人使奸作为阻力，但杜丽娘纯粹由于对爱情的渴求而死，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剧作还以浪漫奇幻的想象表现爱情的巨大力量，杜丽娘终于为情死而复生，并同柳梦梅同结连理。围绕着杜丽娘的生死，剧作揭露了晚明社会封建礼法的罪恶，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光辉的叛逆形象。

《牡丹亭》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它问世不久，就出现了“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sup>①</sup>的盛况。《牡丹亭》的艺术魅力，与作者以细腻热情的笔触，深入地描写人物独特的个性心理有关。杜丽娘青春觉醒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喜悦和惊惶、热烈执著和沉重艰难的矛盾历程。她比历史上反抗封建礼教的女性所受到的束缚更严厉沉重得多，她甚至连自己家里的后花园也不能随便踏足流连。因此，当她在游园中观赏到旖旎动人的自然景色，在赞叹、惊喜和入迷的同时，萌发了对爱情的追求，就是很自然的了（《惊梦》）。试看曲子〔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曳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此曲景语蕴含情意，把一个长期禁锢闺房、因春光感召而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独特心理情态，描摹得生动传神。

杜丽娘在游园中看到春色满园无人问，不由得引发无限感慨和忧伤。她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里不单是把景物作强烈的对比，也是人物身世遭遇的鲜明写照。像鲜花那样“姹紫嫣红”的不正是杜丽娘的青春之花吗？但她却被锁闭在不见天日的深宅大院之中。睹景伤情，她发出感叹和责问：天赐如此美好春光景色，有赏心乐事的又有哪一家呢？

伤春惜春之情见于言表，深沉感叹中包含对封建礼教的怨恨和控诉。

杜丽娘被无边春光勾起对烂漫多彩生活的向往，沉睡的情在觉醒，接着是梦情人、寻梦境、写花容、入冥府、魂幽媾、返阳世等生死往复的情节，其中无不贯串着“情”字。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情”作为驱动力使她战胜“理”。这一切都是通过现实与幻想两种境界的交融、细腻地刻划人物的情感心理而实现的。

雨果的《欧拿尼》是浪漫主义戏剧彻底战胜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之作。它也以情与理冲突的展开构成戏剧情节，但由于结合着具体历史事件中人物的冲突和斗争，使剧作产生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激情。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为父复仇的故事。主人公欧拿尼本是西班牙贵族，他投身绿林，伺机向国王卡洛斯报杀父之仇。欧拿尼与吕古梅公爵的侄女素儿彼此热恋着，但国王和公爵也觊觎素儿的美色。一个夜晚，国王及其侍从前来劫夺素儿，欧拿尼及时营救了素儿。后来欧拿尼被国王率领的卫队围困在吕古梅家的城堡中，吕古梅遵从不出卖宾客的侠义观念，拒绝交出欧拿尼。为感谢吕古梅的掩护，欧拿尼将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力交给了对方。后来卡洛斯当上了日耳曼帝国的皇帝，恢复了欧拿尼简武安公爵的爵位，并同意他和素儿结婚。新婚之夜，吕古梅吹响了催命的号角，欧拿尼和素儿只得自杀，吕古梅也自戕而死。

欧拿尼和素儿的殉情，也谱写了一曲自由纯真爱情战胜封建主义理性的浪漫主义之歌。由于雨果在创作中贯彻“美丑对照”的原则，使情胜于理的冲突得到更鲜明集中的表现。雨果在著名的《〈克伦威尔〉序》中曾指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sup>②</sup>雨果这一论述是针对古典主义戏剧崇尚理性、把帝王贵族作为赞美的描写对象而发的。他认为艺术描写不应排斥生活中平凡粗俗的形象，“自然中的一切在艺术中都应有其地

位”。他是想通过对照的原则，使崇高的更加崇高，使优美的益显优美。

在美丑对照中使事物发生碰撞和冲突，必然激发出火花，产生出激情。雨果正是以这种美丑对照的原则，对当时在剧坛仍占有统治地位的理性原则作最后的冲击，最终使高尚的情感压倒并战胜封建主义的理性。《欧拿尼》一剧在情节内容、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等方面的对照是很鲜明的。从情节线索所形成的矛盾冲突上看，欧拿尼与素儿之间以生死许诺的纯真爱情，同卡洛斯国王企图利用权力占有美貌少女，以及正向坟墓走去的吕古梅公爵仍厚颜无耻地要同侄女结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性格上，欧拿尼的高尚豪侠、光明磊落、义无反顾，与国王躲在壁柜偷听、想趁夜晚劫掠素儿的卑劣委琐，以及吕古梅公爵吹响号角置人于死地的狠毒，又是一重对照。

作者还遵从生活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进行人物本身性格的对照。欧拿尼虽然报仇心切，但当国王不愿意决斗时，他却要像贵族那样体面地放走国王。他明知吕古梅是自己的情敌，却把处置自己生命权力的号角交给对方。同样，吕古梅在古堡家里掩护情敌欧拿尼，国王宽容地赦免谋反的贵族并成全欧拿尼与素儿的婚事，都和自己的主导性格形成对照。这种美丑对照原则的运用，多侧面多角度地肯定了真挚美好情感的力量，批判了封建专制之理的荒谬。首先，它使卑贱者、被压迫者的品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得到肯定和赞美，也使地位显赫的统治阶级在对照中暴露其卑鄙齷齪；其次，对照原则带来剧本情节的错综曲折，起伏跌宕，产生令人回肠荡气的激情效应；最后，美丑对照原则否定了古典主义从“理性”出发的关于人物性格定型化和类型化的理论，并在情感的驱动下驰骋想象，通过人物富有个性特点的斗争行动充分展示性格特点。

《欧拿尼》的激情产生于美丑对照的矛盾冲突之中，《牡丹亭》动人心魄的感情产生于大自然感召下的心理觉醒之中。前者

始终贯穿着人物的行动和斗争，后者以细腻的心理刻画见长。《欧拿尼》创作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的王政复辟时期，雨果说：“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sup>③</sup>他把文学上向古典主义争取创作自由和政治上向复辟王朝争取社会自由联系起来，因而让他的人物为爱情和理想而行动和斗争，直至献出生命。《牡丹亭》创作于晚明时期，当时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社会和人性的都还处在觉醒的时期，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东西，只好到梦幻境界中去寻觅，并在幻想的过程中实现。中西两大浪漫主义剧作在表现“情”胜“理”斗争时的差异，体现了各自在特定历史阶段反封建斗争的特点。

## 二、内形式与外形式的纷争

充满激情、崇尚想象、向往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不单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上要反对封建主义之“理”，而且在表现形式上要破除旧形式的种种束缚，以争得反映表现生活时更大的自由。形式规模所体现的创作法则、规范也是一种“理”，这是创作中形式规律之“理”。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在文学内容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往往随之出现对形式的重大突破。《欧拿尼》的成功上演，冲破了古典主义僵化的内形式的拘束；《牡丹亭》问世以后，也引发汤显祖与沈璟之间关于外形式的争论。浪漫主义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可看作是情与理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艺术作品的形式一般可以区分为内形式和外形式。内形式指作品内部的结构方式，和作品的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文学作品来说，内形式指情节、环境、场面的构思安排，人物关系的处理，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巧妙独特的组织结构。如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对情节、时间、地点的整一性作严格规定的“三一律”，就是一种内形式。外形式则和传达内容的物质媒介直接相关，它在主要诉之于视觉、触觉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中显得特别重要，讲究色彩、线条、形体、质料等物质材料所呈现出来的外形式的美，是这些艺术类

型的重要特点。文学的物质媒介是语言，语言艺术主要诉之于欣赏者的想象。因此外形式在文学中的表现不是那么鲜明突出。作为文学的物质媒介的语言，包含有意义和声音两个层面，而文学的外形式就是指语言声音层面所形成的声调、韵律和节奏感的美。

作为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代表作的《牡丹亭》和《欧拿尼》，都要求突破繁琐僵硬的形式束缚，以使情感在宽松自由的条件下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这是主情的浪漫主义戏剧的共同特点。但在形式问题上引起争论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牡丹亭》引起外形式的争论，《欧拿尼》则在内形式上有重大的突破。产生差异的原因既耐人寻味，又有深刻的内涵。

17世纪在法国兴起的古典主义是当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适应政治上巩固专制一统的王权的要求，对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提出了种种规范化的要求。其中，“三一律”要求剧本的情节、时间和地点必须完整一致，即每个剧本只能写一个故事，事件始终在一个地点，并于一天内完成。“三一律”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情节整一律”。1545年意大利学者琴提奥提出了“时间整一律”。后来，意大利的卡斯特尔屈维罗又提出“地点整一律”。到了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法国法兰西学士院负责人沙坡兰和剧评家多比雅克神父，将三个“整一”合在一起，借亚里士多德之名正式提出了“三一律”<sup>④</sup>。进入古典主义的全盛期，布瓦洛1674年发表了对古典主义理论作全面总结的《诗的艺术》，进一步对“三一律”作出规定：“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着剧情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sup>⑤</sup>对此，马克思曾指出：“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sup>⑥</sup>

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是崇尚理性原则在艺术形式规律的表现。按照布瓦洛的

说法，它能使戏剧创作“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sup>⑦</sup>无庸讳言，“三一律”如果运用得好，将有利于剧作情节结构的紧凑、集中，但它并不适用于一切题材，也不适用于一切戏剧形式。就整体而言，“三一律”刻板僵硬的规定，限制了戏剧舞台更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扼杀了作家蓬勃的创作生机。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高乃依和莫里哀，都为勉强遵守这些规定而深感苦恼。高乃依的《熙德》于1936年上演后受到普遍的欢迎，普希金也说：“我觉得《熙德》是他最好的悲剧”。<sup>⑧</sup>但却因违犯“三一律”而遭到围攻批评。

古典主义戏剧的创作法规对18世纪启蒙戏剧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像伏尔泰、狄德罗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家，毕生都没有完全摆脱古典主义戏剧对他们的影响。伏尔泰一生戏剧创作颇丰，被誉为“伏尔泰就是18世纪的全部悲剧”<sup>⑨</sup>。但他所能做的只是用旧瓶装新酒，在“三一律”等古典主义法规的限制下宣传启蒙的思想内容。正因为这样，伏尔泰对莎士比亚表现了既肯定他具有“卓绝的天才”、又贬斥他“断送了英国的戏剧”的矛盾态度。<sup>⑩</sup>

浪漫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对古典主义的猛烈批判和冲击。雨果于19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宣言，而1930年《欧拿尼》上演成功，则被看作是浪漫主义戏剧乃至整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胜利。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对“三一律”等僵死戒条的批判是深刻的。他指出，“地点一致”的条规总是使剧情“发生在过道、回廊和前厅这类公式化的场景里”<sup>⑪</sup>，戏剧中的许多行动场面，都只好到后台去进行。而“时间一致”的规定“把剧情勉强纳入24小时之内”，就像“一个鞋匠给大小不同的脚做同样大小的鞋，岂不好笑”。如果两种“一致”同时向戏剧创作提出要求，那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他说：“关在‘一致’笼子里的，常常是一具枯骨。”<sup>⑫</sup>从这种认识出发，雨果在《欧拿尼》一剧中彻底突破了“三一律”的束缚，剧情时间远远超过24小时自不待说，

地点也随剧情的进展不断变换，五幕剧是五个地点，第四幕的场景甚至跨越西班牙的国境到了普鲁士的夏倍尔城。这种时间、空间上的突破，为剧作家在处理情节、驰骋情感想象、追求理想等方面，提供了更大的自由。

《欧拿尼》以突破“三一律”而在内形式上对古典主义的戒律进行反拨，但《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却和吴江派的沈璟在语言的音韵声律即外形式上发生一场论争，表现了中西浪漫主义戏剧在形式追求上侧重点的不同。

沈璟是著名的戏曲声律理论家，他强调戏曲文辞“合律依腔”的重要性。他说：“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sup>⑬</sup>对曲词声腔的音韵格律要求，是适应舞台演唱的需要，也是戏曲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地方。沈璟对这方面的强调是合理的、必要的。但他常常为恪守形式规律而忽视了情感意蕴等内容因素。他曾说：“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sup>⑭</sup>这已有为形式而形式的意味了。汤显祖则较能正确处理情感意蕴与格律声韵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后者对前者的依附关系。首先，他认为“时势”的变化决定歌曲的长短和字句的音节。他说：“上自葛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转声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长，时势使然。”<sup>⑮</sup>“时势”的变化，决定社会生活、词曲情感内容的变化，最后决定音律的变化。其次，音律的急促舒缓要适应不同地域人们表现感情的需要。他说：“南歌寄节，疏促自然。五言则二，七言则三。变通疏促，殆亦由人。”<sup>⑯</sup>前者从社会发展的纵向看，后者从不同地域的横向看，都表明格律声韵应从属于情感意蕴的表达。尽管汤显祖说过“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sup>⑰</sup>之类的过头话，但他在创作实践中并不是按照这种意气用事的话行事，他的矫枉过正的话，传达了浪漫主义情感要求突破声律束缚的迫切愿望。

汤、沈的争论表现了戏曲的情感意蕴



要摆脱外形式束缚的抗争，而雨果的《欧拿尼》则直接向扼制情感的内形式发起冲击。是中西戏剧性质、特点的不同所造成的。从戏剧情节的结构看，西方戏剧强调冲突的强烈集中，形成板块连接式的结构，每一幕是一个板块，纵横交织的情节线索以网状的形态挤压在板块之内，使冲突在板块内酝酿生成，并通过板块的连接逐步推向高潮。试看《欧拿尼》的第三幕。故事发生在亚拉岗山区吕古梅公爵家的城堡中，吕古梅的逼迫素儿小姐与他举行婚礼，素儿准备以死殉情。此时欧那尼装扮成过路香客前来借住，欧拿尼与素儿的恋情暴露，引发了欧拿尼与吕古梅的激烈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卡洛斯国王率领卫队追捕欧拿尼也来到城堡，但吕古梅认为保护客人是他的职责，拒绝交出欧拿尼。最后卡洛斯国王把素儿当作人质带走了。在这一幕中，四个人构成的五条冲突线成网状交织在板块里，情节跌宕起伏，冲突尖锐扣人，而这一切全赖内形式对情节组织安排的结构作用。它突出地显示了西方的冲突型的戏剧侧重于对内形式的关注。

中国戏曲是叙事性的戏剧，虽有冲突却不尖锐，有的甚至只有矛盾而无冲突，但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却是它的鲜明特点。著名导演焦菊隐说：“咱们戏曲讲究从一开始就贯穿到底，不让断气。这一点是咱们戏曲的好处。”又说：“咱们戏曲就是明场交代，什么戏都要明场交代，暗场交代很少。”<sup>⑮</sup>连贯性和明场交代，使戏曲形成线性叙事的特点。“场”可以有大场、小场、过场、圆场等的区分，以适应明场叙述事件的长短大小的需要，且场数往往很多，如《牡丹亭》就多至 55 场。这些“场”形成线性的排列，叙述一个有头有尾、体现因果关系、连贯发展的生活故事。与西方戏剧强调冲突的板块艺术相对照，人们称中国戏曲为叙事性的点线艺术。由于中国戏剧在结构情节时有叙事型和冲突型的不同；中国戏曲和叙事体相适应，内形式比较自由；西方戏剧与表现冲突相适应，对内形式有更严谨的要求。

中国戏曲虽然在内形式方面有较大的自由，但在外形式方面却因追求形式美而形成种种规定和限制。由于把音乐舞蹈这些表现性艺术的因素交融于其中，所以中国戏曲有强烈的情感表现的特色。戏曲吸收了音乐舞蹈因素，形成了舞台表演程式的形式美，诸如声腔美、旋律美、姿态美、动作美等等，这些均有利于剧情内容抒情性的表现。这些形式美有其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所以戏曲的内容不宜过分复杂，以免影响形式美的表现。而西方的戏剧以比较复杂的生活内容取胜，直接打动观众的就是曲折复杂的情节内容，不宜太过强调形式来限制内容。

---

①沈德符《顾曲杂言》。

②④《雨果论文学》第 30、53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 5 月第 1 版。

③《雨果论文学》第 92 页。

⑤布瓦洛《诗的艺术》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608 页。

⑦布瓦洛《诗的艺术》第一章。

⑧转引自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版，第 233 页。

⑨朗松《法国文学史》第 652 页，转引自吴岳添《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第 55 页。

⑩《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 347 页。

⑪⑫《雨果论文学》第 49—52 页。

⑬沈璟《词隐先生论曲》。

⑭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

⑮汤显祖《答凌初成》。

⑯汤显祖《再答刘子威》。

⑰汤显祖《答孙侯居》。

⑱《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

作者徐顺生，暨南大学中文系（510632）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协调发展：人类的永恒主题

##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评介

□ 习万球

站在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关头讨论人类把什么样的世界带入 2000 年，表明人类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关心。放眼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令人欢欣鼓舞，然而人口、资源、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且让人不安。我们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行为模式呢？最近，笔者读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新家的新著《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 1 版），认为该著作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吸收了当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把经济学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把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与生态学研究结合起来，构筑成一部立意新颖、较为系统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专著。我认为该书有以下特点：

### 一、从经济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统一系统出发

作者指出，因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环境建设和环境治理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使得人类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使得人们遇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还因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不协调，引发意想不到的、危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诱发严重的环境危机。因此著者在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协调将成为新世纪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协调发展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际上要解决的主要是在人类社

会内部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关系，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关系。

作者认为，今天，我们不能完全按照以往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解决问题，也不能完全按照以往的方法论来进行科学探索。（第 33 页）我们除了要继续不断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个领域探索奥妙和开拓前进外，还要努力促进它们的协调发展。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改变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传统认识，特别要改变那种忽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后才有可能在实践中采取自觉的行动。（第 34 页）作者提出把经济、社会和环境纳入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重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作者紧紧地把握了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生态学研究的研究的结合上迈开了第一步。根据新的研究，作者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样的概念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生产力定义为征服自然的力量是不对的，他的定义是：生产力是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一个抽象概念，它是指人们生产使用价值、协调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那种能力的物质和技术方面，它的构成要素形成一个系统。（第 116 页）对于生产关系，作者的定义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或经济活动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有些是属于生产力意义上的关系，有些则是它们的社会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有些是历史发展的一切时代或几个不同时代都具有的共同关系；

有些则是构成一定历史时代或社会形态的基础，而与其他时代作为基础的那些关系各不相同。我们把后者称之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第 126 页）这一定义一方面消除了过去生产关系概念的含糊不清，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社会经济系统中，除了生产关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关系影响社会经济和生产发展。

此外作者阐发了经济学的时空观，在论述协调发展所要求的经济观时指出，我们毫无疑问应考虑经济系统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第 167 页）他对经济活动代价和效益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得出的结论是：“为确保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尽量降低经济活动的各种代价，尽量扩大它的各种效果，而现在是要普及对代价和效益的全面认识，寻找反映它们高低的指标体系，才有可能进而采取措施缩小代价和扩大效益。”（第 159 页）

## 二、初步形成研究协调发展的理论体系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分析并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经济活动的规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该书从我们要的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全球关注的命题开篇（第一章）；列举了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危害，总结了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教训和从中所得到觉醒（第二章）；紧接着就社会协调发展的特征、目标和实现机制进行研究（第三、四、五章）；悟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观——协调（第六章）；对经济发展在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第七章）；然后分别论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第八章、第九章）；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整体协调（第十章）；因为协调发展本身就是一项科学技术工作，如果没有科学技术方面的相应进步和突破，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论述了科

学技术在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第十一章）。

三、对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协调发展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作者较为具体地论述了其中的一些方面，比如作者论述了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运用数学分析方法从劳动力资源、其他生产要素以及它们所创造的收益等方面关系的分析中，探讨了整个社会和一个城市和环境地区的最大人口容量和最佳经济人口，分析了人口分布与资源开发、城市建设、地区发展、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协调。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人口地区分布的调整，作者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为协调发展涉及到社会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所以作者特别强调政府在促进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制定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强调全社会的统一管理；强调协调发展既是一项科学工作，又是一项技术工作，提出根据协调发展的要求来发展科学和技术等等，这些论述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实际意义。

李新家同志的这部著作被列入《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是作者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晶。然而协调发展问题是涉及面相当广泛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协调发展工程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赖于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不可能期待一本著作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这一课题，也希望作者在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生态学研究的结合上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作者 习万球，广东商学院副教授（510320）

责任编辑：韦 前

方克立教授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为现代新儒学的研究, 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成果。

是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宏大体系中考察, 还是拘定于一个为文化而文化的小圈子, 这是区别一种文化及其研究是否具有开放性和生命力的重要条件。现代新儒学诸辈人一贯将中国传统儒学的研究置于世界文化大系统中比较、参悟, 这也是其至今生息不止的原因之一。方著依此种同情之理解, 从探讨现代新儒学的思想渊源入手, 包括西方的柏拉图等古典哲学思想, 现代柏格森主义, 中国的先秦儒学及宋明理学, 理清其脉络, 充分肯定了现代新儒家开放的学术思维和传统的文化操守, 并将其吸收到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来。如作者期望“在深入比较研究了世界各大哲学系统之后, 会把中国哲学的特点更准确、更清晰地揭示出来, 建构起更加符合实际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第569页)视角上采用东西哲学比较, 或东亚文化圈内的地域比较等都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服务于文化的现代化。

方著以平实的态度, 如实勾画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全书既有对儒学发展的总体的流变论述, 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的形成都进行了系统的交代和分析; 更有对现代新儒学的断代分疏, 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第一代到杜维明、刘述先和成中英等第三代, 都分别进行了论述。既有对代表人物的思想评点, 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冯友兰的“新

理学”、牟宗三等的“返本开新说”、杜维明的“创造转化论”及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等。也有对复杂的文化背景阐释, 如科玄论战, “五四”前后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论战都作了细致的说明。作者还指出, 现代新儒学前期有系统的理论体系, 但在对现实的切入中却表现得较为疏淡; 而其后来学者则于理论体系上正处于构筑之中, 但他们更敢于正视现实的格局而进行理论探讨。当然, 这不是现代新儒家学者个人学术上的原因, 而是历史时代使然。现代新儒家学者中梁漱溟、熊十力等处在水深火热的民族救亡运动中, 当时的世界科学水平及社会格局远没完善, 而当代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刘述先等处在和平的世界大环境里, 理论背景是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应该说, 这种分析和结论是中肯的。正是在这种立体结构之中, 方著从时间、空间维度, 现代新儒学内外的思想流变等多视角展示了现代新儒学的全貌。

方著提出了“批判继承历史传统, 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这与其“同情地了解, 客观地评价, 批判地超越”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通过探讨学术史上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和“彻底重建”等各种理论, 作者提出了学习、借鉴、继承、选择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 即批判继承和“分析与综合相结合, 综合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论, 这对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作者指出, 对于每一种文化思潮的研究, 都要以世界背景下的时代精神为起点, 辩证地看待。在讨论“文化中国”

## 同情地了解 批判地超越

——读『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曹智频

论时，作者指出，该理论具有感召力，能凝聚世界上华人的心志，取得方向上的认同，但同时也指出，考诸各地华人世界文化底蕴的相异之点即本质上的不同，“文化中国”论的民族出路是一种空泛之说，这也是中肯之论。

现代新儒家所关注和回答的始终不离“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主题，（第41页）其思想是由“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面临着深切的现代化问题”（第20页）而产生。基于现实服务的宗旨，所以，“现代新儒家的根本精神不在复古，而是企图以此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失坠，保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第71页）在当代中国内地也是“更紧迫地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所以，中国内地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也反映在这一点上。而且现代新儒学的影响，着实存在于当前的学术界，其思想内涵也有很多可补益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分，这对于现代新儒学也有其十分必要的促进作用。现代新儒学“收拾不住”的局面一跃变为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显学就证明了这一点。方著对此有着深切的关注。现代新儒家反对西化派否定传统的态度，主张继承优良传统，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方著对此持欣赏、肯认的态度，认为对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补益，尽管对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用人文主义的道德主体来实现

转化社会政治的宏愿表示不敢苟同。方著这种现实的抉择是有其原因的：一则现代新儒家的“由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的主张缺失了物质的基点沟通；另外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现实与现代新儒家第三期所指的后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结论的意义在于用理论疏通了现实的文化建设的症结之处，有利于培养学术落归现实的风气。

方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内地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状况，有课题之缘起，也有十几年来内地的研究态势和成绩等。到1997年，课题组已出版了现代新儒家的学案、研究丛书、辑要、论文集及部分专人研究在内的约1400万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从宏观到微观，从专人到专题，几乎涉猎到现代新儒学的所有领域”。（第609页）所以，海外学界也评价为“客观、平实、公正、全面”。但是，方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指出，内地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总的还停留在介绍、评述、分别进行专人、专题研究等基础性工作上，新儒学研究真正高水平论著还没有出现”。（第622页）这也就确定了内地新儒学研究在进路和层次上都有待深化的前景。

作者曹智频，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510275）

责任编辑：罗 莘



# 可贵的探索 丰硕的收获

## ——评柯汉林《美的形态学》

□刘 晟

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及 80 年代的美学热相比，这些年来，美学研究相对沉寂。此时我读到柯汉林先生的新出大著《美的形态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深为他执着于学术的精神所感动，并钦佩他在美学上富有深度的研究。

这是一本旁涉中西美学史、美的本质论、审美心理等方面内容，而以美的形态为研究中心的第一部系统研究的专著。其突出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逻辑严密，自成体系。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美的各种形态，前人时贤多有论及，但多局部的探讨，少有系统的研究。柯先生首先提出了美的形态学的设想，并将其付诸实践，构筑起了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美的形态学。全书的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较系统地阐明了美的形态学成立的可能性、理论价值、既有成果和基本方法。认为：“美的形态学是美学理论体系中最具体，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正如没有美的事实，任何美的本质研究都是虚幻的一样，没有美的形态学这一环，任何美学论都是空洞的。（第 1 页）”这是一种理论信念，也是他对既有美学理论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很好的总结。他把美的形态学的历史发展概括为：萌芽期、演进期、成熟期，基本符合西方美学史的发展实际。他不赞同传统的依据美的本质观念进行演绎分类、或依据审美对象的感性特征归类、或根据物性学的分类方法所作的自然分类，并对以往分类法的优劣作了细致、准确的把握。他认为，现代美的形态学“要努力把各种美放在一定的系统中来加以分类，使之在一定系统中取得质的规定，显示出各种类型的美的内在联系和从

属关系。（第 48 页）”本着这一原则，他认为，从“世界系统”的角度看，美可以分为“自然物理世界系统的美”、“人自身世界系统的美”、“文化世界系统的美”三大类。从“范畴系统”的角度看，美可以分为一般范畴系统的美——优美、崇高、中和；艺术范畴系统的美——悲剧、喜剧、正剧。这种分角度、分层次的系统分类，概括性更强，划界更明晰。比如，三大世界美的分类，既克服了将人的自然和艺术的美排除于社会美之外的传统观念的缺陷，又克服了把人的产品美（一般产品和艺术产品的美）割裂为两部分而归之于不同子世界的毛病。第四章论述优美、崇高、中和美三大范畴理论的历史发展、特征及系统关系；第五章探讨悲剧和喜剧范畴的发展及其本质特征、悲剧与喜剧及崇高的关系、喜剧与笑的关系等；第六章考察“丑论”的历史发展、丑与美的关系、丑与崇高及艺术的关系，是对美的形态学相关范畴——丑的补充研究。由第三章至第六章的内容，搭建起了美的形态学的大厦。全书章节联系紧密、体系完整，对美的形态学的历史发展、现代建构作了真正系统的研究。

二、观点辩证，富有创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诸家之说的哲学根基、得失作出辩证分析。书中谈及的诸多问题，美学史上有不少论者谈过，但是各家因哲学出发点不同而颇多抵牾之处。该著对美学史上的有关重要观点都作了清理，处处见出作者思考之深、用功之勤，所论大部分是可以信从的。这既体现了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敬重，也体现其研究有实据和针对

性。如第四章第二节谈崇高，作者从西方的柏拉图、郎吉弩斯到柏克、康德、席勒、黑格尔，再到立普斯、罗斯金、布莱德雷、屈耳佩、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中国的伍举、季札、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一直下来，把美学史上的重要节点都谈到了。在论及他们的观点时，既注意到了先后承续，又注意到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如柏克对康德的影响，席勒对康德的反拨（不满于康德过于强调美和崇高的主观性），黑格尔对康德与席勒的双重吸纳（从康德的主观唯心论走向客观唯心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的批判（反对对崇高作任何唯心主义的解释）等，论述都很辩证。作者指出，崇高的本质特征问题之所以复杂，原因不外两点：其一、崇高作为一种美的历史形成过程和构成因素比较复杂；其二，崇高在不同领域——自然界、人自身世界和文化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和性质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他认为，对崇高既要作出总体把握，又必须具体领域具体分析。西方美学在18、19世纪以前基本上是在自然美的范围内谈论崇高，所以其主要观点，如柏克、康德所持有的“崇高的特点在数量和力量上是巨大”这一观点，便只适用于自然的崇高，对于人和文化世界的崇高则说不通。

(2) 坚持矛盾分析，力求探寻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作者注意并正视一些美学问题所内含的矛盾因素，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多有创见。比如，书中第三章第三节提出“科学美”的概念，便注意到科学中理论思维与审美把握的对立统一。本书第四章第三节还辩证地论证了中和美的问题。西方美学史在美的范畴划分上过于强调了范畴的对立，故多就美的极端进行二元论划分——如优美与崇高的划分，这种做法对美的中间状态不能把握。柯先生吸收中国传统“中和”思想之精华，创造

性地提出优美、崇高、中和美的三元论划分法，并详细探讨了中和美的本质特征，这是以往的美学论著未曾明确、系统化的。他虽然强调了中和美的客观存在，但又看到了中和美游移、相对的特点，故对其理论把握不偏执，不过于坐实。他说：“中和之美的特殊位置——处于优美与崇高两对立的美互相向对方运动的过渡阶段、中间阶段，决定了它既不是两对立面的任何一方，即既不是优美也不是崇高，却又包含着优美和崇高两极的特点。（第295页）”这是辩证而启发人的概括，有助于认识美学领域的许多相关现象。

三、史论结合，取证广博。理论研究成功与否，关键看抽象与具体的结合度。不少研究美学的人，立论甚高，却无实据，说法不足以服人，当然也就不能真正解决美学中的问题。《美的形态学》对美的诸种形态的分类、本质特征的抽象把握是从感性具体开始，并上升为思维具体的，做到了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史论结合，取证广博。谈形态，不忘与本质论结合，使美的本质论融入形态学中。为了论述形态、范畴的理论问题，大凡古今中外的有关理论、文学创作、绘画、雕塑、建筑等著作都多有征引，足见其学植深厚、治学严谨。

当然，美的形态学是一门较新的学科，诸多问题层层迭生，有待深入商讨。本书中的一些说法也许可以再琢磨。比如，中国古代对人自身美的发现，唐宋、明清亦有重要节点值得重视，本书追述仅下及魏晋。又，悲剧分类中，将《红楼梦》归入悲凉型悲剧是否合适？也许柯先生对此类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只是囿于篇幅，未及详论。

作者刘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